

目 錄

第一章 鴉片戰爭前後的銀價暴漲與錢價低落	一一三
----------------------	-----

一 銀價暴漲形成了嚴重的貨幣問題	一
二 鴉片輸入的不斷擴大是造成現銀外流的基本因素	四
三 現銀外流是銀貴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
四 無法挽救的狂瀾	二一

第二章 近代的銀兩制度	二四—四三
-------------	-------

一 何謂銀兩制度·····	一四
二 銀兩的歷史·····	一八
三 銀兩的形式和名稱·····	二二
四 成色與平砵·····	二七
五 鑄造與鑑定·····	三七
六 對銀兩制度的幾點認識·····	四三

### 第三章 近代的制錢制度

四六

一 制錢制度的由來及其特質·····	四六
二 制錢的鑄造機關的分佈及其沿革·····	四九
三 制錢的鑄造與鑄額·····	五三
四 制錢的貶值·····	五七
五 制錢的種類及其計算方法·····	五九
六 制錢制度的消滅·····	六一

第四章 太平天国革命運動與清代幣制的變革……………六六—六九

一 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六六

二 咸豐時代的大錢制度……………六九

甲 大錢鑄造的歷史背景……………六九

乙 大錢制度的醞釀……………七一

丙 大錢制度的演變……………七三

丁 大錢的末路……………七九

三 咸豐時代的官票和寶鈔……………八二

甲 發行紙幣作為籌措戰費的手段……………八二

乙 官票寶鈔的發行……………八六

丙 政治敗壞與惡性膨脹政策是紙幣失敗的兩大因素……………八九

四 太平天国革命戰爭後的幣制改革問題……………九三

第五章 近代外國銀圓的流入及其影響……………一〇〇—一〇五

一	十八世紀末葉以後外國銀圓大量流入	100
二	近代中國流通的外國銀圓	104
三	外國銀圓流入的原因及其影響	110

## 第六章 代銀兩而起的銀圓制度

116—118

一	自鑄銀圓的原因及其論爭	116
二	仿鑄與官鑄	119
三	龍洋的鑄造	123
四	銀圓單位問題的論爭	125
五	龍洋的成色鑄額及其他	129
六	銀圓制度的進步作用和缺點	133

## 第七章 代制錢而起的銅元制度

137—139



一 從大錢到銅元 .....	一三七
二 銅元制度及其演變 .....	一三九
三 紊亂的原因和影響 .....	一四〇

<b>第八章 信用貨幣制度的新發展</b> .....	一五〇—一五三
-----------------------------	---------

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新的經濟發展形勢 .....	一五〇
二 有關紙幣的理論 .....	一五四
三 國家銀行的紙幣發行 .....	一五九
四 官私銀錢行號的紙幣發行 .....	一六七

<b>第九章 北洋軍閥時期的貨幣制度與貨幣問題</b> .....	一七四—一七三
-----------------------------------	---------

一 銀兩制度的繼續存在 .....	一七四
二 幣制改革問題 .....	一七九

### 三 銀圓・銀輔幣・銅輔幣……………一八三

甲 漸趨統一的銀圓……………一八五

乙 十進銀輔幣的失敗……………一八六

丙 舊銅元與新銅輔幣……………一八八

### 四 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一九三

### 五 地方銀行發行的紙幣……………一九六

### 六 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二〇七

## 第一章 鴉片戰爭前後的銀價暴漲與錢價低落

中國近代貨幣史是中國貨幣史上最紛歧複雜而又變化最劇烈的時代，它的變化和發展，同樣是以鴉片戰爭為轉捩點。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通行的貨幣，主要的是『銀兩』和『制錢』，由於當時產業不發達，對外貿易很有限，因而銀雖然用作貨幣，但只使用於田賦徵收及其他巨額支付，一般貨幣流通，主要的還是制錢。所以在清道光以前（一八二〇年以前）的貨幣問題，主要的在制錢而不在銀兩，也就是錢賤、錢貴、私銷、私鑄及銅價等問題。及至鴉片戰爭前後，隨著外來資本主義勢力大踏步侵入中國，中國貨幣問題開始了歷史性的變化，以鴉片戰爭為轉捩點的中國近代貨幣史，最鮮明的標識，是貨幣問題的中心，已由制錢轉移到銀兩，即是銀價問題已成了貨幣問題的中心環節。因此，鴉片戰爭前後的銀價暴漲，遂成為中國近代貨幣史的開端，從而根本動搖了在封建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舊的貨幣制度，並使中國近代的幣制越發紛歧複雜，不斷發生劇烈變化，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一部分。

### 一 銀價暴漲形成了嚴重的貨幣問題

滿清時代貨幣問題發展的趨勢，到了嘉慶末年，銀價即逐漸昂貴。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戶部侍郎蘇楞額即奏稱『內地銀兩漸形短絀。』這自然是由於銀價漸貴，所以才感覺到銀兩短少。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御史王家相的奏疏就明白指出江南各省『銀價日貴，官民商賈胥受其累。』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御史黃中模請嚴禁銀兩海外偷漏。五年（一八二五）給事中孫蘭枝也認為紋銀流出外洋，則中國銀兩必然短少昂貴，請下令嚴禁。九年（一八二九）的上諭也承認『近年銀價日昂。』〔一〕可見到了道光初年銀價是在繼續高漲，不過當時似乎還不是很嚴重，到了道光十年以後，問題才日益嚴重起來。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給事中孫蘭枝奏稱『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十八年（一八三八）鴻臚寺卿黃爵滋的有名的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中說：『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二〕十九年（一八三九）包世臣的銀荒小補說裏說：『天下之苦銀荒久矣，本年五月江西省城價長至制錢一千，兌紋銀六錢一分，是銀每兩爲錢一千六百三十餘文。』〔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劉良駒請飭定銀錢劃一章程疏裏說：『竊維銀價之昂，未有甚於今日者，京中紋銀每兩，易制錢幾及二千文，外省則每兩易制錢二千二百文不等，其勢日增加，尙無底止。』〔四〕可知銀貴問題，在鴉片戰爭前就很嚴重了，鴉片戰爭後，嚴重情形不但未見減輕，而且越發加重了，銀價漲至每兩換制錢二千二百文。

這種超出尋常的銀價高漲，自然要造成滿清政府財政上不可克服的困難。因而銀貴問題成了當時社會經濟問題的中心，大家都努力去尋求所以形成這樣嚴重局勢的原因，並且針對着提出各

種解決辦法。一般都認為基本上是由於現銀外流，這一點是比較一致的，可是究竟怎樣造成現銀外流的呢？大家的看法前後就有些分歧。大體在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以前，銀貴問題還沒有十分嚴重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認為基本上是由於『夷商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將低潮洋錢運進』，『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及至道光十年以後，問題一天一天更嚴重，事實也一天一天更顯露，大家的認識才有了轉變，知道基本上是由於鴉片的大量輸入。

前引嘉慶十九年蘇楞額的奏疏說：『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護回夷兵爲名，每年將內地銀兩偷運出洋至數百十萬之多，該夷商已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將低潮洋錢運進，任意欺蒙商賈，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這是說銀貴由於銀少，而銀少却是由於外國商人偷運及用銀元套購現銀出口的結果。

道光二年黃中模、五年孫蘭枝前後建議嚴禁銀兩偷漏出洋，也是基於上述同樣的認識。所以道光九年（一八二九）上諭說：『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番舶以販貨爲名，專帶洋錢至各省海口，收買紋銀，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近年銀價日昂，未必不由於此。』（一）滿清政府也肯定地說：銀兩日少，銀價日昂，是由於外國商人用洋錢套購紋銀的結果。爲甚麼這樣說呢？道光九年的上諭說是因爲外國銀元成色低，『僅當內地銀錢什七』，所以『番銀行日廣，官銀耗日多。』這在後來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林則徐的奏疏裏說得更清楚，他說：『從前洋錢流入內地，其成色比紋銀爲低，其價值比紋銀爲賤。』『未幾而洋錢等於紋銀，又未幾而洋價浮於銀價。』『近日蘇松一帶，洋

錢每圓概換至漕紋八錢一二分以上，較比三四年前，每圓價值實已增高一錢，即兌換制錢，亦比紋銀多至一百文以外。查蘇州工商輻輳，洋錢行使最多，每圓加一錢，十圓即加一兩，以一百萬圓計，即已潛耗紋銀十萬兩。」（六）照這樣說法，外國商人如用洋錢大量套購紋銀，自然要造成現銀外流，以至於『銀日少』『銀日貴』了。

基於上述這樣的看法和判斷，所以當時很多關心銀貴問題的人所提出來的解決辦法，大半主張嚴禁偷漏銀兩出洋，如前引黃中模、孫蘭枝等即是一例。更具體一些的則如道光九年御史章沅主張『粵洋通市不得違例私易銀錢』，以防止銀兩流出。而滿清政府也就採納他們的建議，先後於道光二年二月下令『廣東督撫暨海關監督，派委員弁，認真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銀兩。』道光九年正月令廣東省嗣後對通商貿易，『止准易貨，毋許易銀，』『內地官銀則絲毫不准私出。』（七）想用這種辦法制止現銀外流，解決銀貴問題。

事實證明這種判斷是不够正確的，所以這一類辦法的實施，當然不可能得到預期的效果，相反的，問題一天一天更嚴重起來，赤裸裸的事實叫人正確地認識到造成銀荒的現銀大量外流，主要的是由於鴉片輸入的不斷增大。

## 二 鴉片輸入的不斷擴大是造成現銀外流的基本因素

鴉片輸入，在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簽訂）以前，一向是走私性質，所以每年輸入額很難有

確實數字。據李圭的鴉片事略裏說：康熙十年（一六七一）以前每年不過數十箱，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以前每年輸入也不過二三百箱，乾隆之際（約指一七六六——一七九九）每年即增加到一千箱左右，自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以後，輸入數字便一年一年龐大起來了。茲為簡明起見，特根據李圭鴉片事略及馬克思的鴉片貿易第一第二兩篇論文所記歷年輸入數字，列表如下：

歷年鴉片輸入統計表

年	代	公	箱	價	備
嘉慶	五	元	數	值(元)	註
二十一年	年	一八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每箱約百斤。
二十二年	年	一八一六	三、二一〇	三、六五七、〇〇〇	(二)凡只舉箱數未標明價值，或只標價值未舉箱數的各年份數字，均係根據馬克思論文，這種數字當較李圭的更可靠，由此也可見李圭所列的數字還較實際數字小。
二十五年	年	一八二〇	五、一四七	八、三一四、六〇〇	(三)摩爾斯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中亦載有歷年鴉片輸入數字，與本表多有出入，不具錄。
道光	元	元	數	值(元)	
二年	年	一八二二	四、六二八	九、六〇一、〇八五	
四年	年	一八二四	一二、六三九	一〇、四二五、〇七五	
六年	年	一八二六	九、九六九	一二、五三三、一一五	
七年	年	一八二七	九、五三五	一二、〇五七、一五七	
八年	年	一八二八	一三、七三六	一二、九〇四、二六三	
九年	年	一八二九	一三、九九〇	一一、五〇四、二六三	
十一年	年	一八三〇	一八、七六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十四年	年	一八三一	一四、二二五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十七年	年	一八三四	二一、七八五		
咸豐	六	元	數	值(元)	
六年	年	一八三七	三九、〇〇〇		
六年	年	一八五六			

這個表既不完全，也不能說正確，但所列數字，相信祇會比實際數字小，不會比實際數字大。僅就這個表來看，可知在道光元年至十年（一八二一—三〇）之間，每年鴉片輸入所耗費的現銀，即在一千萬元左右，十一年至二十年（一八三一—四〇）即鴉片戰爭前，又逐漸增加到每年耗費二三千萬元。滿清在嘉道以前，每年國家總收入也不過四千八百餘萬兩（漕糧約四百萬石除外）中央和地方合計每年總支出還不過三千五百萬兩。對照起來一看，就可推想得到絕對經不起這樣每年的大量耗費。

由於鴉片輸入而流出大量現銀，這在前引道光九年對御史章沅奏粵洋通市不得違例私易銀錢請旨飭議章程一摺的上諭中已經注意到了，它說：『至鴉片煙一物，流毒尤甚，該處偽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之多，非尋常偷漏可比，若不極力嚴禁，弊將何所終極？』因此下令『其違禁貨物，尤應隨時稽察，不准私入。』（八）同年十二月上諭又說：『該洋船私帶鴉片煙泥入口，偷買內地官銀出洋，以外洋之腐穢，巧獲重貲，使內地之精華，潛歸遠耗，得少失多，爲害不可勝言，必應實力嚴查。』（九）幾天之後，又因鴉片流行內地，『以外洋之腐穢，潛耗內地銀兩』，下令『必須將如何截其來路，如何禁其分銷，期於言出法隨，不至爲文告故事。』（一〇）道光十一年不知姓名的鴉片煙積弊請杜絕來源一摺裏也說：『查煙土一項，私相售賣，每年紋銀出洋不下數百萬，是以內地有用之財，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無窮，其竭財亦無盡。』（一一）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六月的上諭說得更清楚，它說：『御史朱成烈奏銀價昂貴流弊日深，請飭查辦一摺，所奏甚是。銀錢價值兩得其平，方於國計民生，均無窒礙。近來錢價日賤，自係



紋銀不足所致，推原其故，固由於風俗奢侈，耗於內地，而禁煙一物，貽害尤甚，耗銀尤多。若如所奏，廣東海口每歲出銀至三千餘萬，福建、浙江、江蘇各海口出銀不下千萬，天津海口出銀亦二千餘萬，一入外夷，不與中國流通，又何怪銀之日短，錢之日賤也。」因此下令「嚴飭沿海各督撫，認真查辦。」（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鴻臚寺卿黃爵滋的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說得尤為具體。他說：「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蓋自鴉片煙流入中國，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查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日甚一日，年復一年，誠不知伊於胡底。」（三）

上述種種論斷，綜括起來說就是：（一）銀貴是由於銀兩外流，而銀兩外流是由於鴉片大量輸入。（二）銀貴不是由於錢多，而是由於銀少。這樣來說明銀荒的形成，無疑的是正確的。當然現銀外流並不是銀貴的唯一原因，但確是主要原因之一。

### 三 現銀外流是銀貴的主要原因之一

為什麼說現銀外流是銀貴的主要原因之一呢？我們從道光以前外國現銀流入及道光時代中國

現銀流出的數字上，可以得到具體的證明。

中國雖然自明代以前即用銀作貨幣，但明以前使用量甚小，實際上用銀來標識物價，以及普遍的用作支付手段及繳納租稅，却是明末以後的事。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社會進步的需要，又因銀礦開採，特別是雲南方面有了銀的出產，能够多量供給這種需要的結果。<sup>〔四〕</sup>同時，明末以來外國銀的流入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顧炎武說：「國初（明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寶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爲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爲用也。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是年採納已六萬七千一百十八兩），乃食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爲常，蓋番舶之來多矣。」<sup>〔五〕</sup>這也是說明普遍用銀始於明中葉以後，而銀的大量供給，不僅靠開礦，更重要的是外國輸入。

自東方新航路發現以後，東西交通發達，明隆慶五年（一五七一）以後，首先由西班牙陸續輸入大量墨西哥白銀，後來葡萄牙、荷蘭、法國也相繼有少量的白銀輸入中國，而輸入最多的，有一個時期却是英國。美國則從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開始對華貿易以後，也不斷輸入相當數量的白銀。東方的日本在明末清初一段時間內也輸入了巨額白銀。大抵明末以來至道光以前爲外國銀的流入時期，而道光時代則因有的國家如日本早已禁止白銀輸出，有的國家如西班牙則限制對華貿易，英國、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則進行大規模的鴉片非法貿易，所以道光時代一變而

爲中國銀的流出時期。

我們把道光以前外國銀流入的數額和道光時代歷年白銀流出的數額作一對比，就可以知道這樣一個轉變對中國貨幣經濟的影響是極端嚴重的。

在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以前，華僑——主要是福建人早已到那邊往來居住，所以自西班牙佔據菲律賓，並開闢馬尼刺之後，即通過華僑開展對華貿易。西班牙人由墨西哥每年運送大批白銀到馬尼刺，和華僑貿易，這些白銀有許多即經由華僑之手而流入中國。布萊亞和羅伯特遜的菲律賓諸島志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 所收十六世紀各方面給斐立浦一世的書札，都說每年有大量的白銀由菲律賓流往中國。而我國方面明末清初人的著述，如張燮的東西洋考，及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也都有記載，說閩粵商人每年由菲律賓運銀回國，漳州一帶多有這種銀錢流通。〔六〕而據科米因的推測：自公元一五七一年馬尼刺開埠時起至一八二一年墨西哥獨立時止，前後二百五十年間由墨西哥輸入馬尼刺的白銀，總額約四億圓，其中至少四分之一，約一億圓流入中國。〔七〕

其次是在十七世紀中日本有大量白銀由長崎流出，大部分是輸入中國，或者是由來長崎貿易的中國商人直接帶回中國，或者是由荷蘭商人由長崎帶往澳門，購買中國生絲。據估計自一六〇一年至一七〇八年（日本慶長六年至寶永五年，明萬歷二十九年至清康熙四十七年）這一百零七年之間，輸入中國的白銀，約達一億圓。〔八〕

整個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歐洲方面輸入中國的大量白銀，差不多都是自英國輸出的，因

爲不但東印度公司及英國散商是由英國輸出白銀購入絲茶，即當時在廣東貿易的瑞典、丹麥、德意志的商船也是用銀購入中國茶葉轉售給英國，所以結果這些白銀還是從英國來的。關於這二百六七十年間直接間接由英輸入中國的白銀，究竟有多少，可惜還沒有正確的數字。據摩爾斯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的統計可知的，合計約五千六百餘萬圓，實際數字當比這個要大得多，他估計加上不知道的數字應不下五億圓。

此外還有美國自對華通商以來，到道光以前（一七八七——一八二〇）輸入中國的白銀約達五十萬圓以上。（二）

總上所述，在道光以前自外國流入的白銀，僅就可知的數字合計，也有三億六百餘萬元，正因爲有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入，才使銀兩幣的供求維持平衡，幣值能得到相對的穩定。可是到了道光時代，從菲律賓、日本的輸入已經停止，而歐洲諸國從前用銀購買中國茶絲，現在却用輸入鴉片來替代。自嘉慶末至道光初年，洋銀流入額已經很少，到了道光七八年，便完全沒有流入，以後反過來向外流出，主要的是流向英國，這種逆流，在道光十八九年達到了最高潮。鴉片戰爭失敗以後，鴉片的輸入更多，現銀也就繼續外流，一直到咸豐初年才又逐漸轉變過來。

由此可知道光時代的銀價暴漲，是和現銀的大量外流分不開的，造成現銀大量外流決不是用銀圓套購銀兩，而是鴉片大量輸入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滿清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減低了制錢的重量和成色，使制錢貶值。（詳第三章第四節）兩者交織起來，遂使銀貴問題一發而不可遏止。

#### 四 無法挽救的狂瀾

雖然從道光十年以來大家都明確了當時銀貴與現銀外流的關係，可是在人們尋求解決的辦法上，鴉片戰爭以前和以後却仍存着很大的歧異。鴉片戰爭前全國上下差不多都是從禁煙上着眼，想設法減少銀的外流，最著名的如黃爵滋、林則徐等，就是和黃、林意見相反的許乃濟，歸結起來也還不敢不說是爲的減少銀的外流。這都是一般所共知的。這本來是拔本塞源的辦法。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戰爭的失敗就是宣告了上述辦法的失敗，於是再沒有人公開提出禁煙的辦法，喪權辱國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自然更不必說了。可是問題不僅存在，而且比戰前更嚴重，迫使全國上下不能不繼續尋求解決的辦法。於是大家掉轉頭來想從幣制本身謀求解決。原來銀貴問題是在於銀少，不在於錢多，而銀少又由於鴉片輸入。現在看到禁煙的辦法行不通，知道從根本上解決「銀少」是沒有希望了，便來根據「銀貴並由於錢多」的論證，紛紛主張「重錢賤銀」，即是擴大錢的流通範圍，增加錢的流通數量，也就是企圖逐漸以錢的行使來代替銀的行使。戰後在財政上益陷於窘境的滿清政府，自然樂得接受這種建議。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戶部

據這種理

定：「銀之爲物，既非若銅、鉛、錫、

鐵，隨時礦採，而耗銀之事又百出不窮，故銀之貴非由於錢之多，祇以日趨於少，即日形其貴，此時正宜設法用錢，以解銀之不足。」又稱：「用銀之款，皆代以用錢，財用因以少裕。」（三）奏請下

鑄制錢。這是主張增加制錢的流通量並擴大它的流通範圍。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劉良駒上請飭定銀錢劃一章程疏，他說：「論者謂銀之昂由於銀少固矣，然臣竊考唐宋以前，中國數千年上下通行之寶，惟錢耳，明初用銀猶爲厲禁，至中葉始定稅糧折納白銀之令，相沿至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是其明證。今之銀貴由於錢賤，實由於用銀太重，用錢太輕，我朝承平數百年，歷代所鑄之錢流行宇內，然自小民日用之外，殆無用錢之處，此制錢所以日輕也。」<sup>(三)</sup>因此他主張重視制錢，規定銀錢的法定比價，依一定的比率，用錢作官府的收支。在他的看法是錢糧折銀輸納，則銀的需要量過大，使錢的價值下落。只要規定錢銀比價，依比率收支，擴大了錢的使用範圍，問題就解決了。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我們知道由用錢到用銀是貨幣史上的進步，是社會經濟向上發展的結果，不是人力所能強制的。要勉強抑低銀的地位，提高錢的地位，結果只是徒然，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且錢賤首先是由於制錢貶值，用錢代銀，等於火上加油。所以滿清政府的令各省開爐鑄錢，只有加重銀貴的趨勢，它既無力維持銀錢的法定比價，更不可能按一定的比率用錢來收支。銀貴的趨勢，直如潰決的洪流不可遏止，不但終道光一代差不多都是銀每兩值制錢二千文左右，到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曾國藩上擬銀錢並用章程疏，也說：「現在時銀一兩當制錢一千九百餘。」<sup>(四)</sup>咸豐二年馮桂芬作用錢不廢銀議，說當時銀每兩「易制錢幾及二千文」，附記又說咸豐三四年頃達二千文以上。<sup>(五)</sup>

從咸豐五六年開始，因外國白銀又輸入中國，而形勢急劇轉變過來，大體從此以後，直到滿

清滅亡，一般是每兩換制錢千五百文左右。不過咸豐以後中國貨幣問題已更趨複雜，不是單純的銀錢之間的關係了。

應當指出鴉片戰爭前後的銀貴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爆發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 以上均見道光東華錄。

〔二〕 道光東華錄。

〔三〕〔四〕 清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五〕 道光東華錄。

〔六〕 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卷四。

〔七〕 道光東華錄。

〔八〕至〔三〕 均見道光東華錄。

〔四〕 萬曆大明會典，宋應星：天工開物，顧炎武：日知錄及浙江通志、雲南通志、福建通志等書均有片斷的記載。

〔五〕 顧炎武：日知錄。

〔六〕 參看張燮：東西洋考卷七稅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三福建漳州府洋稅。

〔七〕 見 Eames, *ibid*, p. 63—De Conyn's Computation.

〔八〕 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經濟史研究，第五十七頁。

〔九〕 同上。

〔十〕 吳文鎔：設法貴錢賤銀疏，見清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八及吳文節公遺集。

〔十一〕 清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十二〕 曾文正公全集奏疏卷一。

〔十三〕 見所著顧志堂集。

## 第二章 近代的銀兩制度

道光時代的銀價暴漲，在貨幣史上的影響，首先是根本動搖了舊的貨幣制度——銀兩與制錢，使之開始走向崩潰與沒落的道路。可是，單就銀兩制度來說，它在中國近代貨幣史上仍然繼續存在，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並沒有很快就被徹底消滅，因此，我們有必要把近代銀兩制度的內容、實質及其變化和缺點，加以敘述和分析。

近代的銀兩制度，其內容極為複雜，非短短的一章所能詳述，這裏只擬就下列幾個問題加以論述：（一）何謂銀兩制度？（二）銀兩制度的歷史，（三）銀兩幣的形式與名稱，（四）銀兩的平砵與成色，（五）銀兩的鑄造與鑑定。從以上的論述，希望藉以解答：（一）銀兩制度究竟是怎樣的制度？（二）銀兩制度的歷史任務。（三）銀兩制度的缺陷。

### 一 何謂銀兩制度

銀兩制度究竟是怎樣的制度呢？第一從貨幣史上說是屬於什麼階段？第二從貨幣制度上說銀兩能不能算本位貨幣？關於這幾個問題，固然要從銀兩制度的全盤研究上去求解答，但就所謂銀



兩制度這一名稱的含義來理解，亦可以得一個概括的提示，而這個提示更可以有有效的幫助我們研究的進行。

所謂銀兩制度的『兩』，本來是衡量的名稱，而不是貨幣的名稱，後來纔以計算重量的名稱爲計算貨幣的單位，所以稱它爲銀兩。這種名稱似乎和英國的所謂『鎊』，意大利的所謂『里拉』，實質上沒有什麼差別，可是事實却不然，鎊和里拉不過保存其歷史上的舊名稱，實質上已轉變爲一種法貨制度，不是按金屬的重量來計值。而銀兩制度仍然是以金屬的重量計值，沒有踏進法貨制度的階段，它是屬於金屬貨幣制度中的所謂重量貨幣制度。金屬貨幣制度一般可以區別爲以下五種：

- (一) 重量貨幣制度
- (二) 無限制通用個數計算貨幣制度
- (三) 單一法貨制度
- (四) 複法貨制度
- (五) 合成法貨制度

以上五種制度的先後次序，不但在理論上是當然的順序，在歷史上也是順着這種次序發展的。人類最初使用金屬作爲貨幣的時代，大體都是製成棒形或扁平形等形狀，在授受時首先檢驗其品質，然後秤量其重量，按照品質和重量，以定其價格。舊約全書裏稱西布紐人以秤量貨幣去使用，亞里士多德論貨幣的起源，亦說金屬貨幣最初是按高度或重量使用，而古代羅馬的商人常常

攜帶秤去做買賣，這些都是歷史上顯明的證據。

近代的銀兩制度，既然沒有完全脫離重量貨幣制度的階段，不待言，它在金屬貨幣制度中要算是帶有原始性的一種。金屬貨幣制度以前的貨幣史，雖然也有一個較長的時期，如皮革、布匹和貝等的使用，但那些都帶着極濃厚的實物貨幣的色彩，真正具有貨幣的職能的，要自金屬貨幣開始，所以銀兩制度在貨幣史上也還是一種很原始的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後面銀兩制度的敘述中得到許多事實的證明。不過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必須附帶的加以說明，即是近代的社會經濟已經有了較高度的發展，這樣原始性的貨幣制度，怎樣能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相適應呢？而就貨幣史的發展說，宋、金、元、明各朝已經盛行信用貨幣制度，怎樣又會被這樣原始的銀兩制度所替代呢？這些問題需要詳細的分析和解答，這裏也可以簡單地說明一下，就是：近代銀兩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因為有制錢制度與之相輔而行的原故。制錢制度到清代已有了將近二千年的歷史，它比較銀兩制度有許多優點，而它的缺點則為不便攜帶，尤不便巨額支付，銀兩制度恰巧能够補足這些缺點，至於銀兩制度在零星使用時的若干不便和缺陷，又可以賴制錢給予相當的彌補，所以銀兩制度到了近代仍能繼續存在下。

近代的銀兩制度既與制錢制度相輔而行，那末，兩者間的關係究竟怎樣呢？是不是有主幣與輔幣之分呢？也就是說：銀兩是不是本位貨幣呢，關於這個問題，中外人士頗多論述，大體的意見沒有什麼很大的出入，即是：在事實上都承認銀兩是本位貨幣，而在理論上則多不承認銀兩制度能算本位貨幣制度。這看來似乎很矛盾，實際却不盡然。因為銀兩之作爲本位貨幣，在近代還

是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在嚴格的意義上自然感覺到有很多條件不夠，算不得健全的本位貨幣制度；但是實際上銀兩在當時已取得了本位貨幣的地位，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第一，滿清政府已規定徵收賦稅，數額在一兩以上的必須收受銀兩，一兩以下者銀兩與制錢聽人民自便。第二，銀兩與制錢的比價，法令已規定爲制錢一千準銀一兩。第三，政府已定紋銀爲標準成色。第四，政府會計都是用銀兩計算。這些都是本位貨幣的主要性能，雖然有時一兩以上的稅銀也令人民繳納制錢，銀錢的比價，滿清政府也不盡遵守，但那祇是用以維持政府收入及平抑銀錢價格的一時手段，我們祇能說這種制度不健全，不能說是這種制度不存在。

此外，又有人認爲在近代制錢與銀兩同爲無限制通用法貨，法律上並無主輔之分，所以銀兩不能算本位貨幣。這又是犯了理論與事實相混淆的毛病。在理論上這是千真萬確，可是事實上則不盡然。在清光緒以前一般人是不知道有所謂本位貨幣制度的，所以我們不能用嚴格的現代貨幣理論去衡量那時的貨幣制度，我們祇能就事實去觀察。在近代制錢的支付雖無法律的制限，但觀於政府巨額收支一律使用銀兩，及通商貿易上以銀兩爲計算物價與折算其他貨幣的標準等類的事實，可以充分證明銀兩在實際上已取得了本位貨幣的地位，制錢超過了某種事實的限度，自然不爲人所接受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近代的銀兩制度是在發展過程中的本位貨幣制度，由於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以及外國銀圓的侵入，遂使這一制度沒有能够得到充分的發展，而爲銀圓制度所替代，倘若十九世紀以後的中國，不受到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能够獨立自由地發展下去，銀兩制度

有可能發展爲完整的本位貨幣制，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回顧一下銀兩制度的歷史，就可以得到明確的解釋。

## 二 銀兩的歷史

中國用銀的歷史，據文獻記載，不甚久。史記平準書說：『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索隱說：『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通典食貨典說：『夏、商以前，幣爲三品。』而註則謂：『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白金爲下幣。』不知何所依據。此顯與平準書所謂：『古者皮幣，諸侯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的說法不相合。這大約是由於『上古之事邈矣』，『書缺有間矣』，『薦紳先生難言之』，自司馬遷以下皆屬各據傳聞，不能說誰的說法一定對。從這裏我們只能說可能在中國很古的時代銀就被用作貨幣使用而已。可是事實上在虞、夏以前中國是否已發明冶金術，目前的考古學尙不能證明，這又不僅是三品種類的差異而已。班孟堅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二）這種態度是很審慎的。

依據考古學的知識和可靠的文獻記載，銀在周代還是用作器物上的裝飾，如成都出土戰國鎧中上的甲飾，就是用銀嵌成鸞鸞的眼珠，長沙出土的楚漆器，亦有飾銀片和用銀做足及柄的。到了秦朝，『一國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飾寶藏，不爲幣。』〔二〕銀還是一種通商品。

也許在秦以前民間卽有以銀作貨幣使用的事實，因爲在春秋、戰國時商業已甚發達，這是一件很可能的事，不過我們還沒有找到確實的證據罷了。據我們所知，漢劉邦（高祖）統一中國後，銀或許已取得了貨幣的資格，至少是在民間。抗日戰爭期間四川遂寧修飛機場，發現銀塊，上有『雍齒侯置』字樣。這固可以解釋爲『寶藏』之用，亦可以解作貨幣之用。到了漢劉徹（武帝）的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政府正式規定以銀作貨幣使用了。於是製皮幣之外，『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三〕但因『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白金之不行，主要原因，顯然是由於戰時通貨膨脹。漢武之鑄銀幣一方面正是適應當時發達的商業的需要，其失敗則是由於戰時財政的枯竭，破壞了這貨幣制度的完整，後來王莽鑄銀貨的失敗也正是蹈着這個覆轍。王莽攝政，以『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四〕亦因幣面價值遠超過其實際價值，完全爲着財政的目的，而忽視了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所以未能暢行。

西漢交通西域，河西諸郡已漸習用西域諸國銀錢，及至東漢末年，交趾、廣州一帶，中西海上交通發達，於是交廣地區，全以金銀易貨，南北朝時內亂不已，幣制紛亂，使用金銀的風氣更

甚。不過這還僅限於一隅之地，唐代仍然以銀爲土貢，不是用作賦稅，抗日戰爭期間，西安出土的楚州貢銀（厚約五分，長約八寸，寬約三寸五分，上鑄有文字），卽其實物。至宋趙禎（仁宗）景祐年間（一〇三四——三七），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兩廣，易以銀，於是銀始正式取得貨幣地位。

唐以前銀之作爲貨幣使用，無論政府或民間大概都是以重量計值，秦、漢以上雖不可知，但觀於泉布以外的金屬貨幣，皆以重量計算，可知銀亦不會例外，漢以兩計，固無待論，六朝、隋唐想亦不過如此。

在宋、金、元三朝，銀的貨幣地位，事實上日趨鞏固，銀之作爲貨幣使用，不但在民間繼續存在，同時在政府方面也日趨重要。當時政府賞賜及外交納幣，每每以銀兩計算。（五）所以到了政治逐漸恢復常態，紙幣因失掉財政上的理由而趨於消滅，銀兩立即取而代之，這是銀兩首先戰勝了楮幣。明朱元璋洪武九年（一三七六）『許民以銀錢鈔絹代輸今年租稅，於是銀始得代糧。明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以後令浙江、江西、湖、廣等處租稅俱量收銀，此以銀爲賦之始。』（六）朱厚熜（世宗）嘉靖八年二月令解京銀兩皆傾成錠，並記年月及官吏與工匠姓名。（七）於是銀兩始有一定的單位和成色。銀兩既定爲人民納稅的法貨，又爲國家收支計算的單位，復有一定的成色重量，銀兩制度至是遂正式確立。而政府收支亦遂以銀兩爲計算單位了。（續文獻通考卷三十引王圻之語云：『正統時天下歲徵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出數共一百餘萬兩。』）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以直省徵納錢糧多係收銀，乃定『銀七錢三之例，嗣後銀錢交納仍各隨民便。』雍正十一年

（一七三三）後以民間正賦概行交銀，經安徽巡撫徐本奏准凡小戶零星及大戶尾欠錢糧，納銀時恐致稱收折耗，請令完納制錢，每銀一分收錢十文，連耗羨在內。至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又以「直隸所屬州縣徵收錢糧，多有以錢作銀，民間交錢比納銀為數較重，特諭凡錢糧在一錢以上者，不必勒令交錢，一錢以下者，仍照舊例，銀錢聽其自便。」（八）由此可知，到了清朝銀兩制度的地位更加鞏固了。這種迅速的發展，是與繼續發達的社會經濟相適應，非人力所能遏止。當時雖然制錢仍然普遍使用，然官私巨額支付及一般商業往還，銀兩已逐漸取得了本位貨幣的地位。不過這裏有一點值得我們深切地注意，即是銀兩在近代雖然取得了本位貨幣的地位，但銀兩究竟還沒有充分的具備現代本位貨幣的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銀兩的形式名稱及平色等方面得到具體的理解。

### 三 銀兩的形式和名稱

歷代銀幣的名稱，除漢武及王莽兩代各有一定的形式與名稱外，其後或名銀餅、銀錠、銀錠及元寶。

大抵隋以前稱銀幣為餅、為飯、為笏、為版，或稱為錠為挺，因前者的形式為扁平形，後者則為棒形。宋以後則轉稱銀幣為錠，元代復於錠之外總名之為元寶，而銀幣的形式亦一變為馬蹄形，明、清兩代相沿未改。清代總名之為元寶銀，細分之則有所謂元寶、中錠、小錠、碎銀等名

所謂元寶約重五十兩，形似馬蹄，故又稱馬蹄銀，多於鉅額支付時使用之。中錠重約十兩，形式不甚一致，但以類銜錘狀的爲最多，故又稱爲鏰子，其作馬蹄形的稱爲小元寶。小錠又稱小鏰銀，狀如饅頭，重量自三兩至五兩不等。碎銀則爲零星銀屑，又有滴珠等其他諸種名稱，專爲補助銀錠之用。

上述寶銀的種類和名稱，大體上是全國統一的，但因各地所鑄寶銀成色重量不一致，於是在實際上各地有各地所通行的寶銀，爲示區別起見，各地亦遂有各地銀兩的名稱，這原是封建社會形態在貨幣制度上的反映，由來已久。清朝文獻通考錢幣攷裏說：「今民所有自各項紋銀之外，如江南、浙江有元絲等銀，湖廣、江西有鹽撒等銀，山西有西鐔及水絲等銀，四川有土鐔、柳鐔及茴香等銀，陝、甘有元鐔等銀，廣西有北流等銀，雲南、貴州有石鐔及茶花等銀，此外又有青絲、白絲、單傾、雙傾、方鐔、長鐔等名色。」〔九〕是乾隆以前各地方通用的銀兩，其名稱已極繁複，及至近代名目之多更屬不堪枚舉，舉其要者略如下表。（見『各地寶銀名稱重量表』）

表上所列已有百餘種之多，此外沒有列入的還很多。從這裏也可以約略窺見銀兩制度的封建實質了。這個表係民國初年所編製，大體上是可以代表近代銀兩制度的實況。從這個表裏我們不但知道了寶銀名稱的複雜，也可以知道各地寶銀重量與成色的差異。

近代的銀兩原有實銀兩與虛銀兩的分別，所述各種不同名稱的寶銀，多半是屬於實銀兩的，此外還有一種虛銀兩。所謂虛銀兩，是「徒有其名，並無其物」，其作用祇爲計值的單位，實際



上並沒有這種銀兩。它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或人民所共認的一種通行的標準銀，用來作為計算的單位。其種類和名目也很多，舊有的紋銀，後來的九八規元、爐銀、洋例銀、行化銀、海關銀都是。

清代「官司所發，例為紋銀，至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紋遞相核算。」<sup>(一)</sup>「紋銀」本是清代的「標準銀」，但却祇是一種虛名稱，並無實物。所謂紋銀，實際上是滿清法定的一種銀兩的標準成色，起源於康熙時。而據印度造幣廠的分析，其成色約為九三五·三七四，即是每一千兩紋銀含有九三五·三七四兩純銀，所以習慣上每百兩紋銀須申水六兩始等於足銀，這是虛銀兩的最早的一種。

「九八規元」又簡稱規元或規銀，是上海一地所最通用的一種虛銀兩。九八規元的來源，說者不一，「或謂當時牛莊與上海豆行，交易甚繁，現銀缺乏，凡收現銀者，須九八折扣，不知確否，但其計算之起源，起於（上海）南市之豆麥行，則似可信。當上海未開租界以前，一切交易均在南市，而南市交易以豆為大宗，當時豆行之計算法，均以九八規元為標準，故各地與上海交易，均稱九八豆規元。嗣後租界設立，商務日繁，此九八豆規元之計算法，遂流傳於租界，輾轉相傳，遂成習慣，成為商界之計算本位矣。」<sup>(二)</sup>也有人說：「在上海尚未開埠以前，上海豆商交易，常用重一兩左右的小銀錠相授受，謂之豆規銀，但因其成色較公估局所批申的實銀，須低百分之二，故以批實折豆規銀，尚須以九八相除。」<sup>(三)</sup>兩說雖稍有歧異，但以前說為近理，大抵九八規元是起源於南市豆商，當道光年間（一八二一——五〇）現銀缺乏，豆商欲得現銀，故

不惜以九八折算，其始僅屬南市豆商交易的一種幫規。『當時上海國際貿易場中，尙祇通用西班牙本洋。惟本洋於十九世紀之初，即已停鑄，坐是流通於中國者日漸減少，而價格遂以暴騰。至前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滬市本洋市價，其增漲部分，已超過法定價格百分之八十以上，旋雖稍落，但西班牙本洋之不能再恃為華洋交易本位，則已事實昭彰。迨咸豐八年秋季，遂由本埠外國銀行及商界公決，將往來帳目，一律改為上海通行規銀。其時本市洋價，適與銀兩相等，故雖改換通貨本位，而於實際上未生若何變化，由是而上海規銀不藉官廳之力，運行普遍。』

規元的來源既係以標準銀用九八相除得來，九十八兩標準銀即等於規元一百兩，可知其成色較上海標準銀低百分之二，據前所述標準銀的成色為 $0.935374$ ，若以 $0.98$ 乘之，即可得規元的成色：

$$0.935374 \times 0.98 = 0.916666$$

規元的成色，當為 $0.916666$ ，即規元銀一千兩之中，有九百一十六兩又三分之二的純銀，上海市場上實際授受的現貨為二七寶銀，但計算起來則按九八規元折算。

『爐銀』是營口鑄造現寶的爐房所發，附有三個月期限的一種對人或對物的簿據信用，所以這也是一種虛銀兩。爐銀有三種：（一）過爐銀，（二）過爐現銀，（三）過卯銀。營口自通商以後，交易漸漸發達，制錢不敷應用，始漸兼用營銀，——成色九九二的營平現貨，而當地商人平日陸續收入的零星銀塊，不便運往外埠購貨，同時由外埠運入營口的現貨，因平色的不同，不能在本埠通用，所以他們多將零星及外來銀塊，請鑄造元寶的爐房，改鑄營銀。但因請鑄的人一

時過多，非經相當時日不能鑄就，而商家又需銀交易，每感不便。於是爲便利商家計，在收銀過稱以後，將鑄寶的銀兩中扣去銀質虧耗——即加色——及手續費等，折成營寶分兩，先給與營寶憑條一紙，使商家可憑條在市面交易，如需現寶，亦可憑條照付，這種寶銀的憑條，即爲現銀的收據，即必需有請求鑄銀者始得使用。後來商務日益發達，商家以銀爐憑條簡捷，轉覺現銀授受爲不便，每每與各爐房開立往來戶，有銀即存入爐房，即無銀亦得請求立戶發條。至是各爐房遂漸立於調劑金融的地位，凡一切交易及現銀借貸，僅依口頭通知爐房，彼此記一收付賬，交易即了。而當日所謂鑄造現寶的工錢，原是向以現銀易條的人內扣，現在則用加色的名義，轉嫁於持條易現寶人。這是所謂爐銀亦即是過爐銀，而外人稱之爲過帳銀的由來。過爐銀是以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一日爲結賬期，即所謂卯期，而所謂過爐現銀，即是當過爐銀到達卯期，不支取現銀，約爲歸入下屆卯期，照例得加計本卯的卯色，與現銀同一價格記帳，例如到卯的爐銀爲十錠，即五百三十五兩，本屆卯色爲每錠二兩，則轉入下屆的賬即爲五百五十五兩，稱爲過爐現銀。不過這種現銀仍係賬面上的現銀，將來交換現寶的時候，尚須有相當的貼水。至於所謂過卯銀，又稱卯銀，其性質與過爐銀恰恰相反，係到卯以前所使用，當使用爐銀的時候，手中無爐銀可以應付，乃預約以過爐銀的相當加色，而發行過卯銀，迨到卯以後，即與通常爐銀無異。所以當使用的時候，必須爲兩重的加色。例如過爐銀對現寶加色二兩，在這二兩之外，卯銀對爐銀尚須加色二兩內外。實際上在爐房有存銀的，常賣其頂卯銀而買過卯銀，在爐房有透支的，常賣其過卯銀而買頂卯銀，至其加色，則依卯期遠近及需供的程度爲高下。上述的過卯銀與過爐現

銀都是用於銀根吃緊的時候，以濟一時之急的。（二）

洋例銀是漢口所通行的一種虛銀兩。漢口在未開埠以前，銀色雜亂，無一定標準，及至開埠以後，銀爐及公估局相繼成立，始有平色劃一的『估寶』——即二四寶。而外國商人不熟習內地習慣，要求漢口各業商人依上海規元之例，以估寶九百八十兩，升成洋例千兩，以為標準，於是相沿成習，成為一種假定劃一銀兩。實際上所謂洋例銀，即是成色〇·九八〇、二七二的估寶九八元而已，大約是外國商人來漢通商時所定之例，所以稱之為洋例銀。（三）

行化銀是天津通用專屬記賬用的虛銀兩，猶之上海的規元漢口的洋例。但天津實際授受的現貨，則為『白寶』——二八寶，行化的成色較低於白寶，白寶五十兩，可作行化五十兩四錢使用，故以白寶折合行化，平均每錠約申水四錢，白寶的成色為二八寶銀，行化的成色則約等於二四寶銀。

由上述銀兩名稱的繁多，已約略可以窺見銀兩制度的複雜，若細加考察，更可進而理解以下幾點：

一、銀兩制度缺乏統一性，各地有各地所通行的標準銀兩，甚且一地有幾種不同的銀兩，同時並行，它是帶着濃厚的封建的區域性。可是：

二、銀兩制度却仍具有適應性，各大商埠虛銀兩的產生即是顯著的事實，雖然始終沒有能夠產生一個統一銀兩制度，但它總是朝着這個方向前進。這個演進，是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所以那些虛銀兩都是鴉片戰爭後所產生。可是鴉片戰爭促進了銀兩制度的改進，也宣告了它的死亡。

銀兩制度的所以如此複雜，固然是由於近代社會的半封建性質，但這樣的解釋，還是不具體，具體的解釋，應該是：半封建社會產生了各地度量衡的歧異，與各地所鑄寶銀成色的不一致，於是形成了這種複雜的銀兩制度。因此，我們要具體的實質的理解近代銀兩制度，必須了解那種分歧複雜的成色和平砵。

#### 四 成色與平砵

銀兩制度的複雜，第一是由於各地所鑄寶銀成色高下不齊，第二則是由於各地所用平砵大小不一。

近代寶銀成色的高下至為不齊，約計之有十餘種之多，茲將各種成色寶銀列表如次：

各種寶銀純分成色比較表

寶名	每百兩申水成數	內加成色	外加成色	銀爐所定成色	印度造幣廠試驗之結果
紋寶	四·八〇	九四〇·〇〇	九四三·四〇	九三二·〇〇	九三五·三七四
二四寶	四·九〇	九八八·〇〇	九八八·一四	九八〇·〇〇	九八〇·二七二
二五寶	四·九〇	九八九·〇〇	九八九·一二	九八一·〇〇	九八一·二〇〇
二五寶	五·〇〇	九九〇·〇〇	九九〇·〇〇	九八二·〇〇	九八二·〇〇〇
二五寶	五·一〇	九九一·〇〇	九九一·〇八	九八三·〇〇	九八三·〇八〇
二六寶	五·二〇	九九二·〇〇	九九二·〇六	九八四·〇〇	九八四·〇一〇
二六寶	五·三〇	九九三·〇〇	九九三·〇五	九八五·〇〇	九八四·九五〇

純足	二九五	二九五	二八五	二八五	二七五	二七五
銀	銀	寶	寶	寶	寶	寶
	六〇〇	五九〇	五八〇	五七〇	五六〇	五四〇
	一〇〇〇	九九九	九九八	九九七	九九六	九九五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一〇〇〇	九九九	九九八	九九七	九九六	九九五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九九二	九九一	九九〇	九八九	九八八	九八七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一〇〇〇	九九一	九九〇	九八九	九八八	九八七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此等寶銀的名稱，即係代表各該寶銀的成色，而此等寶銀成色的計算，則係以紋銀為基礎。

紋銀乃清代通用的標準銀，既如前述，但紋銀並非純銀，紋銀五十兩須加申水三兩，始等於純銀。上列寶銀的純分成色，都比較紋銀高，故以紋銀為基礎，凡申水二兩四錢的稱為二四寶，申水二兩五錢的稱為二五寶，其餘以此類推。以成色純分不同，其價值遂亦有高下之分。

各地通用的寶銀，常常在同一地區，至有數種之多，大抵清道光以前各地使用尚缺乏一定標準，道光以後，各通商口岸，因商業發達遂逐漸選定一二種為授受的標準。茲將各地通用成色標準寶銀列表如次：

各地通用成色標準寶銀表

省名	地名	標準寶銀	備攷
京兆	北京	十足寶	名為純銀，實則九九二，故可稱之為二六寶。
直隸	天津	化寶	成色九九二與北京同，故亦可稱之為二六寶。

湖	北 湖			安 徽		浙 江		江 蘇				陝 西	山 西	河 南	山 東	
長 沙	沙 市	宜 昌	漢 口	蕪 湖	安 慶	寧 波	杭 州	蘇 州	南 京	鎮 江	上 海	西 安	太 原	開 封	芝 罘	濟 南
二 四 寶	二 四 寶	二 四 寶	二 四 寶	二 七 寶	二 八 寶	二 九 寶	二 七 寶	二 八 寶	二 七 寶	二 七 寶	九 八 規 銀	二 四 寶	二 四 寶	二 八 寶	二 六 寶	二 四 寶
又二四寶九九八兌。					二四寶亦通用。		二八寶亦通用。			市上往來多用二四寶，但外省匯兌則均用二七寶。				名爲二八寶，實係二四寶。		

黑龍江	吉林	奉天	四川		貴州	江西		南		
			成都	重慶		南昌	九江	岳州	湘潭	常德
二六寶	二六寶	二六寶	二四寶	二四寶	二四寶	二四寶	二四寶	二四寶	二四寶	二四寶
								又二四寶九九五兌。	又二四寶九九五兌。	

由於各地使用寶銀成色標準的不一致，於是甲地的通用寶銀不能通用於乙地，乙地通用的寶銀亦不能通用於丙地。加以各地使用的平砵大小不同，更增加了寶銀流通的困難。即使兩地使用

的寶銀成色標準相同，而以平砵大小的歧異，亦不能相互流通。

清代各地使用的平砵，其紛亂情形，比較銀兩的成色還要嚴重。故因平砵之大小，而銀兩之輕重遂發生種種差別，折算至為煩難。據民國初年中國銀行調查，各地通用的平砵，即有一百七十餘種。但如雲南的滇平、關平，廣西的關平與梧州九九二平以及甘肅、新疆等省的平砵均未



列入，可知未經調查列入的猶不在少數。平砵的紛亂，誠令人『嘆觀止矣』！綜起來說，可以大別之爲庫平、關平、漕平、市平四種，茲依次略述如下：

一、庫平 庫平是滿清政府徵收各項租稅時所使用的官平，爲全國納稅的標準，但其大小，並不一致，中央政府的庫平與各地方政府的庫平，既有大小之差，而甲省的庫平與乙省的庫平，又復有長短之別，甚至一省之中更有藩庫平、道庫平、鹽庫平的差別。而中央政府收納之平亦較支出之平大，標準並不一律。馬關條約曾規定中央政府庫平一兩爲五七五·八二英釐，即三七·三一二五六公分。但地方政府的庫平仍是大小各異，大抵廣東庫平爲最大，約五八三·三英釐，寧波庫平爲最小，僅有五六九·一英釐。

二、關平 關平之設，起於中外通商，而有正式條約規定，則始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中英天津條約，該約第三十三款規定：『稅課銀兩由英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錢，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同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九條又訂明：『向例英商定納稅餉，每百兩另交銀一兩二錢，作爲傾鑄之費，嗣後裁撤，英商無庸另交傾鑄銀兩。』這是關平的初步規定。及至開始借外債以後，遂更進一步，規定標準重量，較中央部庫平尤大，每兩約重五八一·四七英釐，即三七·六八公分。但各關所謂關銀，名目雖同，平色仍不一致。

三、漕平 漕平是漕米改徵折色以後所設，民間亦逐漸通用，遂成爲一般通行的平砵。惟其標準重量亦因地而異，即同一地方亦少確定標準，如上海漕平，據各方調查結果，重量即不一致，綜合各家之說，上海漕平一兩，最大約合五六五·七三英釐，最小五六四·二英釐，茲列舉

如次：

- |                          |                      |
|--------------------------|----------------------|
| (1) 印度造幣廠檢驗的結果           | 上海漕平一兩 = 565.6970 英釐 |
| (2) 光緒二十一年海關檢查的結果        | 上海漕平一兩 = 565.6375 英釐 |
| (3) 日本大阪造幣局檢驗的結果         | 上海漕平一兩 = 565.7300 英釐 |
| (4) H. B. Morse 調查的結果    | 上海漕平一兩 = 565.6500 英釐 |
| (5) M. Bonkan 調查的結果      | 上海漕平一兩 = 564.2000 英釐 |
| (6) W. F. Spalding 調查的結果 | 上海漕平一兩 = 564.7040 英釐 |

不過普通計算，都以五六五·七英釐為標準，上海漕平與各地使用最多，九八規元亦即以此為推算基礎。

四、市平 市平是各市場通用的平，名目繁多，雖老於銀錢業的人，也往往一輩子都弄不清楚。如漢口一地即各業各幫不同，名目多至十餘種，其複雜略可想見。此等市平中最適用的當推公砵平、公估平、錢平及廣東的司碼平，此外由特殊的原因而通用的則為上海的九八規元與漢口的洋例平，規元與洋例平已見前述，茲再分述公砵平等的由來及其意義於次：

1. 公砵平 其意義即為官定的公法平，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多通用，又簡稱砵平，在清代全國匯兌最為通行，票號與錢莊多以此為匯兌價格計算的標準。

2. 公估平 又簡稱估平，係由秤定銀錠的公估局所產生，漢口等地方甚為通行。但公估局所用的平，實際上仍多選用該地方最通用的平砵，例如上海公估局係用漕平，天津公估局用行平。

3. 錢平 乃錢業相互間通用的平，其與他業賬項的清算亦以此爲計算基礎，以免與其他平砵折扣的麻煩。

4. 司碼平 就是官平，又名司平，廣東省內最爲通行，其他各平的差率常以此爲標準。例如汕頭的直平，較司碼平每千兩小三兩，遂稱直平爲九九七平。近代歐人與中國通商以廣東爲最早，司碼平亦早爲西人所知，故其測定他種平砵之大小亦多用此平爲標準，如廣東平百兩等於上海漕平一百零二兩半卽是。

銀兩的成色不齊既如彼，而平砵的紛亂又如此，其計算的煩難可想而知。最方便的計算方法，是用連鎖法，舉例如次：

漢口洋例銀

= 申公砵平 1,000 兩

申公砵平 1,000 兩

= 漢口估平 1,017 兩

漢口洋例銀 1,000 兩

= 漢口估平 980 兩

申公砵平 1,000 兩

= 漢口洋例銀 1,037.75 兩

卽：

$$1000 \times \frac{1017}{980} = 1037.75$$

其次因成色的差異，則有申水、去水等手續，計算起來更爲煩難。茲舉一例如次：

上海規元

= 北平公砵足銀 1,000 兩

申公砵 1,000 兩

= 京公砵 1,015 兩

申漕平 1,000 兩

= 申公砵平 1,002 兩

3 | 京公砵 100 兩 = 申漕平 98.32 兩

即： 京公砵  $100 \times \frac{1000}{1015} \times \frac{1000}{1002} = \text{申漕平 } 98.32$

申水  $5.5 \times \frac{98.32}{100} = 5.408$

$98.32 + 5.408 = 103.728$

$103.728 \times \frac{100}{98} = 105.845$

北京公砵足銀百兩等於上海九八規元一百零五兩八錢四分五厘弱。

這一類的計算方法，猶限於兩地有直接匯兌行市，至於無直接行市的地方，又須採用間接匯兌方法，計算起來尤其煩難。加以我國商場舊習，平砵間些微差別，往往不甚注意，故計算尤難一致。茲將各地流通銀兩合京津滬銀兩數，及各主要銀兩比價表列於後，前者係據美國經濟考察團報告，後者係道勝銀行撲苛鐵洛夫所製，其內容與前面所述或有差異，不能算準確，僅供參考而已。

各地流通銀兩合京津滬銀兩數表

地 名	平砵名稱	每千兩合上海九八規元	每千兩合北京公砵平	每千兩合天津行化平	與庫平一比較
江蘇上海	九八規元	—	九四五·五一	九四三·三五	九七五·三三
鎮江	二七陵平	一〇六八·六八	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〇八·四三	—
鎮江	鎮二七平	一〇七三·五〇	一〇一五·四〇	—	九八二·二八



各主要銀兩比價表

銀兩種別	重量 公分	成色	北京公 結銀	北京公 平銀	北京市 平銀	北京二 兩銀	天津行 化銀	張家口 銀	上海漕 平銀	漢口洋 例銀	烟台烟 平銀	牛莊平 銀	奉天平 銀	齊齊哈 銀	吉林平 銀
北京公結銀一兩	三三·九九	〇·九七	一·〇〇〇〇	〇·九六四	一·〇六六	一·〇二〇	一·〇六六	〇·九六七	一·〇二六	一·〇二六	一·〇二六	一·〇二六	一·〇二六	一·〇二六	一·〇二六
北京庫平銀一兩	三三·二四	〇·九七	一·〇三四七	一·〇〇〇	一·〇四二	一·〇六七	一·〇四一	〇·九四一	一·〇一九	一·〇六二	一·〇六二	一·〇六二	一·〇六二	一·〇六二	一·〇六二
北京市平銀一兩	三五·七	〇·九七	〇·九三九	〇·九六五	—	一·〇二七	一·〇〇五	〇·九五八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北京三兩平銀一兩	三五·〇二	〇·九七	〇·九七八	〇·九四〇	〇·九七九	一·〇〇〇	〇·九七三	〇·九五四	〇·九八三	〇·九八四	〇·九八四	〇·九八四	〇·九八四	〇·九八四	〇·九八四
天津行化銀一兩	三六·三	〇·九七	〇·九七〇	〇·九六〇	〇·九九五	一·〇三三	一·〇〇〇	〇·九五四	〇·九八六	一·〇一九	〇·九八四	〇·九七七	〇·九七七	〇·九七七	〇·九七七
張家口銀一兩	三七·五〇	〇·九六	一·〇四九	一·〇六〇	一·〇四七	一·〇七二	一·〇四七	一·〇〇〇	一·〇三三	一·〇六四	一·〇三三	一·〇四九	一·〇四九	一·〇四九	一·〇四九
上海漕平銀一兩	三六·六二	〇·九五	一·〇五三	〇·九八一	一·〇二四	一·〇四六	一·〇三九	〇·九七五	一·〇〇〇	一·〇四一	一·〇〇〇	一·〇六三	一·〇六三	一·〇六三	一·〇六三
漢口洋例銀一兩	三五·一〇	〇·九六	〇·九七四	〇·九四一	〇·九八三	一·〇〇六	〇·九八七	〇·九六六	〇·九五九	一·〇〇〇	〇·九六五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烟台烟平銀一兩	三六·四四	〇·九六	一·〇〇九四	〇·九五六	一·〇五六	一·〇三七	一·〇六二	〇·九六九	一·〇〇〇	一·〇六二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牛莊平銀一兩	三五·九九	〇·九六	〇·九九九	〇·九六五	一·〇五二	一·〇三六	一·〇五八	〇·九五九	一·〇八四	一·〇三三	〇·九九六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奉天平銀一兩	三五·九五	〇·九六	〇·九九七	〇·九六四	一·〇四〇	一·〇三八	一·〇四五	〇·九八七	一·〇八三	一·〇二四	〇·九八五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齊齊哈銀一兩	三五·九〇	〇·九二	〇·九九二	〇·九九一	〇·九九八	一·〇三三	〇·九九九	〇·九五四	〇·九七六	一·〇二八	〇·九八二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吉林平銀一兩	三五·九〇	〇·九六	〇·九九六	〇·九六三	一·〇二六	一·〇四四	一·〇三一	〇·九五七	〇·九八六	一·〇二八	〇·九八七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銀兩平色的紛歧，首先限制了它的流通能力，其次是增加了使用的困難，這不能不說是銀兩制度本身最大的缺陷。這種情形在封建的區域經濟時代，各地的經濟往還稀少，還可以勉強應付，到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外通商發達，國內貿易也相應擴展，銀兩制度遂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雖然上海、漢口先後產生了九八規元與洋例銀，作為各該地統一的標準平色，但這種局部的改善，終不能應付全局，無怪銀元制度要代之而起了。

## 五 鑄造與鑑定

由於各地銀兩平色的不統一，各地所鑄寶銀，不能互相流通，甲地寶銀運至乙地，必須改鑄為當地寶銀後，始能流用於市面，而滿清政府向來對於寶銀的鑄造，一任民間自由，所以各地均有專營鑄造寶銀的銀爐，和專事鑑定衡量以保證寶銀平色的公估局。

銀爐是南方的名稱，在北方則稱為爐房。有官設與私設之分，官設的多附屬於藩庫、關局及官銀錢號等機關內，私設的則多在各大商埠。銀爐所鑄寶銀均刊有爐名，對於其所鑄造的寶銀，負有絕對無限責任，即其繼承人亦不能免連帶關係。所以非有極好的信用與經驗，不但不能任意開設，而且也不容易獲得同業者的同意。清代定章，爐房開設，亦必須經戶部許可，發給部照，作為憑執。每一地方，爐房均有一定額數，不得任意增設，其未由戶部批准發給部照的，亦不能私自開業。但滿清末季，法令漸弛，就有很多未得部准而私自開設的，一般稱之為「私爐」，以

區別於有部照的官爐。

銀爐的業務，大抵受錢莊或商號的委託，以生銀等改鑄，收取定例的鑄造費，約每錠一錢至一錢五分（上海的銀爐則例外），亦有自購生銀改鑄後轉售於市場，以應銀號或錢莊的需要的，其獲利雖較豐，但經營者究屬少數。所以銀爐資本最大者不過一二萬兩，少者三四千兩而已。惟北方的銀爐則因兼營存款、放款、匯兌等錢莊業務，且有發行流通票據以代替現銀的原故，所以資本有的達數十萬兩之鉅。此等爐房多係獨立經營，與南方的銀爐大半由銀錢業共同組織的，其性質亦迥然不同。

近代在中國北部地方如天津、奉天等處，當銀行未創設以前，全埠金融，均操在爐房手裏。最著名的是營口的爐房，常憑其信用，發出憑條，代表現銀，俗稱為「銀飛」，能流通全市，號稱銀碼，即前面所述的爐銀。光緒九年（一八八三）當地各爐房創立公議會，決議每年以舊曆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一日為結帳掃現之期，存欠須一律劃清，是為卯期。凡存有銀碼的，都可向爐房取現寶，叫做掃卯，資本雄厚的爐房，每年出入銀碼，不下七八百萬兩。營埠當爐房全盛時代，計有二十餘家，每卯流通市面的銀碼，約二千三四百萬兩，信用頗佳。但因放出銀碼過多，架空圖利，到卯時常有擠兌現象，及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中日戰爭期間，營口銀根吃緊，每屆卯期，均不能開卯。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又值義和團運動，亦陷於同樣窘境。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俄戰起，接着日寇侵佔營口，一面濫發軍用手票，一面迫令各爐房清卯，企圖根本消滅爐房，一時營口爐房，大半破產，加以銀行興起，銀圓盛行，爐房亦不復能如昔時



盛況了。

南方的銀爐，大抵均係受錢莊或銀行委託鑄造，並非自行鑄造，待價出售。所以漢口的銀爐資本大者亦止一二萬兩，上海的銀爐，多者五六千，少者不過三四千。漢口的民營銀爐，產生於漢口開埠以後，概爲錢業所兼營，最盛時期，約有二十家，在南方僅次於上海。

上海在未開關租界以前，南市海關道衙門原設有官爐，鑄銀元寶，當時稱爲『海關道元寶』。及至租界商務繁興，需銀日多，於是北市始有銀爐的設立。當時凡在北市租界內銀爐所鑄的元寶，則名爲『夷場新』，意即洋場新鑄的元寶，以別於海關道所鑄的元寶。上海銀爐總數，到民國九年尚有二十四家，則當清代盛時，自可概見。當時曾有銀爐公所的組織。銀爐的內部極爲簡單，大致除經理外，有跑街一二名，專司與外界聯絡；秤銀一二名，專司鑄銀重量；上爐及副上爐各一名，於鑄鑄時，管理各爐的出品；鑄銀司務七八名，每爐一人，專司鑄銀；每爐更有助手一人，合計七八名；此外連出店司務老司務等，人數總在二十五人左右。銀爐的辦事室及鑄寶處，大都俱係租用普通住房，各司務及僱員的薪水工資，又極微薄，故費用極省，每月開銷約在四五百元左右。但是凡屬新開銀爐，須揀選殷實商號十餘家出具保結，經公估局核准，方能開爐鑄鑄；不然公估局有權加以驅逐或勒令停閉，這是爲統一銀色鞏固信用及杜絕弊端，不得不如此的。

上海銀爐鑄寶，大抵係受錢莊或銀行的委託。託鑄的銀貨，或爲大條銀或爲外路元寶及小洋。委託時，錢莊或銀行預計所交銀貨改鑄後，應合上海寶銀之數，與銀爐約定，隔一二日後，銀爐即以鑄成的寶銀，如數交回。惟遇銀行委託時，銀爐往往須於收銀後出一本票，交銀行收

存，作為銀爐對於銀行的欠款，其手續與拆票相同。信用較厚的銀爐，出一本票就行了，信用較次的，往往須有銀爐三家作連環保，隔一二日，元寶鑄成後，即以送交銀行，收回本票。

銀爐的利源，並非於委託鑄寶時，另向委託行家徵收鎔銀鑄寶等費，乃完全取給於交來銀貨，與上海的元寶的成色差額中。成色較優的外路元寶，銀爐有時即出貼水二三兩，尚有餘利可圖，所以銀爐的利益，全在交銀約價時，議定改鑄後，須交寶多少而定，交寶多則利益少，交寶少則利益多。當議定交寶多少時，銀爐已將一切耗費及利益各項算入，此外於鎔銀鑄寶，不另取資。詳細分析起來，銀爐獲利的方法約有四種：（一）外路元寶改鑄。江西、湖南、四川及天津、東三省等處的元寶，均係老寶，內含金質甚富，銀爐改鑄時，即將純金提出，提金之利，均歸銀爐，其金色最高的，往往每錠可獲利五錢左右。（二）銀條改鑄。如美國的金山條，歐州的紅毛條，皆較上海的夷場新元寶成色高，上海銀爐以此鑄造通用元寶，獲利甚厚。（三）花洋改鑄。如蕪湖的本洋，香港的英洋，成色均較通用銀圓高，且含有金質，可以提取。清末此等銀圓市價漸低，改鑄亦可獲利。（四）花小洋改鑄。各地運滬的各種小洋，銀爐用以鎔鑄現寶，亦可獲利。（五）銀爐或爐房所鑄的寶銀，在設有公估局的地方，須先送公估局批定，即非經公估局的鑑定保證，不能行使。但在沒有公估局的地方，則由銀爐對於所鑄寶銀，自負保證的責任。大抵北方除通都大邑外，公估局較少，爐房多半兼營公估局業務。

公估局的主要業務為鑑定銀錠成色，秤定銀錠重量，以保證其價格。其設立須經官廳核准，並得當地錢業公所的認可，亦有由當地銀錢業共同組織的。每地多以一局為限，即有設立二局以

上的，亦概屬分設。公估局的內部組織極簡單，除經理外，有管秤的及看色的各七八人，此外再有學徒四五人。管秤的專司秤寶的重量，看色的專司批寶的成色，用具則只需幾架天平幾張大桌就夠了。故公估局不需有多少資本，但為保證信用起見，須繳存現銀七千兩於錢業公所。

公估局估寶手續，分為秤量與秤色兩個步驟，秤量的人稱為管秤，秤色的人稱為看色。凡公估時先由一人將元寶的中央凹部拭淨，交與管秤者秤量，管秤者於秤量後，高聲連呼其重量，另由一人將所呼的重量，以墨筆用一種特別的字體，記入中央凹部。於是看色者本其經驗，憑其眼力，判斷其成色的優劣，以定其申耗的數量，優即申水，劣即耗水，申耗的多少，亦僅憑經驗及心目中的本位，作為標準。決定後，亦記入中央凹部。為預防塗改原批計，復用鐵印打記。升水等級約分三種，重量亦有一定標準，如上海公估局對銀爐新鑄的寶銀，最高的批申水二兩七錢五分，其次為二兩七錢，又其次為二兩六錢五分，如成色在二兩六錢半以下者不批。元寶每錠重量，以漕平四十九兩八錢為標準，凡過此重量者，每兩申水五分。若看色者對銀質有所懷疑，則用大錐打進其要害，以窺其內部是否有雜質，再聽其聲浪，以辨其真贋。各路運來的現寶，亦照通例批水，如低色的寶，耗水在一兩以外的不批，此項元寶，仍還客路，或須經銀爐改鑄提高成色後，始能重批。批寶手續極為純熟，每小時可以批四五百枚，自經公估局批明蓋印的寶銀，公估局即負無限的責任。上海公估局每估上海寶銀一錠，規定取批費規銀二分，每外路元寶一錠，規定取批費銀洋二錢四厘。故公估局收入的豐歉，全視批寶的多寡而定。（二七）

依上所述，可知寶銀的鑄造與鑑定，實具有若干優點，為銀兩制度存在的有力因素。但有兩

個極大缺點，即：（一）造幣權不統一，政府不能操縱控制，以劃一成色平砵，以致形成紛歧複雜的現象。（二）銀爐與公估局所批定的成色重量，儘管很精確，終屬限於區域，無益於銀兩制度的健全統一。這兩點實為銀兩制度的致命打擊。

## 六 對銀兩制度的幾點認識

總括以上各節所述，我們對於近代的銀兩制度，可以得到如下的一個概念。

第一，近代的銀兩制度，嚴格的說起來雖然算不得現代的本位貨幣制度，然而事實上我們不能不承認銀兩本位的存在，因為銀兩與制錢不是絕對的平行的。我們既不能認為是銀錢複本位制，更不能認為是制錢本位制。至於有些人說當時沒有本位貨幣，那更是不顧事實，先有成見，而忽視了歷史發展的程序。平情而論，近代的銀兩制度是一種本位貨幣制度，不過還沒有獲得健全的發展，所以它是不十分健全的，易於為人所誤解，而其所以不能獲得健全的發展，一方面是受了封建社會的制限，一方面又是受了列強侵略勢力的摧殘。倘使沒有十九世紀以來列強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使中國尚未脫離封建社會復又陷入於半殖民地狀態，則銀兩制度可能隨着封建社會的解體，而發展成為健全的本位貨幣制度，觀於咸豐年間上海因本洋稀少而九八規元能代之而起，成為一時的本位通貨，及道咸以後各地創鑄銀兩單位貨幣（銀圓）諸事實，足證銀兩制度之能發展成為本位貨幣，絕不是空談理論，其所以未得順利發展，乃因在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狀況之

下，無法與銀圓勢力對抗的緣故。

第二，近代銀兩制度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制限，未能獲得健全的發展，所以雖然取得本位貨幣的地位，終於沒有充分具備現代本位貨幣的條件。這就是說它始終還沒有完全脫却重量貨幣制度的原始性的色彩。但是決不能說它就是重量貨幣制度，這是必須分辨的，因為近代的寶銀經過公估局的批水以後，即可自由流通，不須隨時秤量及看色，這已經是相當進步了，有了這種進步性，纔能達成它取得本位貨幣地位的歷史任務，同時又因為沒有脫掉原始性的色彩，所以仍未能徹底的完成銀兩本位制度的歷史任務。

第三，近代的銀兩制度既然是未能健全發展的本位貨幣制度，所以就金屬的本位貨幣制度理論來說，其本身實存在着若干重大的缺陷：（一）形式不適於應用。各種寶銀均嫌過重，不適於日常使用，即三兩至五兩的小錠，也還有過重之嫌，所謂碎銀滴珠，雖說便於零星使用，但須隨時秤量看色，使用尤為不便。（二）名稱過於複雜。近代銀兩名義上雖以紋銀為標準銀，而各地使用，早有七成、八成、九成之分，加以各地又有各地的標準銀，甚至一地更有數種寶銀同時流通。此等複雜的名稱，即是表示幣制的不統一，亦即表示幣制的不健全。此外更有虛銀兩與實銀兩之分，更增加了銀兩制度的複雜性。不過此等虛銀兩的產生，另一方面還是含有進步的意義，可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限制之下，沒有能够作進一步的發展。（三）成色高下不齊。成色之不齊，是構成寶銀名稱複雜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地既依各地的習慣使用一種標準成色，甚或數種成色的寶銀並行於一地，計其類別，多至十餘種。各限地區，不能互相通用。（四）平砵大小不一致。

平砒的不一致，與成色同為構成名稱複雜的主要因素，而平砒的種類較之成色尤為紛歧複雜，總計不下數百種，大別之則有庫平、關平、漕平、市平四大類，而庫平有中央與地方之差，地方又有藩庫、道庫、鹽庫之差，關平有各關之差，漕平更無一定之標準，市平之繁瑣尤不可究詰。種類既多，又無一定標準，所以寶銀重量因地而異，加以各地成色不一致，遂形成種種不同的寶銀名稱，使各種寶銀不能全國流通，而銀兩制度亦遂無統一的可能。（五）計算的煩難。平砒不一致，計算已極煩難，而成色的高下，更使計算加倍困難，至於無直接行市的地方，必須採用間接匯兌的計算方法，其困難尤不可言喻。由此可見銀兩使用的如何不便了。上述五點都是銀兩制度的最大缺陷，此等缺陷之頑強地存在，一方面是阻礙了銀兩制度的健全發展，一方面給予了銀圓制度以發展的機會。

第四，近代寶銀的鑄造與鑑定，方法雖尚稱完密，但因造幣權不統一，銀爐與爐房祇助長銀兩的紛歧複雜，公估局的信用也祇限於一隅，無益於銀兩制度的健全與統一。

最後歸結一句，近代中國的銀兩制度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

〔一〕 班固：漢書食貨志。

〔二〕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三〕 同上。

〔四〕 同註〔一〕。

〔五〕 參看朱傑：中國信用貨幣史第一九〇頁引續通鑑各條。

〔六〕 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 〔七〕讀文獻通考卷十。
- 〔八〕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
- 〔九〕同上書卷十四，錢幣考四。
- 〔十〕同上。
- 〔一〕張公權：各省金融概略。
- 〔二〕耿愛德：中國貨幣論二五六頁。
- 〔三〕見楊蔭溥：中國金融論第八九頁，並參看馬寅初演講集：何謂九八規元？中國年鑑九八規元。銀行週報一二五期：上海之規元，三三一期：九八規元之由來，三六五期：規元之解釋及其計算法。銀行雜誌第一卷第十四號，九八規元歷史的考證與推測。
- 〔四〕參看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二編第四章，中國年鑑第八一四——八一五頁爐房。
- 〔五〕參看銀行雜誌第一卷第十六號：漢口洋例銀之歷史的觀察。
- 〔六〕參看清水秉次：清國貨幣論第三章第一節。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二編第四章。楊著中國金融論第二編第一章及第三編第二章。中國年鑑爐房條。上海銀行週報社：上海金融市場論第3428-32頁。銀行週報第十六期：記上海銀爐業。
- 〔七〕參看清國貨幣論：第三章第三節。楊著中國金融論：第二編第一章。中國年鑑：公估局條。上海金融市場論：第432-35頁。銀行週報第三十三期：記公估局。

### 第三章 近代的制錢制度

制錢在近代貨幣制度中，是和銀兩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制錢問題和它的發展，實為中國近代貨幣史的主要構成部分。這裏是就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論述：第一，從歷史上究明制錢制度的特質；第二，從鑄造方面推測各時代各地方的制錢流通量；第三，從貨幣政策上探求錢價變動的真相；第四，從制錢制度的缺點說明其消滅的原因。

#### 一 制錢制度的由來及其特質

近代的制錢制度具體的說起來，有如下的幾個特點：

- (一) 錢圓而函方，即是圓形方孔。
- (二) 按個數計算，即以個數為價值的標幟。
- (三) 制錢的價值仍和它的重量有不可分解的連繫。
- (四) 為無限法貨，即使用金額並無限制。
- (五) 政府獨佔貨幣鑄造權，人民私鑄者有罪。



(六) 幣面鑄年號，幣幕鑄局名。

這樣的制度乃是制錢制度最完整的形式，是在長時間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

制錢的歷史甚古，班固漢書食貨志及許慎說文解字貝字注，均說始於周朝，謂太公會爲周立九府圖法，其錢制卽『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其後周景王又曾鑄大錢。但不僅周初的錢，後人不能見，卽景王的大錢，漢人已不曾見。所以上面那些說法似尙有待證明，但錢圓函方的體制，創始於周代，却無可置疑。大抵春秋戰國之際，中國通用的貨幣約有四系：一曰錢，圓形方孔，周人所創行；二曰布，錠形，晉人所創行；三曰刀，刀形，齊人所創行；四曰爰，方形，楚人所創行。錢與布本爲田器，刀亦爲百工用具，因其爲金屬物且需用較廣泛，故逐漸變爲貨幣，爰則或係像井田之形而鑄造出來的。這幾種貨幣自形製上來講，要以錢爲便於流通使用。秦崛起西方後，本襲用周的錢制，及嬴政（始皇）統一中國，遂定錢與黃金爲全國通用的貨幣。肉好皆有周郭，自此以後，錢的重量及所鑄文字，雖各朝代都有變化，然形製大體無多變更。這是錢圓函方的形式之由來。

自有錢制以後，錢的使用卽以個數計值，不像黃金及其他金屬作貨幣使用時以『斤』以『鈞』計算，自昔相沿，未嘗稍變。這似乎是已經脫離了重量貨幣的階段，但錢的價值不過是幣材——銅的價值的代表，所以古代錢的面文都鑄着『半兩』『五銖』『四銖』『三銖』等字樣，用以表示錢所含銅的重量，這種錢當然算不得名目貨幣，實質上還沒有脫離重量貨幣。雖然有時候幣面價值與其所含銅質相差若干，但這種錢終久是不能通行的，制錢卽是一方面以個數計值，一方面

仍以所含銅質的重量爲幣值的標準，一釐字錢的旋鑄旋廢，即可充分透露此中消息，這是以個數計算及以銅質計值的歷史淵源。

我國金屬貨幣自有歷史以至銀圓制度產生前，始終即是金銀銅等幾種貨幣並行，而無主幣輔幣的嚴格區分。所以制錢也始終都是一種無限法貨，使用時並無數額的限制，我們不能一定說它是主幣，也不能夠一定說他是輔幣，制錢之所以與銀兩同爲無限法貨，其原因即在此。

我國古代貨幣鑄造，似採自由鑄造制度，這從刀布的形式及文字的紛歧上可以得到證明。秦統一後亦未聞有鑄錢之禁，嚴格的禁止私鑄，由政府專擅鑄造權，大約始於漢武帝的元狩五年之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自此以後歷代相承以至於清。

秦漢錢面文字但鑄錢值，如半兩、五銖之類，錢幕（背）概無文字，至南北朝時始有鑄年號於錢面的，但年號之外又加元寶或通寶等字，則始於唐李淵（高祖）的開通元寶，宋元明相沿不改，此爲清代制錢面文之所由倣。錢幕鑄字初則與面文同，或列數目字，及至宋孝宗乾道元寶錢幕文始鑄局名一字，如同字即係代表同安監。至明各省所鑄錢均鑄地名一字於錢幕，此即清代錢幕鑄局名一字之所由倣。至於幕文改用滿文，雖說清人創制，然實濫觴於蒙元鑄錢之用蒙文。

由上所述，可知清代的制錢制度都是因襲前代的遺制，這種制度的發生和發展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到了清初算是規模大備，及至近代便盛極而衰，逐漸趨於消滅。爲什麼制錢制度能够繼續存在兩千餘年之久？又爲什麼到了近代由極盛而趨於衰滅？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從制錢制度的本身去求解答，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究明制錢制度的特質。

關於制錢制度的特質，一言以蔽之，就是具有封建的區域經濟的特性。這種特性，我們可以就制錢制度本身來一一予以說明。第一，中國封建社會是以小農生產為經濟中心，較大規模的工業生產與通商貿易是不發達的，客觀的環境不需要完善的進步的貨幣制度，所以制錢得為無限法貨儼然類似本位貨幣，而又不能脫離重量貨幣發展成為名目貨幣。第二，封建社會在經濟上就是一種割據形態，不但形成一種區域的自給自足經濟，甚至一個區域內的各種工商業行會也形成若干獨立的經濟集團，它不需要統一的幣制，所以制錢的形式雖大體相同，而各區域所鑄的錢甚至不能互相通行，各地有各地的錢價，各地有各地的計算方法。中國社會自西周至鴉片戰爭前是長期的逗遛在封建制度之下，到了鴉片戰爭以後封建制度纔開始崩潰。制錢制度是具有封建的特質，所以能够互相適應，繼續存在了二千餘年之久，也正因為它那封建的特性，所以不能不隨封建制度的崩潰而趨於毀滅。

我們了解了制錢制度的由來及其特質以後，現在可以開始探求制錢制度的內容了。

## 二 制錢鑄造機關的分佈及其沿革

制錢的鑄造，在清代是政府的專利，民間不得私鑄或私燬，對於私鑄及私燬的罪犯，法律有嚴厲的制裁。

有鑄造權的機關，在中央有戶部及工部，在地方則有各省布政使司。戶部有寶泉局，工部有寶

源局，皆因襲明代的舊制，惟明代各直省鑄局皆得稱寶泉、寶源，清代則祇限於京局，至各省鑄局，在雍正以前名稱至爲複雜，有省局、有鎮局、有府局、有州局各冠以地名，如陝西省局、陝西延綏鎮局、直隸宣府局、湖廣荊州局。有一省數局，亦有數省無一局，如順治、康熙年間，山西太原既有省局，又有大同府局，直隸則有宣府局與薊州局，而安徽、四川則並無一局。這大約是由於當時還未脫離戰時狀態，各鑄局的開設，都是適應軍事上的需要的。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冬戶部議定各省祇准設一局，一面將臨清、宣府、薊州、大同、寧夏、江寧、漳州七局先後停廢，一面又依寶泉、寶源之例，將各省局名稱改爲一律以寶字爲首，次用各本省一字，於是每省一局之制乃定，而各省局名亦漸趨一致，無紛歧複雜現象，綜計雍正朝直省鑄局共十七局，十八省中僅寶直局爲乾隆朝所設，餘如寶伊、寶迪、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喀爾等局，雖均係乾隆以後所設，且名稱或不一致，則是因上述各地概屬邊疆，乾隆時始歸入版圖，而地名又不便截取一字的緣故。所以清代制錢的鑄造機關，在制度上，到了雍正朝纔算漸趨完備，雍正以後直至咸豐初年，這一百三十餘年之間，大體無甚變動。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因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範圍擴大，財政空虛，各地頗有不遵舊制增設鑄局，鑄錢充作軍餉。而當時各局又多係鼓鑄大錢，其後因大錢滯壅不行，各局亦多相繼停閉，同時因外國銀元暢行各地，制錢的需要量自亦相對的減少，故同治年間鑄局劇減。光緒初年有人建議恢復鑄造制錢，京師市面卽有騷動，可知各省鑄局未必能開。及開始鑄造銅元之後，各省都視爲獲利的捷徑，除寶泉、寶源二局而外，更沒有肯設局鑄制錢了，到了宣統初年僅剩京師寶泉一局，然亦恐祇是爲着維持局員、局匠生活，所以沒有裁撤。

依上所述，可知清代的制錢鑄造機關，是以雍正元年至咸豐四年（一七二三—一八五四）一百三十餘年間為制度最完整的時期，雍正元年以前約八十年間為紛亂時期，咸豐四年以後約五十年間為由紛亂而漸趨於消滅時期。

此等制錢鑄造機關，在名義上除工部所屬寶源局外，一律受戶部（財政部）節制，換句話說，戶部是鑄造制錢的主管機關，各省局應照順治九年（一六五二）的規定，各該管衙門（指布政使司）將鑄錢本息按季報部，以憑查核，歲終彙冊奏銷。但事實上未必一定照辦，各省局依然是各自為政的，至於工部所轄寶源局，則更屬例外。

茲將清代各錢局名稱所在地創立及停廢年代以及各朝開鑄局數，表列如上：（見『清代制錢鑄造局表』）

從這表中我們可以瞭解下列數事：第一，清代制錢鑄造局前後設立了五十六所，而未入關前天命、天聰兩朝鑄造滿文及漢字的兩種天命通寶、天聰通寶的鑄局，以及咸豐時專設的鐵制錢局均未列入，如果一齊算起來，應在六十所以上。第二，清代制錢局設立最早的，算是寶泉、寶源兩局，存在時間最長的也是這兩個局，而與滿清一代相終始的則祇有寶泉一局。至創設時間最晚的則為寶德、寶迪、庫車等幾個邊疆的鑄局，而在省局中則又以寶安局創設最晚。第三，以省區論，在順治年間直省中以山西、直隸、湖北等省所設鑄局為最多，計山西三局，直隸四局，湖北四局。乾隆以後則以雲南、新疆（當時尚非行省）兩省為最多，雲南前後共設十局，新疆共設八局。順治年間所以在直隸、山西、湖北等省多設鑄局，那全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而雲南與新疆之所以

多設鑄局，則完全由於經濟上的原因，雲南大量產銅，故多設局鼓鑄，以應各省之需。新疆雖銅產不豐，但因過去多用普兒錢甚或不用錢，所以亦須大量鼓鑄以應實際需要。第四，同光兩朝各省局相繼閉歇，僅餘京師的寶泉、寶源兩局，這是表示制錢制度的末運。第五，清代雖然在各省普設鑄局，但鑄錢的中心仍然在中央——北京，所以不惜用最大的力量向外洋購銅或由各邊遠省份採銅運到北京來，儘管把各省局停鑄，寶泉、寶源兩局是始終不停鑄的。而鑄錢數量之多，亦以該兩局爲最，這裏也充分的表現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特色。第六，清代鑄局最盛的時代爲順治、乾隆、咸豐三朝，這顯然是以軍事爲其背景。康熙、雍正、嘉慶、道光各朝，舊局多相繼停閉，新開的局雖亦間或有之，但爲時甚短。我們還可以看到在順治十四年至十七年（一六五七——一六〇）康熙元年至六年（一六六二——一六七），九年至十四年（一六七〇——一七五）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五），道光初年，咸豐初年這六次把全國各地鑄局都停閉了，尤足窺見盛衰的痕迹。第七，各地方鑄局開鑄年數最久的爲寶雲局一百四十年，最短的爲盛京局，恐未及開鑄即停。其餘如襄陽、鄖陽不過一年，漳州不過二年，台灣、延綏、涇益州不過三年，其不足十年的有六局。大抵各省局的開鑄年數均在九十年以上，寶濟局三十年則爲例外，而鎮、府、縣及其相類似的局則多在五十年以下，而東川府局之一一〇年與阿克蘇局之七十六年亦爲例外。

總之，這表可以使我們了然於清代制錢鑄造機關的數量，創設次第，分佈狀況及盛衰情形，從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制錢的鑄造，到了鴉片戰爭前後已漸趨衰退。至於咸豐時的廣開鑄局，都是鑄造大錢，根本與制錢鑄造無關。

### 三 制錢的鑄造與鑄額

從上節的敘述，我們已可約略知道制錢的鑄造，到近代已漸趨衰退，但制錢的鑄造過程特別是鑄造額的增減究竟怎樣呢？

制錢的鑄造，多用模型範鑄，只有光緒十六年曾一度在廣州用機器鑄造，但因制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故發行以後未得人民歡迎，壽命很短促。因此，這裏的敘述，也只以舊式鑄造為限。

關於制錢的鑄造過程與技術分工，王慶雲說：「凡鑄錢先鑿塊銅曰祖錢，乃鑄無文而環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函方而成制錢。凡鑄治之工八，曰：看火、翻沙、刷灰、雜作、到邊、滾邊、磨錢、洗眼，治之各以其序。」〔一〕清朝文獻通考裏說得更詳細，它說：「每爐設爐頭一人，其所需工價有八行匠役：曰看火匠，曰翻砂匠，曰刷灰匠，曰雜作匠，曰到邊匠，曰滾邊匠，曰磨錢匠，曰洗眼匠，例給錢文。所需料價，曰煤、曰罐子、曰黃沙、曰木炭、曰鹽、曰沖繩。又有爐頭紅銀、爐匠頭銀。……凡鑄錢之法，先將淨銅鑿鑿成重二錢三分者，曰祖錢，隨鑄造重一錢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制錢。每遇更定制錢，例先將錢式進呈，其直省開局之始，亦例由戶局先鑄祖錢、母錢及制錢各一文，頒發各省，令照式鼓鑄云。」〔二〕

由此可知制錢的生產組織相當嚴密，分工很細緻，已具有工場手工業的規模。但仍屬手工業生產，成品很粗陋，容易偽造，這也是制錢制度的一個極大缺點。

關於制錢鑄造的數額，缺乏完整的統計數字，從歷年各局爐座數及鑄錢卯數的增減，及一些不完備的有關統計，大略可以窺見其發展趨勢和大概的數目。

鑄錢的主要工具是爐座，爐座的多少可以決定鑄額的大小。其次清代鑄錢，以一期爲一卯，各局鑄錢，都規定卯數，雖各局每卯使用銅斤多寡不同，所鑄錢數亦有差異，但卯數的增減，仍不失爲推測鑄額的可靠依據。只可惜有關爐座及鑄卯的增減，記載也不完備。

根據現有的材料推斷，大抵：（一）在鴉片戰爭以前，先是北方各局的爐座最多，到了乾隆時代就以雲南各局的爐座爲最多，卯數的增減情形也是如此。（二）各地方鑄局的爐座時增時減，只有戶部的寶泉局、工部的寶源局是繼續增加，未嘗減少，卯數也各由二三十卯，陸續增加到七八十卯。（三）乾隆時代各鑄局的爐數和卯數都普遍增加，以後便不復再有這種盛況。（四）鴉片戰爭以後，只有在咸豐時代各局一度普遍開鑄大錢，以後制錢的鑄造即若斷若續。所以制錢的鑄造，要以乾隆時代爲極盛時期，鑄造權亦漸由各省集中到中央，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太平天國革命以後，能够經常維持鑄造制錢的，恐怕只有寶泉和寶源兩局了。

究竟當時鑄錢的實際數字是怎樣呢？據張家驥說：『順治初年大約年鑄總額爲二百萬緡，至十七年以鑄數過多，減至二十八萬緡，嗣後數十年間，每年鑄造總額，皆在三四十萬緡。至雍正五年，始復增至七十餘萬緡，九年百餘萬緡。嘉慶五年全國鑄造總額爲二百零五萬緡，道光十一年部定各省鑄數，仍照舊日規定。咸同以後，銅價飛漲，各省開爐鼓鑄數目，無從稽考。』（三）

據王慶雲說：『國初戶部年鑄三十卯（以萬二千八百八十串爲一卯），遇閏加三。康熙、雍正



兩朝各增十卯，乾隆六年增二十卯，次年增勤爐十座，年鑄六十一卯，得錢六十九萬餘串，十六年以後因餘銅加鑄，至三十年定爲七十五卯，歲得錢九十三萬串有奇，末年裁勤爐，復銅六鉛四之制，仍爲三十卯。嘉慶初年漸復。五年設倅爐，鑄搭京倅，後銅鉛不敷，亦旋減旋復。自國初以來皆戶部鑄二，工部鑄一，今則例寶泉局正爐之外，有勤爐、倅爐加鑄，歲出錢百十三萬串，閏加四萬串。寶源局有勤爐，歲出五十三萬串，閏加四萬串，各有奇。」〔四〕

從這段紀載可以窺見乾嘉道三朝一部份鑄錢數字。這三朝各省鑄局多經開鑄，尤其是乾隆朝各地鑄局最多，開鑄的卯數及期間亦最多最長，按照京局的比例，則總鑄數當遠在過去各朝代之上。王慶雲亦說：『近日鑄錢之數多於往時。』他又說：『今則各省局出錢歲額，除山東、河南、安徽、甘肅久已停爐，餘省歲共出錢一百一十一萬餘串。白銀價愈昂，錢本愈貴，大半皆停爐減卯。』則是照例規定，中央與地方總鑄額在道光時應有二百七十七萬串之多。他解釋所以多鑄的理由是：『一由生齒日繁，多一人即多一人之用。且昔之食時用禮者今或踵事增華，流轉之數愈多則錢少。一由銀貴市票盛，一兩之銀可以易兩串之票，市肆雖以票易銀，不得不蓄錢以待用，而冒禁私銷者尚不在此數，此所以鼓鑄日多而流通日少也。』〔五〕

至於各省的鑄造額，我們可以舉出下列兩個表，作爲參考。一個是嘉慶五年戶部的規定，一個是同治四年的鑄造額。

嘉慶五年戶部制定各省每年鑄造額表（單位串）〔六〕

省別	鑄造額	省別	鑄造額
北 京	八九九, 八五六	廣 西	二四, 〇〇〇
直 隸	六〇, 六六六	雲 南	九四, 八六〇
江 蘇	一一一, 八〇四	雲 南	九四, 九二四
江 西	四一, 九二八	貴 州	九四, 八六〇
浙 江	一二九, 六〇〇	山 西	一七, 四七二
湖 北	八四, 〇〇〇	湖 南	四七, 八八〇
陝 西	八七, 三六〇	伊 犁	一, 一二二
陝 西	附加 四三, 二〇四	廣 東	三四, 五六〇
四 川	附加 一七九, 二五九	合 計	二, 〇五二, 二一九
四 川	附加 一四, 八六八		

同治四年各省鑄局所鑄制錢數額表（單位文）〔七〕

地 點	產 額	地 點	產 額
北 京	八九九, 八五六, 〇〇〇	西 安	九四, 五八九, 〇四〇
北 京	四四九, 九二八, 〇〇〇	成 都	一五七, 七三三, 三三三
保 定	六〇, 七五六, 八四〇	廣 州	三四, 五六〇, 〇〇〇
太 原	一七, 四七二, 〇〇〇	桂 林	二四, 〇〇〇, 〇〇〇
蘇 州	一一一, 九九二, 〇九二	雲 南	一二五, 六八二, 四八〇
南 昌	四二, 〇三七, 九九二	騰 衝	四四, 八八六, 六〇〇
福 州	四三, 二〇〇, 〇〇〇	貴 陽	六七, 三二九, 九〇〇
杭 州	一二九, 六〇〇, 〇〇〇	大 定	二二, 四四三, 三〇〇

武昌	八四, 四二〇, 〇〇〇	伊	一, 一三三, 〇〇〇
長沙	四八, 〇五四, 〇〇〇		

前表是滿清政府的規定，當時鑄造自未必一定遵照。後表是布許 (W. S. Bushel) 對同治四年制錢鑄額的統計數字，不知究何據，依據我們的研究，咸同年間各局多鑄大錢，且在同治時大錢亦多停鑄，上述數字不無可疑。但綜合各方面資料看起來，在鴉片戰爭前後，制錢的鑄額每年似尚在二百萬串以上。而各省區制錢流通量的大小，也可以從上列兩表中獲得一個梗概。

#### 四 制錢的貶值

貨幣有流通手段的職能，即是在流通過程中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而貨幣之所以能很好地完成此一般交換媒介的職責，固然由於它能化直接交換為間接交換，而主要的還在它能保持其固定價值，具有價值尺度的職能。貨幣價值不穩定，則物價波動，而國計民生均將蒙受惡影響。所以統治的剝削階級往往一面有意識地減低鑄幣的重量和成色，使其貶值，一面又不得不採取措施以圖穩定幣值。制錢為清代主要的流通貨幣之一，又是滿清政府專利的鑄幣，滿清統治者經常用鑄造制錢來剝削廣大的勞動人民，即是有意識地減低制錢的重量和成色，使制錢貶值，這種情況從清代有關錢幣的制度和法令中已充分表現出來。如順治、康熙兩朝制錢每文重量即屢次變更，順

治初年先是每文重一錢，旋改爲重一錢二分，再改爲重一錢二分五釐，皆以七文準銀一分。十年（一六五三）改鑄一釐錢，以十文準銀一分，仍然行不通，不得不改鑄重一錢四分。到了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便藉口『錢貴』多『私熨』，改鑄重一錢，但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復被迫恢復重一錢四分的舊制。雍正十二年（一七二四）又改爲一錢二分，自此以後，在制度上重量雖無變更，但由乾隆時起即變更成色，改鑄青錢。僅僅就這些法令上的變化來看，已足夠說明滿清統治者是如何地在利用貨幣貶值來剝削人民了。可是誰也知道這些法令都是騙人的，不僅各省局所鑄錢文的重量成色，多不按照規定，就是中央的寶泉、寶源兩局也公開的有所謂『局私』，隨時隨地都在減低制錢的重量成色，現存的清代大量錢幣實物，便是無可置辯的鐵證。這種情形到了嘉慶、道光時期更日趨嚴重，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御史王家相的奏疏裏說道：『近日江蘇寶蘇局所鑄官錢，銅少鉛多，而以官銅偷鑄小樣錢，每錢一千不及四斤，民間號爲局私。自蘇、松至浙江、江西，流通寢廣，以致銀價日貴，官民商賈均受其累。』〔八〕這已經直接了當地指出了當時制錢的貶值，是由於減低重量成色的結果。王慶雲說：『由是錢價一賤，近三十年即不復貴，至今日每兩易錢二千，較昔錢價平時蓋倍之，較賤時幾及三倍。屢經調劑，未睹實效，殆所謂勢之所趨，未易以文法禁者乎。』〔九〕可見當時錢價之普遍降落，主要均由於制錢貶值，而制錢鑄造之減低重量成色，也絕非江蘇一省的局部現象。只是因爲到了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對外貿易的發展，加強了銀兩的主幣地位，同時因爲現銀大量外流，造成嚴重的銀荒，銀價問題已成中國貨幣問題的中心，制錢則逐漸退居於次要地位了。

## 五 制錢的種類及其計算方法

制錢在理論上原只有一種，但實際上則種類繁多，因為「制錢原定爲官鑄，私鑄或私燬者皆以重罪論，然實則私鑄者仍不絕也。咸同以後，此風尤熾。加以官鑄之錢有古錢、今錢之別，今錢之中又有各朝之錢輕重不等，以致市面行使，紛亂已極。吾人所知者，官鑄有樣錢（北京官局鑄出之錢）、制錢（各省官局鑄出之錢）、白錢（色稍帶白）等各種，皆形大色美。私鑄則有所謂沙亮、風皮、魚眼、老沙板、毛錢、灰板、鵝眼、水浮等名目，蓋皆薄而小，雜以土砂銅鉛錫，而鑄造者也。人皆夾此小錢於制錢中以充用，而錢之市價，錢之名稱，亦因此私錢混夾之多少，而大有分別。曰大錢（盡制錢也），曰清錢（同上種），曰毛錢（千中夾百個私錢），曰一九錢（千中制錢九百私錢一百），曰二八錢（千中私錢二百），曰三七錢，曰四六錢，曰對開錢，曰例四六錢（皆視私錢之多少而別者也），曰卡錢（悉制錢納稅釐之用者也），曰典錢（大錢當舖中所用者），曰冲頭（百中私錢五六個），曰衣牌（衣服店用），曰醬錢（醬油商用），曰紅錢（紫大錢），曰青菓錢（形其兩頭尖小也），曰當頭砲（每串兩頭夾小錢兩三個），以上所舉者，固不各地盡同，然其紊亂之甚，可想而知矣。」（二）同時官鑄也有不按定制的，康熙時即曾鑄有康熙小制錢，當時名之爲京墩，其重量自八分至一錢，本以二文作一文使用，後來天津地方所謂京錢二百，實只制錢一百，即係這種錢制的遺留。（三）

由上所述，可知制錢種類之繁，兼可知造成此種繁雜的原因，是由於（一）民間私鑄小錢，（二）官鑄有古錢、今錢、大錢、小錢之別，（三）今錢又有各朝錢輕重之差。其實私鑄亦不盡出於民間，京局爐頭匠役即有藉名官鑄而夾鑄私錢，即所謂「局私」，順治、康熙年間雖迭經嚴禁，終究不免。而今錢則又不僅各朝錢有輕重之差，各省局所鑄即多不依定式，如湖北、湖南兩局所鑄昌字錢及南字錢，於康熙二十六年即以式樣輕小受到嚴厲申斥，到了三十六年復經戶部認為色紅不堪行使，下令禁止，照小錢例依限交收。

制錢一般的計算法，均係採用十進制，例如銅錢一個，叫做一文，百個叫做一百文，千個叫做一串，或叫做一貫，又或叫做一吊，吊以上則有十百千萬吊等名目。然社會上往往不依此計算，而另起計算法，如直隸一帶以一百文稱為一吊，東三省方面以一百六十文稱為一吊，其餘各地，則又有以五百文為一吊，四百八十文為一吊等，各隨其地區和習慣而有所不同，原無確定的標準。茲將全國各地制錢每吊枚數及名稱列表於左：

全國各地制錢每吊枚數及名稱表

每吊枚數	名稱	行使地區	每吊枚數	名稱	行使地區
九九八文	九九八錢	南方	九〇〇文	九扣錢	宜春
九九七文	九九七錢	長沙岳州	八八〇文	八八錢	豐鎮之西北地方
九九六文	九九六錢	安縣屯溪	八二〇文	八二錢	太原
九九五文	九九五錢	江西清江	七二〇文	七二錢	龍駒寨
九九四文	九九四錢	山西	七〇〇文	七扣錢	陝西

種類既有差別，價值自各不相同。同在一地，同屬制錢，使用時即須有極豐富的常識，否則必至隨時隨地感到困難，而且各種錢又不盡能到處通用，使用時尤多不便。加以各地計算方法不同，換算起來又極其麻煩。這種情形不但充分的表現其封建的區域特性，足以阻礙全國金融商業的發展，甚至對於一個區域內的金融商業的發達，也是一種桎梏。這是制錢制度的極大缺陷，也就是制錢制度消滅的主要因素。因為一個健全的統一的貨幣制度，是不允許有這樣紛歧複雜的種類和計算方法的，而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迫切地要求有一個健全統一的新貨幣制度。

## 六 制錢制度的消滅

制錢制度的開始崩潰，可以追溯到咸豐四年（一八五四）的始鑄大錢，從那時起制錢的鑄造大減，各省局似從未再開，京局在同光宣三朝雖續有鑄造，但為數實微。晚清之際，制錢在一般

九五〇文	九六〇文	九七〇文	九七四文	九八〇文	九八四文	九八六文	九九〇文
九五錢	九六錢	九七錢	九七四錢	九八錢	九八四錢	九八六錢	九九錢
南昌	豐鎮	湖北	九江蕪湖	長江一帶最為通行	重慶	安徽歙縣	
一〇〇〇文	一〇〇〇文	一六〇文	三二〇文	三三〇文	四八〇文	四九四文	五〇〇文
滿錢	小錢	小錢					中錢
	京兆直隸	東三省	張家口	直隸懷來		長春	直隸、山東、吉林

人民生活上，雖尚不失其重要性，而在商業金融上則已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光緒時代，理論上制錢已成爲必須改革的對象，及至庚子義和團運動之後，各方鑒於國勢危弱，乃競尙新法，希望藉以圖強，幣制改革的時機遂漸趨成熟，停鑄制錢改鑄銅元的計劃也就在這時候確定了。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廣東首先開鑄銅元，明年沿江沿海各省奉令仿鑄，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財政處戶部奏定『整頓國法章程』中對於銅元即有明文規定，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幣制則例』對銅元種類規定更爲詳密，於是制錢制度雖未經明令廢止，但已不被置諸現代貨幣之列了。制錢制度至此即告正式消滅。

制錢制度的消滅，首先是基於一定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鴉片戰爭後國際貿易的擴大，以及國內經濟情勢的激劇變化，資本主義業已開始萌芽和發展，是構成制錢制度毀滅的基本原因。由於這種社會經濟情勢的演變，暴露了制錢制度的弱點，進而迫使其趨於毀滅。其次則當從制錢制度本身的缺點上去尋求其毀滅的具體原因。這裏我們可以先引用意德勁（J. Edkins）的一段話加以說明，他說：『中國幣制的紊亂情形，實爲西方各國所未有，譬如制錢之授受，全無確數可憑，謂爲千文或百文，而確數並非一千或一百，而爲千數或百數以下之某數，其數究爲幾何，惟於此道有經驗者始能知之。又於某地有一錢作爲二文者，譬如某君得錢五百文，實際彼祇得錢二百五十枚，並須再扣去當地之貼水，其貼水數額，則又隨地不同。凡成串之錢，其間必有小錢或私鑄之錢雜入，授受時爭執每不能免。有時地方官吏，間亦發通告禁止行使偽錢，但結果使商賈間徒增紛擾，每經一度禁止，則物價漲高，劣錢暫時絕跡，不久復流用如常，而物價則漲後不復跌落。』



凡優幣與劣幣同時在市面流通，優幣必為劣幣所驅。此種現象在中國隨時可見，於是市面上流用之制錢，愈趨愈劣。譬如在河南省某數區域，凡入市場購取貨物，必同時攜帶二種不同之制錢，一為普通優劣二種相雜者，一為純粹劣錢。某種貨物專以劣錢付值，某種則以優劣相雜者付之。試思用此方法購貨，其不便為何如？」又說：「制錢一物即以其本身論，行用亦極不便，每五百或一千（實際不及此數）束為一串，其繩索多脆弱易斷，偶一不慎，繩斷則錢散滿地，重行計數束縛，極煩煩費時。制錢之重量並無標準，但大都笨重異常，每墨幣一元合制錢之數，約重八磅有奇，通常每人隨身所攜帶者至多不過數串，若耗用數額在數串以上，則如何輸送，即成一重大問題。若用寶銀，則沿途輸送，損耗萬不能免，且所損之數甚鉅。若普通人民用寶銀買賣商品，結果十九被欺，若改用錢鋪所發之現銀票據，使用時困難仍不能免，蓋甲地所發之票據，在相距不遠之乙地，或絕對不流通，即能流通無阻，其折扣必鉅，而收用者持赴原鋪兌現時，對於兌付制錢質地之優劣，又必起極大爭執。」（三）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發現制錢制度所以消滅的內在原因，還有以下幾點：（一）計算方法不一致，各地有各地的計數方法，非精於此道者不能知，這參看前節更可了然。（二）偽錢充斥市面，按照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市面流通的制錢必愈趨愈劣。（三）種類極繁雜，既因制錢每串攪入小錢的多寡而有種種不同的名稱，復因場合之不同而異其使用習慣，這也可以參看前節。（四）價格紛亂，銅價的漲落已足影響錢值的平衡，加以各地錢價根本不能一致，即同在一地，各種錢的市價又有很大差異。（五）使用時極其煩難，首先須知道錢的種類，又須知道各地的計算方法，

尤須攜帶各種不同的錢。(六)攜帶不便，價值一元的制錢，已不便隨身攜帶，若攜帶較大的數量到較遠的地方去，其不便自可想見。這許多缺點，首先是影響到物價的穩定，使人民的生計和國家的財政俱受其困。其次便是影響通商貿易的進行。不過在從前封建的區域經濟時代，各區域之間的貨物供求不急切，經濟往還較疏，因而這許多弱點的暴露也不十分劇烈，這是因為：第一，少與他處往來，所以不甚感計算方法不一致的痛苦；第二，私錢的取締，政府還可以執行，收取相當的效果；第三，種類的煩雜亦漸習以為常，不覺得煩瑣；第四，錢值不穩定，普通人民本不如商人反映那樣敏銳，而商人少與他處發生經濟往還，則各地錢價不一致，商人亦與普通人民同樣不甚感煩惱。至於本地各種錢市價的不同，則亦習以為常；第五，攜帶雖小有不便，但無大不便，因為較少『輦重就遠』的機會。由此可知制錢的種種缺點雖早已存在，但由於時殊勢異，往昔的程度並不甚劇烈，及至鴉片戰爭以後，對外門戶洞開，國際貿易日益發達，而隨着出口貿易的增大，國內區域經濟亦漸被打破，社會經濟完全改變了舊來面貌。於是制錢的種種缺點盡行暴露，而至於不堪忍受。一方面新的社會經濟情勢迫切地需要產生新的幣制，另一方面外國現代貨幣流入中國，供給了中國人民以進步的貨幣知識，又促進了其對於制錢制度改革的要求。這便是制錢制度消滅的具體原因。

〔一〕王慶雲：石渠餘記卷五，記制錢品式。

〔二〕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

〔三〕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九十五頁。

- 〔四〕 石渠餘記卷五，記戶部局鑄。
- 〔五〕 同上。
- 〔六〕 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九十六頁。
- 〔七〕 耿愛德：中國貨幣論第四一一頁引。
- 〔八〕 皇朝政典類纂卷六十四。
- 〔九〕 石渠餘記卷五，記銀錢價直條。
- 〔一〇〕 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二編第五章。
- 〔一一〕 參看鍾大煜：擬請變法鑄錢疏。
- 〔一二〕 耿愛德：中國貨幣論中譯本第三八八頁。

## 第四章 太平天国革命運動與清代幣制的變革

咸豐時代是繼承鴉片戰爭及道光時期銀價高漲之後，清代的幣制到此已臨崩潰的邊緣，太平天国革命戰爭的大規模地爆發，更加速了它的崩潰，結果使滿清的幣制起了激劇的變化，從而開始了晚清貨幣制度的混亂時期。革命政府雖因始終忙於軍事，新的貨幣制度未曾系統的制定，但在革命政府統治地區，貨幣與物價一般都還穩定。只有在滿清政府統治地區，貨幣問題才如洪水氾濫，吞沒了一切。所以儘管太平天国革命運動被內外反革命勢力勾結起來鎮壓下去，但被革命運動摧毀了的落後的貨幣制度，却再也不能重新建立起來了。

這裏除概述太平天国一代的幣制，以見革命政府因時制宜的創制外，着重在說明太平天国革命期間滿清幣制的變革，以闡明中國近代貨幣史演變的實跡和它發展的趨向。

### 一 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

太平天國的貨幣制度，有關的文獻記載中很少述及，因此頗引起人們懷疑太平天国是否曾經鑄過錢，而合肥陳雲章的劫灰集所載詠太平軍制度十首中，詠鑄錢一首後面註裏說：「太平天国

鑄錢不成，搜取古太平錢佩腰，競相誇耀。」便更加深了這種懷疑。可是太平天国所鑄錢，今天還大量的保存下來，那麼，曾經鑄錢，當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陳雲章所說的可能是合肥一時一地的情形，其他文獻未見記載，也止能說是史料殘缺，都不能據以斷定太平天国未嘗鑄錢。太平天国文獻未被發現的一定還很多，以後倘有新史料發現，也許會得到有關幣制方面的記載。不過，即使一時覓不到可靠的記載，我們也可根據這些遺留下來的實物——太平天国錢幣，來尋出一代幣制的大略，這裏即是根據我所知道的材料，給太平天国的貨幣制度畫一個輪廓，疏漏之處，當然是在所不免的。

太平天国一代的貨幣制度，據我們所知道的有金幣和銅錢。

據中國貨幣論的作者耿愛德說：太平軍『定都金陵時，曾發行金幣一種，形似中國之古錢，幣面不標明價額，估計似爲銀二十五兩。』〔一〕這種金幣的真實形狀究竟怎樣，因未見實物，暫時還不能作具體的說明，它的性質是通行的貨幣呢？抑是紀念幣呢？也無從推斷。或者是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後，把沒收得來的黃金鑄成金幣，作爲對外通商貿易之用也未可知，所以外國人後來還看得到這種金幣。不過，這種金幣想來鑄造不會很多，使用也不會很廣。

在太平天国幣制中，比較可以詳細一點敘述的是銅錢。銅錢有大錢和小錢的區別，保存下來的很多，據耿愛德說：『洪秀全嘗發行制錢八種。』〔二〕但據丁福保的歷代古錢圖說，實際還不止八種。小錢有『太平天国聖寶』錢，面文鑄『太平天国』，背文鑄『聖寶』，也有鑄『太平聖寶』於正面，而鑄『天国』二字於背面，或鑄『天国聖寶』於正面，而鑄『太平』二字於背面。

其次，兩面所鑄文字的次序也不一律，以正面鑄『太平天国』背面鑄『聖寶』一種來講，『太平天国』四字，有『太』字在上，『平』字在下，『天』字在右，『国』字在左的，也有將『太平天国』四字從左向右順序鑄的。『聖寶』二字，有上下對鑄的，也有左右對鑄的。其餘可以由此類推。但有兩點是完全相同的，即天国的『国』字不作『國』，『聖寶』不作『通寶』。這是由於洪秀全認為国是王者之国，故改為從口從王，又以爲萬物皆上帝所有，故稱軍隊爲『聖兵』，倉庫爲『聖庫』，錢幣稱爲『聖寶』。小錢中有『平靖聖寶』錢，背文有『前營』『後營』『左營』『右營』『中營』及『御林軍』『常勝軍』等字，有人說這種錢是太平天国四年（一八五四）岳州之役，太平軍大敗曾國藩，平服靖港後紀念功勳所鑄，用來賞給有功將士，所以這一類的錢多流佈湘鄂及長江流域一帶地方。〔三〕不知是否正確。大錢種類有類似咸豐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各種，面文及背文格式與太平天国聖寶小錢略同。此等小錢及大錢，銅質及鑄工都比滿清所鑄的咸豐錢精美，這可能是因爲太平軍據有江南財富之地，又實行軍事共產制度，所以財政狀況沒有滿清那樣窘迫。至其所以於小錢之外亦兼鑄大錢，或者是爲了抵制咸豐大錢。當時鑄錢之權似不限於『天京』，辦泉臆說謂『逆黨各自擅鑄』，或者是對的。因爲在戰爭期間，各將領就地鑄錢以供軍用，亦事理之常，所以衡陽傳說曾設有鑄爐。

綜上所述，可知（一）太平天国的幣制係摹倣清朝的制度，至於『銀兩』一項本來不是官鑄，自然也依舊通行。（二）從銅錢的質料及鑄工上，可以窺見太平天国的財政實遠較滿清富裕，這是否與它的經濟制度有關，很值得研究。〔四〕

## 二 咸豐時代的大錢制度

### 甲 大錢鑄造的歷史背景

大錢的鑄造，在中國歷史上向來就是表現貨幣制度的病態，而不是一種正常的發展，它總是在戰亂不已民窮財盡的時候出現。王莽之鑄大錢五十二品即係救濟西漢末年財政的匱乏；三國時蜀鑄大錢直百，吳鑄大錢五百，大泉當千，乃應戰時的需要。唐肅宗鑄當十的乾元重寶錢和當五十的重輪大錢，是藩鎮變亂期間一種財政緊急措施，金完顏璟（章宗）泰和四年鑄泰和重寶當十大錢，這顯然是用作侵略中國的本錢。明洪武初鑄錢分五等，大錢有當十、當五、當三、當二四種，天啓間又有當十、當百、當千三大錢，這也是開國之初與衰微之季財政竭蹶的表現。所以大錢的鑄造，總是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國家財政匱乏，則是一個共同的因素，因此它始終不能成爲一種正常的幣制，而只是作爲膨脹通貨的手段。

滿清在未入關以前，似曾鑄大錢，倪模古今錢略中收有滿文天聰通寶當十大錢一枚，可資佐證。入關以後未嘗鑄大錢，大約他們掠奪所得，尙足支給初年戰費。其後休養生息，國庫充裕，民間亦稱富饒，故乾隆一朝雖征戰不已，而財政猶不虞不給，無須乞憐於通貨膨脹。惟自嘉慶以降，國勢日替，連年水旱爲災，人民既不堪天災之苦，加以吏治益壞，人民復重受苛政之虐，天災人禍互爲因果，災侵洊至，遂激成白蓮教、天理教等大大小小的農民暴動，滿清政府在水旱爲

災吏侵蝕財政收入急劇減少的情形之下，又須增加支出鎮壓人已起義的巨額軍費，所以財政日趨窘境。道光時天災人禍未嘗稍減，各地暴動亦時有所聞，加以鴉片戰爭耗去巨額賠款，國家財政至此遂陷於山窮水盡之地，即使沒有特殊的變故，已是左支右絀，何況又接着爆發了太平天国革命戰爭，滿清政府當然再也無力支付如許龐大的軍費了。戰爭蔓延，戰區擴大，正常收入且急劇減少，靠租稅來籌措戰費自不可能，於是膨脹通貨遂與賣官鬻爵同被視為有效的戰時財政政策了。這便是咸豐朝鑄造大錢的主要原因。

不過，問題還不是這樣簡單，在當時的貨幣制度的本身，還有兩個促成大錢鑄造的重大因素，是我們所不應當忽略的。

第一、是嘉慶末年以來銀貴錢賤的趨勢。當時銀錠係自由鑄造，制錢鑄造則係政府權利，這種銀貴錢賤的趨勢，對於政府極端不利，即使不為籌措戰費，亦勢必要改鑄大錢以資彌補。

第二、是銅價日益高漲的影響。銅價的昂貴，逼着制錢制度走向末路，而把這個問題和銀貴錢賤問題聯合起來觀察，也就更充分地看出其嚴重性。由於銅產的缺乏，清代鑄錢先是仰給自日本及南洋各地輸入的洋銅，乾隆時則大半仰賴滇省的出產，但自嘉慶以後因銅的收購政策與人事管理的不善，滇銅出產日漸萎縮，不但銅價日昂，而且不能供給需求。因此制錢鑄造成本激增，復受事實限制不能大量鑄造以應社會需要。且官錢多被銷燬，私鑄小錢充斥市面，法令不能禁止，遂使制錢制度無法維持。一方面銀價日貴錢價日賤，一方面銅價日貴制錢成本日高，這種矛盾的發展，逼得滿清政府不能不從增大幣面價值來謀幣制的出路。



有了上述兩個幣制本身的重大因素，再加上戰時財政的迫切需要，於是大錢便應運而生了。

## 乙 大錢制度的醞釀

由於上述的種種因素，所以大錢制度在其實現之前已有若干時期的醞釀。遠在嘉慶年間（大約在嘉慶十年白蓮教起義期間，財政問題嚴重之後），就有一位許畫山曾上請鑄大錢疏，擬定了十條實施方法，主張鑄大錢分當千、當五百、當二百、當百四等。陽文左當右重，陰文一律鑄『嘉慶通寶』漢文楷書。令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作五錢，當二百作二錢，當百作一錢。他最重精選銅質，主張用高價收買民間的紅銅，每斤給紋銀六兩，即民間交銅一斤，官給當千大錢三枚（三兩）當五百大錢六枚（三兩）。他計算銅一斤可鑄當千大錢八枚，除去工料四錢，運銅腳費五分，運錢腳費五分，銅價六兩，尚可餘一兩五錢。（五）他這種辦法，完全在於替統治的剝削階級增加財政收入。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左右，廣西巡撫梁章鉅又曾奏請鑄大錢，及調江蘇巡撫後復在告疾謝恩摺內重申前議，奏留中未發，更私擬一稿以備續陳，因部議現在錢法無庸更張而止。（六）二十二年十月山東監察御史雷以誠上變通錢法摺，以錢與銀比率相差懸殊，主張增鑄一兩大錢，當作百錢之用，和制錢相輔而行，既可以平銀價，又可以濟財政的窮困。這些人的主張均未見採納。

道光二十四年，滿清政府曾令陝甘總督富呢揚阿等體察陝西、甘肅情形，倣照新疆所通用的當五、當十的錢文（即普爾錢）鑄造行使，但據實際考察結果，此等錢文在當時僅新疆南路八城通行，帶至東北各城，每個止作一文使用，不能當五、當十，且係淨紅銅鑄造，倣鑄反增工費。因

此這局部試行大錢的計劃乃暫時擱置。二十六年八月安徽巡撫王植請變通錢法，改鑄大錢，自當三至當五十爲五等，旋爲戶部駁斥。（七）

當時這種種企圖之所以終歸幻滅，當然是由於客觀條件尚未具備，即太平天国戰爭尚未爆發，滿清政府的財政尚未到極端緊迫的時候。及至戰爭爆發以後，三年之間即支出軍費二千七百餘萬兩，財政的困窘達到了極點，於是有的主張令「京師商賈均輸」，有的主張「酌收商稅」，有的主張「按戶輸錢」，有的主張實行「鈔法」，也有的主張鑄行大錢，總而言之，都是爲了救濟財政恐慌。這時滿清政府先後施行了捐納政策並停發一部份官吏的薪俸與養廉，作爲緊急的財政對策，祇是這些還不能完全解救財政的危機，猶有另行設法之必要，於是鈔法與大錢都被列入了議程。咸豐二年四川學政何紹基曾奏請「鑄用大錢，以復古救時」，被批「交戶部存記，若有可行時，不妨採擇入奏。」這顯然是表示政府已有意採行，不過阻遏於若干人的反對，還有點猶豫罷了。隨着戰爭的發展，不久以後終於是實行了。大約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京局即開始鑄大錢，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寺卿恆春請鑄咸豐重寶，自當十至當百爲止，五月二十九日給事中吳若準亦請鑄大錢，大錢的鑄造大約就是這樣促成的。可是在大錢正式開鑄之後，即同年十一月，戶部左侍郎王茂蔭復上奏反對，他本是主張行鈔法而反對鑄大錢的人，咸豐元年九月他在條議鈔法摺中即稱「計鈔之利不啻十倍於大錢」，他又根據他的歷代大錢興廢節錄大略，證明行大錢「未有三年而不改變廢罷者。」這時候他仍舊堅持他過去的主張，奏陳大錢的利弊，清政府雖覺其爲「老成之見」不無可取，無如軍需浩繁，非此莫辦，總覺得「大錢之暢行與否，全視在上之信與不信，果能設法預籌

爲經久之計，不先自壞成法，斷無隔閡之理。』〔八〕斷然不顧他的反對，繼續推行鑄大錢政策。

大錢制度經過四十餘年的醞釀，至此始正式產生，從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上看，我們不難明確地知道其產生的原因，是半由於統治階級的剝削要求，半由於戰時財政的影響，這正顯示着咸豐時大錢制度的特質。

### 丙 大錢制度的演變

太平天国革命戰爭爆發於道光三十年，不到三年太平軍便攻下南京，革命勢力遍及長江流域各省，由於戰局急劇發展所給與滿清財政及一般國民經濟的影響，反映在貨幣上面的，是一方面銀價繼續高漲，錢價繼續下落，一方面銅愈益缺乏，滇省額運銅斤不能如數如期運到，銅價上漲自不待言。因而不但民間多銷燬制錢私鑄小錢，即官局亦1偷工減料夾鑄小錢，小錢充斥市面，錢價愈益低落，這是戰爭開始三年間的一般貨幣情況。所以到了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滿清政府便因不堪幣制的困擾與財政緊迫而斷然的實行鑄大錢了。

當時所擬議的大錢制度是『當千大錢以重二兩爲率，以次遞減，期於輕重相權，便民利用。所有當千、當五百大錢，均用淨銅鑄造，務使磨鑄精工，色澤光潤。當百、當五十、當十、當五大錢，亦須配鑄精良，一律完整，與制錢相輔而行，俾民間咸知寶貴，便於行用。』並令戶部『通行各直省督撫均照此次所定分兩，一體鑄造，以歸劃一。其民間應納稅課錢文等項，均照部議，准以大錢交納，其應交銀者，並准其按照制錢兩串折銀一兩之數抵交，總期上下相信，出入均平。』〔九〕這是裝璜門面的鑄用大錢計劃的大略。至其實施的情形，却有很大的出入，基本上沒

有照這樣執行。從大錢制度實施的經過中，我們可以窺見其演變的實際情形。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首先開鑄的是當十大錢，這大約還是試驗性質，因為戶工兩局鑄數不多，且幣面價值尚不過大，所以還能勉強發出，七月乃更鑄當五十大錢。同年十一月遂按照上述擬定的計劃，諭令各直省推廣鑄造大錢。一面又於四年正月鑄當五大錢，二月開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三月開鑄當十鐵大錢。大約不出一年之間，計劃中的自當五至當千各種大錢都前後開鑄了。京城裏鑄造大錢的機關，除寶泉、寶源兩局外，又准慶惠、文瑞等於咸豐四年三月捐銅設立了一個專鑄當百以下大錢的錢局。而外省則有福建、陝西、雲南、熱河等處先後設局開鑄，大錢的鑄造到了咸豐四年可算是極盛時期，可是，同時也就是大錢制度危機四伏的時期，從此即進入極悲慘的境地。當千、當五百的大錢『以折當過多，私鑄益衆』，『甫經發行，即形壅滯』，不得已於四年七月下令停鑄，自開鑄至停鑄，前後不過五個月而已。當百以下的大錢，也祇能在京城內外勉強行用，京城百里之外即不能通行。『京外各處販賣糧食來京者，不肯使用大錢，致外來糧食日少，糧店紛紛歇業。』且大錢價值日趨低落，『銀市以錢買銀，大錢制錢價值懸殊。』因此形成大錢發行以來極混亂的情勢。這種情勢的形成，很顯然的一方面是由於貶值過甚的當五百以上的大錢還在市面上作祟，一方面是由於當百以下的大錢發行過多，再加以私鑄盛行，更加深了上述二者的嚴重性。所以滿清政府除了嚴禁私鑄之外，並採取了以下的兩大措施：第一，於四年八月七日將設立僅及五個月的慶惠等專鑄當百以下大錢的鑄局撤消了，併入戶工兩局，以減少當百以下大錢的發行額。並且大約不久以後當百、當五十大錢就停鑄了（因為以後不見討論到當百、當五十大錢問題）。第

二，不久以後復決定『將寶鈔發給錢行經紀，企於一月內迅速換回當千、當五百大錢，以絕私鑄之弊。』（因舊制錢每千重百二十兩，鎔化了可得銅六十兩，來鑄當千大錢，可抵三十千之用，利之所在，人盡趨之。）這種種措施對於當時混亂的幣制，當然也不無急救的功效，但在滿清政府一味的膨脹通貨的政策之下，是不可能發生穩定幣值的功效的。所以咸豐五六年間大錢價值仍繼續跌落，『當五十當百大錢滯積不行，惟當十錢與制錢三七配搭。』(20)『銀市奸商並敢將大錢與制錢各定價值，任意軒輊。』『商賈排斥大錢，竟敢私造名目，任意刁難，以致貧民持錢入市，行使維艱。』幣制混亂情形並未稍減。我們知道這時候的所謂大錢，事實上只是當十大錢（當五大錢大約鑄數有限），當十大錢要算是幣面價值最小的一種，而其所造成的幣制混亂，猶且如此，還是很值得玩味的問題。大體說來，殆由於下列幾種因素：

第一，通貨膨脹政策的影響。滿清政府鑄造大錢，祇圖應付戰時財政的迫切需要，絲毫不顧及必然產生的後果。單就當十大錢說，貶值已很厲害，即使不增爐不加卯，頓時增加較平時大十倍的發行額，已經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何況當時戰區已擴大至十餘省，大錢的流通區域已縮小若干倍，更有許多地區根本不使用大錢。清政府不肯考慮這些實際問題，而一味從事膨脹通貨政策，以爲飲鴆止渴之計，發行愈多，價值愈賤，這原是必然的歸結。

第二，私鑄盛行的影響。私鑄錢質更惡劣，既進一步動搖了大錢的『信用』，數量龐大更增大了通貨膨脹的危機。大錢流通的阻滯以及價值之低落，私鑄盛行，不能不說是要因之一。私鑄大錢有重利可圖，即當十大錢亦有五倍至十倍之利，所以『不軌之徒』，趨之若鶩。而官錢鑄造

不精，亦是誘使盜鑄的因子。天津和通州則是當時私鑄的集中地區，如『通州河西務一帶，奸民聚衆私鑄，竟敢於白晝鬧市之中，公然設爐鑄造，地方官畏其人衆，不敢查問。』〔二〕這種私鑄的人，多半是特殊人物，根據以往的事例，一定有旗人參加，地方官當然不敢惹他們了。並且私鑄大錢並不限於外地，京局的爐匠也常夾帶私鑄，私鑄又何能禁絕？政府的一切禁令，徒然是官樣文章。

第三，不能按成搭放。歷來主張行用大錢的人，都很注意收放問題——即流通問題，因為這是維持大錢信用的主要手段。關於大錢的配放，當時原有規定，大體是按二成搭放，我們雖不能斷言滿清政府未嘗履行這個規定，但在戰時財政緊迫的情形之下，我們是有充分的理由推定它不會嚴格遵守這種規定的。政府所設的官錢號，則公然對開放兵餉及開發寶鈔，專用大錢，不按二成的比例；民間錢鋪開發錢票更是如此，而把應照例搭放的制錢，運往他處漁利。〔三〕大錢的配放既不按規定的比例，則流通數量激增，價值自然愈趨低落，再加以不能按成搭收，其嚴重性則又更甚了。

第四，不能按成搭收。大錢的發行，原來規定民間應納稅課錢文等項，准以大錢交納，可是這只是空泛的原則，並非具體的施行辦法，事實上等於虛文。到了咸豐五年（一八五五）三月大錢問題嚴重的時候，曾令『順天、直隸、山東、山西等省徵收地丁錢糧，凡零星小戶及銀鈔尾零完納錢文者，俱准呈交銅鐵當十大錢並鉛鐵制錢，如官吏書差勒索挑剔，不肯收納，准該人民控告究辦。』這雖不是按成搭收，總算是比較着實的規定，然而也未發生多大實效。同年直隸延慶

州、保安州、懷來縣差役都仍然是向人民勒索制錢，不收當五當十大錢。次年（一八五六）保定府清苑縣對按成搭解錢糧事根本就不告訴人民，逕自『買大錢搭交藩庫，營私肥己』，搭收的辦法，徒爲貪污官吏開發財之路而已。大錢的流通問題當然愈來愈嚴重，不能不『亟籌變通』，於是咸豐七年春便又決定『順天、直隸各屬錢糧，即自本年上忙爲始，著以實銀四成，寶鈔三成，當十銅鐵大錢三成，按成搭交，其零星小戶應交錢糧不足寶鈔之數者，准以大錢抵交。』這算是按成搭收了，可是也似乎未能嚴格執行。五月間又議定了一個新辦法，即是『自本年下忙爲始，直隸徵收錢糧，悉照銀七票三辦理，其大錢三成即納在鈔票三成之內，交票交錢悉聽其便。』這在事實上等於把大錢搭收成數取消了，至少也是打了個對折，充分表現出剝削階級的惡劣手段，如此又何能使大錢獲得社會信用。

第五，軍隊停發大錢的影響。戰時的國家支出原以軍費爲大宗，所以大錢的主要領受者乃是士兵，如果軍隊停發大錢，大錢就失掉了最大的去路。可是大錢價值的低落，直接影響到士兵生活，所以到了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八月江北大營首先提請停發大錢，理由是兵丁『零用不便行使大錢，請停收停放。』滿清政府鑒於『兵丁月領口糧，按月零用，爲數無多，取領大錢與民交易既多窒礙，若聽其概行積存，必至日用愈艱，如強之使行，又恐激而生變。』遂決定批准『毋庸搭放大錢，其練勇口糧即照兵丁口糧一體辦理。著分飭各捐局委員停止搭收大錢，並咨會南河漕運各總督，所有撥解軍餉搭解大錢之處，一併停止，以免壅滯，其六合、江浦等處，行令一體照辦。』（二）軍隊停發大錢，直接使政府縮小放大錢的範圍，間接、使捐局停收大錢，各協解軍餉機關停解大

錢，其對大錢流通影響之大可以概見。

上述五點之中，有了第一點已足使幣制陷於混亂，再加上下面四點，自更不堪設想。所以儘管把當五十以上的大錢陸續停鑄並設法收回改鑄，同時又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五月把當十鐵大錢停鑄了，只剩下銅當十當五大錢，但仍然不能挽救幣制的崩潰。外省則福建的情形尤較京城嚴重，雲南且於八年九月首先請准停鑄。而幣制混亂情形，仍有加無已。到了咸豐末年，遂達到了頂點。李慈銘曾有一段關於咸豐朝大錢價值日趨跌落情形的記載，可以供我們參證，他說：「自咸豐初以銅錢匱竭，鑄鐵錢復鑄當十銅錢，而錢質惡劣，民間迄不能行，乙卯、丙辰間江、浙間有用當十錢者，未幾復停。次年吾越以一當五用，旋至當三而罷。今都城則以一當銅制錢二，當鐵錢二十。」<sup>〔二四〕</sup>由此可知大錢的價值，在咸豐七年至十一年（一八五七——六一）之間，從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一直跌到五分之一。同治初元以後大錢的市價雖時有漲落，但大體上常是一當銅制錢二，一直到光緒三十一年經戶部奏准永遠停鑄當十大錢，三十三年復以京城當十大錢，僅值二文，名實不符，且民間不樂行用，決議由大清銀行收回改鑄制錢，大錢制度至此乃告結束。

茲將大錢制度演變情形列表如次，以供參考。

大錢制度演變情況表

大錢種類		開鑄年月	停鑄年月	備考
當五十	咸豐四年正月			
當十	咸豐三年		光緒三十一年	此種錢大概所餘不多。



當五十	咸豐三年七月	不詳	當五十、當百大錢大約在咸豐四年七月停鑄，當五百、當千大錢後不久亦即停鑄，因為到咸豐五年論大錢問題時，已不見提及它了。
當百	咸豐四年二月	不詳	
當五百	同上	咸豐四年七月	
當千	同上	同上	
鐵當十	咸豐四年三月	咸豐七年五月	

### 丁 大錢的末路

由上所述，我們知道大錢制度到了咸豐末年已敗壞到了極點，當十大錢一枚只當制錢二文，這是跌落到了最低點，因為當十大錢一枚可改鑄制錢二枚，而且其所含銅質，比其幣面價值還高。所以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的時候，發現有人『盜銷當十大錢，以銷化之銅賣與寶源、寶泉兩局，並銅舖內即用大錢銷毀製器。』這種幣制對於金融與物價的擾亂自極嚴重，而於滿清財政與國民生計的影響，也就不言可知道了。但因當時戰事正殷，財政緊迫，滿清政府祇能作消極的防止，無力作積極的改革。及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太平軍已完全失敗，捻軍亦接近尾聲，軍費支出略見減少，財政狀況已有轉機，於是考慮改革大錢。上諭說：『前因銅斤缺乏，鼓鑄當十大錢，原為一時權宜之計，日久不無流弊。近來市廛行使，暗中折減，於國用民生，均有未便。惟欲規復圖法，必須籌備制錢，京師自通行大錢以來，所有制錢大都運往外省，若欲鼓鑄新錢，又非一二年所能驟復，戶部議令濱臨江海各省，籌解制錢，實為便捷之法。』<sup>〔一〕</sup>這是以恢復制錢為改革大錢的辦法。這在當時大約都認為是比較合理的辦法，因為在大錢行使以後，制錢的價格變動較小，而且只見提高不見降低，制錢的信用算是相當鞏固，這時以恢復制錢來補救大錢弊病，似乎

是最適當的辦法。不過，因銅價在當時已漲至每斤值銀十三四兩，這一方面使政府鑄錢虧本，一方面使私燬私鑄盛行，因而小錢充斥市面，『各省每百文小錢有多至七八十文者，且查汕頭、潮州各處有全用小錢，天津、上海既用短陌之錢，尙不免攪和小錢，福建全省則自二三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sup>〔二〕</sup>事實上那時政府所鑄一部分新制錢，已減至每文重一錢，且銅鉛各半，但仍不能禁止私鑄和小錢，所以一般人多主張恢復分量較輕的制錢。船政學堂監督刑部主事鍾大焜在請變法鑄錢議中說：『揆之當今時勢，合京師各直省各碼頭銀價銅價一切科合，似須於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元寶，洋人之香港一文，三者之間量度取中，鑄庫平八分之錢，方可以塞私鑄私毀之源，而錢法乃宜古而宜今，有利而無弊。』他這種建議，後來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的時候，福建方面曾採用過，惟按工本，所鑄制錢每文重八分五釐，略與原議有點差異而已。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滿清政府方面對於恢復制錢也積極起來，是年六月，醇親王會同軍機大臣戶部工部籌議恢復制錢，議定『以三年爲期，徐圖規復，先令直隸、江蘇各督撫添購機器製造銅錢，並飭例應鼓鑄制錢各省，一體趕緊開爐鑄造。』可是在半年之後（光緒十三年正月），戶部根據實際考察及各省督撫咨覆，認爲『機器製造，工本過鉅，京局開爐，恐滋事井疑慮。』乃改請『飭令湖北等省搭解制錢運京備用。』這在各省是因爲鑄制錢無利可圖，所以藉口機器製造工本過鉅，在中央則因爲太平天国戰爭以後，財政一直困窘，停鑄大錢改鑄制錢，是增加一筆很大的負擔，同時對於恢復制錢後可能發生的金融紛擾，也不能不顧忌，雖然政府鄭重宣佈當十大錢仍與制錢並行。這些理由那拉氏（慈禧太后）當然也很明白，然從她的『改善』幣制的立場來說，這

都算不得正當的理由，只算得藉口阻撓，所以當時就將戶部堂官嚴加斥責，認為他們是「輒信外省督撫卸責之辭，互相推諉，為此敷衍搪塞之計。規復制錢，仍准搭用當十大錢，前奏申敘甚明，何至一經開爐，闕闕然，措詞尤屬失當！……總之舊制必宜規復，錢法亟宜整頓，前經迭旨訓諭，乃該堂官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飾詞延宕，實屬大負委任，戶部堂官着交部嚴加議處，原摺單擲還，仍着將開爐鼓鑄各事宜，迅速另行籌議具奏，限於一年內一體辦理就緒，毋再遲延干咎！」（一）後來戶部堂官都得了個革職留任的處分。可是在這個「諭旨」頒佈了一天之後，市面上立刻發生騷動，一般因為「諭旨將行制錢」，於是「小錢屏遏不行，細民覓食不得，號泣滿路，餅師菜傭，相率閉門至有求死者，以昨日市易所得者皆常用錢也。」（二）這種現象固屬一時的反常的現象，但恢復制錢之議所給予貨幣金融的影響，特別是給予大錢行使的影響，在光緒十三年之問極為嚴重，則屬事實。光緒十三年四月間就因為「民間竊議，制錢一出，大錢將廢，各舖所開錢票，恐將來虧折，紛紛收回，遂至錢票現錢價值懸殊。」（三）「京城銀價，易錢易票任意低昂，而物價不減，兵民受累。」弄得那拉氏不得不下令「戶部擬定章程，將來通行制錢之時，每當十大錢，准折抵制錢二文，官民購買物件，及各行商賈，均照此出入，不得稍有參差，其捐項稅務，亦照此折抵數目，搭成交收。」同時並嚴禁「奸商播弄取巧，紊亂錢法。」（四）這樣想用法令的規定來維持大錢的法定的地位和價值，也許一時會收到若干穩定幣值的效果，但時機一過，却又變本加厲。到了十四年正月，京城又因「近來市面惶惑，專挑極重當十大錢，稍輕者即不行使，致小民持錢不能購食。」（五）「月餉搭放制錢當十大錢，地面未能照常行使。」（六）這大約是鑒於一年恢

復制錢的限期將屆，所以乾脆不肯行使大錢了。儘管滿清政府一再申言並不廢棄大錢，結果亦屬徒然。這一聯串的事實，證明了戶部前所稱「京局開爐，恐滋事井疑慮」的話，措詞並不「失當」。大概也就因為這些事實的教訓，滿清政府方面也始終沒有作正式恢復制錢的嘗試，而把這種嘗試工作讓地方政府去做。

地方政府方面只有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開廣東錢局於廣州，用機器鑄造制錢，初重一錢，後改八分，但因銅鉛價值每年增加，鑄錢虧折為數甚鉅，到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總督李鴻章即下令停鑄。這又證明了地方督撫所稱「機器製造工本過鉅」的話，也不是毫無理由的。而恢復制錢不足以救大錢之弊，且於財政有損，更得到一個有力的實證。制錢既不可復，大錢又不可行，自然迫切需要有一個適合時勢需要的新幣制產生。特別是廣東方面，自停鑄制錢「錢價日漲，銀價日落」，情勢更迫切，而「粵省地鄰港澳，習用外洋銅仙」，加以其所仿鑄的銀圓，亦已暢行國內，遂引起仿鑄「銅仙」的念頭，而於二十六年開始鑄造銅元了。

### 三 咸豐時代的官票和寶鈔

#### 甲 發行紙幣作為籌措戰費的手段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紙幣很早的國家，中國的紙幣，濫觴於唐憲宗的飛錢，而盛行於北宋的交子錢引，南宋的會子、關子，金的交鈔寶券，元、明的寶鈔，雖其間或盛或衰，要之紙幣實為當時

主要的流通貨幣之一。明中葉以後幣制紊亂，鈔票遂不能通行，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曾打算復行鈔法，沒有來得及實行，國家便滅亡了。清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因『經費未定，用度浩繁』，遂『倣明舊制，造爲鈔貫，與錢兼行。』『是年始造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爲額，至十八年卽行停止。』關於這種鈔貫的制度和流通情形，因資料缺乏，尙不能詳細了解。大抵清初鈔貫制度略同於明代的寶鈔，其流通情形或卽如清朝文獻通考的作者所說：『國初制鈔甚少，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之而無弊。』『三』不過事實上未必絲毫無弊，否則，何必自行停止？

自此以後，紙幣制度卽行廢止。直至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纔有人重行提起，那是由於乾隆一代的封建擴張政策下的所謂『十全武功』，已使國庫每年入不敷出，而自乾隆末年以來，各地人民紛紛起義，軍費支出浩大，加以連年水旱爲災，賦稅收入激減，因之財政匱乏，不能不另籌補救的方法。在這種情形之下，發行紙幣以應財政的急需，原爲統治者所樂爲。無如紙幣過去所給予人們的印象太壞，所以當侍講學士蔡之定奏請行用楮幣時，却受到『交部議處，以爲妄言亂政者戒』的處分。上諭所列舉的理由是『後代行用鈔法，其弊百端，小民趨利若鶩，楮幣較之金銀尤易作僞，必致訟獄繁興，麗法者衆，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國家經費，量入爲出，不致遽形匱乏，何得輕改舊章，利未興而害已滋甚乎？』『三』復行紙幣的建議就這樣被抑制了，而嚴重的銀貴問題，又接踵而起，財政的困難，也就『如水益深』，滿清政府惟有加緊封建剝削，來解救這種貨幣問題所給予財政的影響，至於其所給予人民生活的影響則置之不問。這在國家無意外

災難時，封建的專制力量還可以鎮壓人民自謀解救的『變亂』。不幸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爆發了鴉片戰爭，結果更加深了人民的生活痛苦，又暴露了滿清政府的脆弱無能，於是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接着就發生了太平天国革命戰爭。這時滿清政府既無實力即時鎮定人民的起義，更無力量解救財政危機，採用紙幣問題才又被人紛紛提起。

太平天国革命戰爭爆發前夜，即有王鑒、張履、包世臣等人提議復行紙幣，頗受反對，及至戰爭爆發後，福建巡撫王懿榮復倡議行鈔，他在戰爭起後一年多的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六月以前即奏請籌行鈔法以濟軍需，同年六月經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以『民間行用鋪戶銀錢各票，乃取錢取銀之據，若用鈔則鈔即為銀鈔即為錢，與鋪戶各票之持以取銀錢者不同，必致民情不信，滯礙難行，該撫所請改鈔票之說，應毋庸議。』（三）同年九月左都御史花沙納又奏請行鈔法，他說：『為今之計，欲求萬全之策，莫若酌行鈔法一事。因臚列造鈔、行鈔、換鈔三十二條，並敷陳用鈔十四利。』到了咸豐三年又被會議籌備軍餉的王大臣等會同戶部議駁，認為『未有灼見真知，俾克立時措手可有把握之處。』『與其用久未奉行之法而收效稽延，不如就從前本有之財，以力圖週轉。』一致反對用鈔票，主張行用銀票期票。『僉謂京師銀票流通，就其法而擴充之，民以習見而相安，事以推行而盡利。擬請暫行銀票期票，仿照內務府官錢鋪之法，開設官銀錢號以便支取。並……擬除各省鹽商帑本毋庸議提外，請於各省當雜各商生息帑本內，每省酌提十分之三，由該州縣解交藩庫，勒限三個月，由藩司造冊報部俟撥。戶部核明銀數，計應造一百兩暨八十兩、五十兩之票若干張，彙發該省藩司，按原提本銀數目分給各該當雜商，准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

各商買票報捐，歸還原提各商銀款，內有畸零尾數即以見銀令其找足，其各商應繳息銀，仍如其舊。如此一爲轉移，於商無虧，於事有濟。」『又各省不見存未買穀價銀兩，應令各直省督撫轉飭藩司勒限三個月，查明此項存銀若干，無論在藩庫屬庫，酌量催提，先行報部聽候撥用。其發交銀票歸還各州縣原款之處，亦與酌提當雜商帑本辦法相同，俟各該省豐收買補之時，令捐生交銀領票報捐，地方官即將所交之銀買補。並請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三所，每所由庫發給成本銀兩，再將戶工兩局每月交庫卯錢，由銀庫均勻分給官號，令其與民間鋪戶銀錢相互交易，即將戶部每月應放見錢款項，一概放給錢票，在官號支取，俾見錢與錢票相輔而行，輾轉流通，民兵兩有裨益。至在京王公百官俸銀，向分二八月兩次支領，今擬請世職自親郡王以下伯以上，文職自四品以上，武職自二品以上，均給與期票五成，統限於八月初一日持票赴庫關支，其秋季俸銀准此遞推。』(二)這和咸豐二年的議駁王懿榮，實質上並無不同。其所主張行用的銀票期票，係屬支票匯票性質的票據，並算不得紙幣。他們對於行用紙幣仍持反對意見。祇因戰爭已繼續了兩年之久，『軍需河餉已糜帑二千數百萬兩，以致度支告匱，籌劃維艱。』所以咸豐三年二月上諭說：『鈔法由來已久，本朝初年亦行之，近日諸臣紛紛陳請此事，原以濟國用之不足，既非廢銀用鈔，亦非責商繳銀，部庫收發一律，既足示信而祛疑，而民間以漸而通，亦可利用而行遠，仍着戶部妥與銀錢並重，部庫收發一律，既足示信而祛疑，而民間以漸而通，亦可利用而行遠，仍着戶部妥議速行。其各銀號錢鋪所用私票，仍着照常行用，如有造謠生事，謂須禁止民間錢票及以票發商勒令交銀等說者，該旗營地方各官立即嚴究造謠之人，拏獲懲辦。』(三)滿清政府這種行用鈔票的

決心，正反映出當時財政的艱窘，不然，絕不至如此，這是無可置疑的。同時從上引上諭裏，我們大體可以窺見當時民間對於行用紙幣問題的反響，他們所疑懼的是：（一）廢銀用鈔，（二）責商繳銀，（三）禁用私票，却根本沒有憂慮到行用紙幣後對廣大人民生活所可能發生的一切惡影響。這顯然是代表一小撮大商人的意見，所以他們的反響阻力是很微薄的，並且是容易解消的。只有代表大地主階級的一羣封建官僚們，是深切地憂慮到紙幣行用後可能給他們財富的影響，因而堅決地表示反對，然而戰爭形勢的發展，却終於使他們不得不暫時屈服。

戰爭的發展抑止了大地主階級的阻力，而客觀的事實也解消了商人羣的疑慮，於是作為解決戰時財政有效手段的紙幣政策便開始實行了。

## 乙 官票寶鈔的發行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五月戊申始製銀鈔。』（一）由左都御史花沙納、陝西道御史王茂蔭會同戶部堂官議「定為官票名目，先於京師行用，俟流通漸廣，再頒發各省一律遵辦。官票之行與銀錢並重，部庫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間銀錢私票行用，仍聽其便。」（二）這便是以銀兩為單位的所謂「官票」。同年十一月又「諭頒錢鈔章程」，「十二月壬申始鑄錢鈔。」（三）「頒發中外，與現行銀票相輔而行。」這便是以制錢為單位的所謂「寶鈔」。

「官票」和「寶鈔」保存到現在的還很多，據羅振玉四朝鈔幣圖錄所收，有官票寶鈔各四種，後附「考釋」說：「寶鈔用厚白紙為之（俗呼雙鈔紙），花文字畫悉用藍色刷印，錢數亦刻成者。依千字文編號，某字及某號用墨戳鈐補，某年字則用藍色木戳鈐之，年下加黑色小長印，則鈔局



編號時私記也。予所見有二千、一千五百、一千及五百四種。官票用高麗紙爲之，花紋字畫亦藍色，銀數用大字墨戳，亦用千字文編號，某字上用黑色木戳，第△號及年月日則用墨填寫，下角有黑色押字木戳。頒外省者騎縫處加鈐戶部紫水印，外省解部者，加督撫關防、布政使司及各府州縣印，右側騎縫處有驗訖藍戳，上有主政某（用姓不用名）朱戳，予所見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四種。」

這種寶鈔長二四·五公分，闊一三·八公分，上列「大清寶鈔」四字，兩傍並列「天下通行」「均平出入」八字，中間三行，正中爲準足制錢若干文，右爲某字第某號，左爲某年製。錢數上鈐「大清寶鈔之印」滿漢文合璧鈐記。下端鐫小字九行，文曰：「此鈔卽代制錢行用，並准按成交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京外各庫一概收解，每錢鈔二千文換官銀票一兩。」四周有花紋，上作雙龍紋，兩傍作雲紋，下作波浪紋。

官票大小與寶鈔差不多，四周上方及左右作龍紋，下方作波浪紋；中部頂端印戶部官票四字滿漢文於一方格內，下爲準二兩平足色銀若干兩，右爲某字第某號，左爲某年某月某日，下端長方格內鐫小字八行，文曰：「戶部奏行官票，凡願將官票兌換銀錢者，與銀一律，並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項，僞造者依律治罪不貸。」銀數上蓋有「戶部官票永遠通行」方形滿漢文合璧鈐記，騎縫處蓋有「戶部官票所關防」長方形滿漢合璧關防。

這種官票寶鈔，規定出納皆以五成爲限，民間完繳正項錢糧與鹽關課稅及一切交官等款，皆須鈔票與銀錢相輔而行。論理應該通行無阻，可是事實却不盡然。發行後不久——在官票發行之

後六個多月，寶鈔發行後十天——，即在咸豐三年十二月，首先在京城所在地的順天府就行不通了。兼順天府尹翁心存等當日就把軍營搭放鈔票窒礙情形向皇帝陳述，請求先由地方試行有驗，然後再於軍營搭放。這原不失為一種切合實際的建議，却受到一頓申斥。然而事實終於扭不過，鈔票的流通，並未因政府的雷厲風行而暢行無阻。四年（一八五四）三月主張行鈔法最力的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即奏陳鈔法未善，酌擬章程四條，並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雖被弈訢（咸豐）斥為『止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率行瀆奏，竟置國事於不問，殊屬不知大體！』（三）但鈔票的未能順利推行却是事實。

還有一點，原來本規定各省設立官錢局推行官票，可是到了咸豐四年下半年，還只有福建、山西、陝西三省遵辦，經嚴令督促後，熱河算是開始籌辦了，而天津結果却是由商人白亮、劉宏振等攤借資本，設立總局，收發鈔票。商人豈真是『急公好義』，不過乘機圖利而已，這也足以證明鈔票推行的不順利。

最先發生阻礙的，大約是官票，因為官票的票面額較大，且政府缺乏現銀，不能兌現，所以流通立見阻滯。因此滿清政府在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又詳議鈔法章程，規定民間完納銀糧，自咸豐六年起，凡應搭官票改換寶鈔，令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先行遵辦。這原是想把官票寶鈔互相調劑一下，但在以紙幣為餉源的政策之下，這種辦法自然不會收好大效果的。到了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六月，鈔票在各直省仍未能暢行，且據給事中仙保奏，直隸保定府清苑縣迄未出示曉諭，以致商民無從獲得信用保障，鈔票就根本行不通。直隸為京城所在地，情形尙且如此，

他省也就可想而知了。『惟錢鈔之行必自近及遠』，所以滿清政府對直隸省也特別重視，咸豐七年閏五月，怡親王載垣等議覆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推行大錢鈔票章程四條：『一、准州縣分設票局，一、持票取錢，先儘餉票給發，餘仍舊照製字辦理，一、票價隨銀長落，一、加卯鼓鑄以資搭放。』這原是鈔票阻滯後的補救辦法，想竭力加強發行網並儘可能兌現，使鈔票首先能在直隸省暢行。事實上，此後鈔票流通情形並未見改善。可惜關於當時詳細情形，我們還未獲得可靠資料，不能詳加說明。但在咸豐五年時，『票銀一兩實鈔一千，均止易錢四五百文。』〔三〕即此可見其價值跌落的一般。而咸豐九年十一月又令將廣恩庫積存大量銀票實鈔暫行搭放，以免愈來愈壅滯，也可以窺見阻滯情形。

### 丙 政治敗壞與惡性膨脹政策是紙幣失敗的兩大因素

為什麼咸豐時代的鈔票會流通阻滯價值跌落呢？

咸豐時紙幣制度的失敗，有兩個重大的原因：一個是政治的，即政治敗壞所給與紙幣制度實施的影響，一個是經濟的，即通貨膨脹所給與紙幣制度的致命打擊。

紙幣信用大半是政治法律賦與的，如果各級政府官吏自壞其信用，那是無法挽救的。咸豐三年九月戶部承辦官舖的商人蕭光浩，『就勒措把持，聲稱不收官票。』〔三〕這種官商事實上是以官府為背景的，我們不能把它看做單純的商人破壞紙幣信用的行為。又咸豐五年九月李鈞奏稱：『河南省州縣於徵收錢糧時，專收銀錢，不收票鈔，解司之時則收買票鈔，按五成搭解。以致商民於票鈔不知寶貴，現在票銀一兩實鈔一千，均止易制錢四五百文。河工領款係八成票鈔二成現銀，

所領票鈔難於行使，每遇險工，無從搶護。山東省藩庫於各領款則照二成搭放，而於州縣解款並不搭收，致票鈔更形壅滯。」〔三〕這便是各級政府官吏直接破壞紙幣信用的例證。至於近在京畿的直隸保定府清苑縣，到咸豐六年六月還沒有出示推行票鈔，致令商民無從獲得信用保證，票鈔不能流通。這羣官們顯然又是營私舞弊，收銀買鈔，搭成解交藩庫。還有咸豐十年二月戶部官票所官吏交通舞弊，掌關防員外郎景燾等用短號鈔換出長號鈔，又員外郎色卿額自咸豐八年秋至九年春，向換鈔商人勒索使費。」〔四〕這些也是屬於以上的一類。再有一種與上述性質相同而方式略異的，即咸豐八年「福建省永豐官局，因提用局票過多，局夥倚恃委員護庇，買空賣空，致民間不復信用局票，物價日昂，奸徒（？）鼓煽，致有三月間闖入督署之事。」〔五〕這種拉用官票，買空賣空，使票值低落，物價高漲，逼得人民闖進總督衙門，不待言也是官吏破壞紙幣信用的一例。

還有的地方官吏乘發行票鈔的機會，便把票鈔向商民強迫抵換現金，弄得公私都不能通行，票鈔等於廢紙。咸豐三年六月揚州方面就有這種情形。」〔六〕

上述種種事實，都是咸豐時代紙幣制度失敗的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經濟的原因，也可以說是財政的原因。即是咸豐時代施行紙幣制度的失敗，雖係受到若干嚴重的政治因素的顯著影響，但滿清政府以發行紙幣為支付軍費的手段，形成惡性通貨膨脹，則為更基本的原因。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用數字證明當時通貨膨脹的程度，可是看到票鈔價值的繼續下落以及流通的日益阻滯，已可想見一個大概。而咸豐十一年六月上諭說：「各官號

商人始以戶部官號爲名，暢開私票，繼以官款長開爲口實，意在挾持。」（三）亦足證政府發行票鈔，實屬漫無節制。由此可知通貨過度膨脹，實在是咸豐時紙幣制度失敗的基本因素。

在這種政治的經濟的影響之下，於是鈔幣價值急速趨於跌落的一途，到了咸豐末年遂至不可收拾。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曾有以下幾段關於當時票鈔價值跌落的記載：

「（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日來市上交易，銀價至三十吊以外，票錢一吊僅得銅制錢五十二文。以戶部先揭示盡廢鈔票不用，近復議廢錢票，民間惴惴，故銀價日增，制錢日少。京師久乏銅錢，而鐵錢又不能行，惟恃虛票以通有無，倘此議果行，亂必作矣。」

「二十日：是日銀價稍平，一兩換制錢二十七千，千換銅制錢五十八文。」

「二十四日：昨日銀價已減至二十六千，每千換錢六十，今早忽增銀價至六十千。乾益、乾亨、乾元、乾豫四家官號錢票，皆屏不用。以戶部議錢票太多，度支無銀可抵，奏請以四乾官號票搭三成用，俟票盡收後，令各錢舖另出新票，不出者斬決。昨已得旨准行。」（四）

據此，是在咸豐十一年六月間，銀票——即官票似已絕跡不行，而錢票——即寶鈔則跌落到百分之二·六至百分之五·二，即錢票一千最高值銅制錢五十二文，最低則僅值二十六文，幣值的跌落，可說是慘到極點。同時由於官發錢票的貶值，私票自不免受其影響，私家錢舖亦以濫發爲救濟方法。結果金融市場一有波動，各錢舖即發生擠兌風潮，搶劫案件亦隨之而起，錢舖多被迫倒閉，更有奸商乘機以倒閉漁利。這樣自然弄得公私交迫，民不聊生。滿清政府勢不能再另行設法挽救了，因此在十一年（一八六二）六月下了一道目的似乎是在緊縮通貨的命令，說：「京

師銀價騰貴，於旗民生計大有關係。總由各官號商人，始以戶部官號爲名，暢開私票，繼以官款長開爲口實，意在挾持，因之奸商從中漁利，實堪痛恨！着照戶部所議，所有該部長開官號票存，按上年十月奏准錢隨市價之日，統扣三成作爲該商罰款。並變通銅捐局章程，收回該部長開官號票存，俟官款收清，將四乾字號撤去官號字樣，作爲民鋪交順天府管理。倘各官號未能將私票存及三成罰款全數清理，以致貽累民間，或任意抑勒及有心擾亂激成事端，即將該商人等送交刑部奏明正法。原保之恆利等號商人着先交五城看管，如任令官號商人携貨潛逃，即將該保人一並治罪。其五天字號並着總管內務府大臣妥爲辦理。至民間錢鋪，現不出票，顯有與官號通同把持之弊，卽着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衙門一體出示曉諭，限於一月內各開各票，倘敢抗違，卽將該鋪商從嚴懲辦。除以前官號錢票仍照戶部現定數目發給外，自奉此旨後，各錢鋪均照票之多寡發錢，不得仍前抑勒短少。」〔三〕這在表面上雖然是把鈔幣價值跌落的責任完全推在官號商人身上，可是事實上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爲着顧全政府的面子，不惜犧牲商人而已。滿清統治者分明知道主要原因是在發行數量太大，所以不得不一面撤消四乾字官號，一面設法收回所發錢票。只是這種辦法並不徹底，五天字官號仍然存在，四乾字號錢票又只『准搭三成充捐輸職官費，其加成、捐復、請封、贖罪，仍不准搭用。』〔四〕所以對於現實仍無大補益，甚至增加混亂。『自此詔出，民間但肯用五天字號錢票。』此後錢票價值變動的情形，越縵堂日記中亦有以下幾段記載：

『七月初五日：今晚西天元字號錢票又不行。』

『初九日：數日來私號錢鋪皆出新票，銀一兩換票錢十三千，每千換銅制錢一百，而天

元、天亨、天利、天貞四官號錢票皆漸不行，每銀一兩換至四五十千，每千換錢不過二三十文，其四乾字號及西天元字號，僅換十餘文，聞戶部連日遞封奏，不知又何所更置也。」〔四〕由此可知錢幣制度較前愈加混亂，幣值愈益跌落，「而歐美商人乃賤價購之，以五成納海關稅，悉照原票價目計算，官吏無以難也，乃亟由戶部及各省定價收購撤銷。」〔五〕於是而作為一代支付軍費手段的紙幣制度，遂壽終正寢了！

#### 四 太平天国革命戰爭後的幣制改革問題

自從東印度公司積極向中國擴展罪惡的鴉片走私貿易以來，中國幣制問題即開始以新的內容而嚴重的存在着，例如前述道光時代的銀貴問題，便和以往的銀錢比價變動迥然不同，並且它的嚴重情形亦為前此所未有。及至鴉片戰爭以後，由於五口開放通商，對外貿易既有了發展，國內市場也隨着日益擴張，加之戰後經濟凋敝，財政困窘，幣制問題遂愈趨愈複雜。不到十年，而太平天国革命戰爭又一旦爆發，增發貨幣成了支付戰費的主要手段。通貨膨脹，物資缺乏下的幣制問題，終至於江河日下，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同時幣制混亂複雜情形也是史無前例的。以種類講：有銀兩又有外國銀元，有制錢又有銅、鐵、鉛大錢，有官銀錢票又有私票。以價格講：銀兩不同於銀元，制錢不同於大錢，官票不同於私票。何況銀兩、銀圓、制錢、大錢、官票、私票，它們本身又各自有着種類的不同和價格高下的差異。所以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戰爭以後，幣制改革

問題，事實上已成了戰後最迫切的問題。

關於當時幣制問題的實際情況以及滿清政府處理的方針和經過，這不僅是了解近代貨幣史的關鍵，也是了解戰後全般歷史發展的重大關鍵。

如前所述，幣制問題在太平天国戰爭以前，就已因銀價昂貴而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及至太平天国革命戰爭爆發，滿清政府不但無力（並且根本上無此打算）從事改革，而且還要利用它來作為解決戰時財政的工具，因而益發加重了幣制問題的嚴重程度。本來滿清舊有的兩種貨幣——銀兩與制錢，銀兩因嘉道以來現銀的大量外流而發生銀荒，制錢又因銅價日昂，錢價日賤，一方面使法定的幣值不能維持，另一方面使政府鑄錢成了一筆重大負擔，因而私銷私鑄盛行，幣制趨於混亂。這兩種貨幣事實上是滿清政府籌措戰費的阻礙。於是為了便於籌措戰費，便開始實施「戰時貨幣政策」，第一發行紙幣，第二開鑄大錢。

在當時軍需緊急的情勢之下，開始實行此等制度，一望而知是必然將引起通貨膨脹的惡果。因為應付急迫的軍事需要，遂不得不無限制的發行鈔票，而滿清政府既無充分準備金保證其兌現，又不能禁止使用銀兩和制錢，以確立紙幣的法貨地位，那麼鈔票價值的跌落自屬意料中事。至於大錢的鑄造，一因不廢制錢，故一般均不免仍以制錢標準折算大錢實值，使大錢的幣面價值無法維持。二因大錢中當五十以上的，它的幣面價值與所含金屬實值相差太多，既難通行，又易引起私鑄。所以它的價值跌落也是無法避免的。

所以發行官票寶鈔與開鑄大錢，結果祇有使幣制越發陷於混亂。雖然滿清政府對於這種局勢



不等待戰爭結束，即已被迫採取了若干緊急措施，先將官票寶鈔陸續收回了，當五十以上的大錢陸續停鑄了，可是嚴重的幣制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善，反之，戰爭所給與幣制的惡影響依然存在。故戰後幣制問題的嚴重性仍然沒有因戰爭結束而宣告解除。

戰後幣制問題，綜括起來應有以下三點亟待解決：

(一)發行紙幣問題 戰時官票寶鈔的發行，雖屬弊端百出，但是它的失敗原因，實由：一，各級政府及官吏營私舞弊，自動的破壞了紙幣的信用；二，惡性通貨膨脹，使幣值無法維持穩定。這兩點都是人爲的外在的因素，不能作爲紙幣不能存在的理由。滿清政府採取停發官票寶鈔的緊急措施，在戰爭當時幣制紊亂的情形之下，固不失爲適時的措施，但決不能因此便說紙幣在當時已無存在的必要。反之，紙幣的發行，在戰後社會的需要已非常迫切，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戰前一直到戰後私人錢舖所發銀票錢票的盛行一點上，獲得充分的證明。加以中外貿易日益發展，國內市場日益開拓，隨着貨幣流通量的實際加大，對於紙幣需求的迫切，自然也不待言。所以在戰後的幣制問題上，不應是將戰時發行的不健全的紙幣收回停發就算了事，應該設法健全紙幣發行，確立新的紙幣制度，以適應時代的需要。

(二)改革銀兩制度問題 銀兩制度不能再作爲近代幣制施行，道理已非常顯明，例如成色的高低，平砵的紛歧，就是一例。它在金屬貨幣中，還沒有超過稱量貨幣的階段，所以在戰前早已有人主張加以改革，道光中葉的時候，林則徐便第一個主張改鑄銀圓，並且還自行試鑄銀圓。到了咸豐五年周騰虎作鑄銀錢說，尤竭力主張，可是因爲銀貴問題鬧得太緊張了，弄得大家都把

目光轉移到銀的多少有無問題上去了，忽視了銀兩制度的必須改革。特別是在戰爭期間，現銀缺乏更易引起這種錯覺，不知事實的演進，業已表現得非常顯明，東南沿海各省自嘉道以來早已通用外國銀圓，逐漸廢棄銀兩制度了。所以戰後必須考慮到如何建立銀圓制度以適應這一自然趨勢。

(三) 改革制錢制度問題 制錢制度的缺點也很多，首先制錢與銀兩不分主幣輔幣，一樣流通，便是一個大毛病，其次制錢與銀兩雖有法定的比價，但不是絕對的。而制錢鑄工粗劣，易於偽造，也够不上近代幣制的標準。加以計算方法因地而異，種類名稱極其複雜，價格紛亂，使用煩難，攜帶不便，這些缺點在大錢一度行使以後，暴露得尤為顯著，儘管大錢也有很多缺點，但它確有比制錢便利的地方，大錢固不值得留戀，却也不應該以恢復制錢為滿足。在戰後事實上需要有一種計算簡單、價值劃一、攜帶方便而又不易偽造的新銅輔幣，能與成長中的銀圓制度相配合。

以上三點都是戰後幣制應行改革的地方，可是堅持封建的保守主義且又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却始終不肯向這個方向去努力，他們把努力的目標放在恢復舊幣制上。關於發行紙幣，滿清當局在戰後已矢口不提，認為那是決不可行的『弊政』，任令民營錢舖自由開發銀錢票，聽其自生自滅，毫不加以管理。一直弄到光緒中葉外國銀行在華擅發鈔票，滿清政府才稍稍改變態度。然而國家權益的喪失，國民經濟的損害，已經無法估計了。關於銀兩制度的改革，滿清政府也根本無此打算，儘管外國銀圓無限制的流入，在沿江沿海甚至內地各省分，已取銀兩地位而代之，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先導，不但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亦且侵蝕了中國國民經濟，然而滿清政府却視若無

觀，仍舊死守着銀兩制度，直到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才准張之洞在廣州開始鑄造銀圓，然後逐漸普及於全國。至於制錢則因在戰時一度改鑄大錢，大錢的盛行，事實上又已破壞了制錢制度的完整，滿清政府不想辦法改正制錢與大錢制度的缺點，來建立新的輔幣制度，却反一再努力設法恢復制錢。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捻軍戰事行將結束的時候，即下令恢復舊幣制，籌備鑄制錢，事實上中央及地方亦正分別進行，只因實際困難過多，進行並不順利。到了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滿清政府對恢復鑄制錢更趨積極，並規定以三年為期，但未及實行，即引起一場混亂，原來市面通行的小錢，大家都因此不肯使用，可是一般人手裏所有的都是這種小錢，小錢不行，便無法謀生，弄得到處聽到哭聲。一般攤販和做小買賣的，只有關門停業，甚至有人自殺。同時大家猜想，制錢鑄出之後，大錢必然廢止，各錢舖恐怕開出的錢票，將來虧折，紛紛收回，結果錢票與現錢的價值發生很大的差額。不過這些還是表面現象，基本原因却是制錢本身缺點太多，已不合時代要求，加以銅價太高，鑄錢賠累過大，滿清政府也無力完成這樣的豪舉，所以這種努力，結果都成泡影。而李鴻章却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在廣州開鑄銅元了。

〔一〕 中國貨幣論中譯本二六八頁。

〔二〕 同前書三八四頁。

〔三〕 參看丁福保的古泉學綱要。

〔四〕 本文中有些材料係採自羅爾綱的太平天国貨幣所見錄。

〔五〕〔六〕 均見梁章鉅：歸田瑣記。

〔七〕 湯象龍：咸豐朝的貨幣。

- 〔八〕 咸豐東華錄咸豐三年十一月條。
- 〔九〕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二。
- 〔一〇〕 周長森：六合記事卷一。
- 〔一一〕 咸豐東華錄四年七月條。
- 〔一二〕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二引咸豐六年上諭。
- 〔一三〕 咸豐東華錄。
- 〔一四〕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咸豐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條。
- 〔一五〕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三。
- 〔一六〕 鍾大焜：爵鑒法鑄錢議。
- 〔一七〕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引光緒十三年正月十四日邸抄。
- 〔一八〕 同前書光緒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條。
- 〔一九〕 同前書引光緒十三年四月六日邸抄。
- 〔二〇〕 同前書引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日邸抄。
- 〔二一〕〔二二〕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 〔二三〕 咸豐東華錄。
- 〔二四〕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二。
- 〔二五〕 同註〔二三〕。
- 〔二六〕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二。
- 〔二七〕 咸豐東華錄。
- 〔二八〕 同註〔二六〕。
- 〔二九〕 參看咸豐東華錄及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二。
- 〔三〇〕 同註〔二六〕。
- 〔三一〕〔三二〕 咸豐東華錄。

- 〔三〕 羅振玉：四朝鈔幣考釋。
- 〔四〕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二。
- 〔五〕 倪在田：揚州禦寇錄。
- 〔六〕 同註〔三〕。
- 〔七〕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辛集上。
- 〔八〕 同註〔三〕。
- 〔九〕 同註〔三〕。
- 〔一〇〕 同註〔三〕。
- 〔一一〕 同註〔三〕。

## 第五章 近代外國銀圓的流入及其影響

### 一 十八世紀末葉以後外國銀圓大量流入

外國銀圓流入中國，遠始於明清之際，那時海禁既開，葡萄牙、西班牙各國相繼東來，外國商人有銀圓來華購買特產的，外國銀圓卽在此時開始流入中國。康熙初年漕運總督慕天顏請開海禁疏說：『猶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見市井貿易咸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後，而此等銀錢絕跡不見一文。』〔一〕可知清初外國銀幣已流入中國，其後以沿海邊界，貿易不通，外國銀錢遂亦絕跡。及至乾嘉以後，海禁既弛，中外貿易日趨繁盛，外國銀圓復大量流入。乾隆九年（一七四四）范廷楷奏稱：『內地奸商私帶制錢出海，與諸番交易，以數十文易番銀一圓，獲利最重，返舶之時或帶番餅，或帶洋貨。』〔二〕足證乾隆九年以前，卽有外洋貿易商人將外國銀圓輸入中國。又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乾隆十年條下云：『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其銀皆範爲錢式，來自西南二洋，約有數等：大者曰馬錢，爲海馬形，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花邊錢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錢有奇，中者重三錢有奇，小者重一錢有奇。又有刻爲人面或作全身，其背爲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環

以番字。亦有兩面皆爲人形者。閩、粵之人稱爲番錢或稱爲花邊銀，凡荷蘭、佛朗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圓計。」

清朝文獻通考修於乾隆末年，此條所記雖系於乾隆十年之下，然係作者按語，固不能斷爲即係乾隆十年時事，但其爲乾隆時事則無可疑。由此可知乾隆時閩、粵一帶流行的外國銀圓，有所謂馬錢、花邊錢、十字錢、人面錢、全身人形錢、兩面人形錢等數種。而花邊錢又有七錢有奇、三錢有奇、一錢有奇三種，是當五角及二角的小銀圓亦同時流入中國了。

嘉慶年間外國銀圓流入數額，隨中外貿易的發達而益增。嘉慶十九年（一八一五）蘇楞額奏請嚴禁海洋私運一摺中稱：「近年以來，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護回夷兵盤費爲名，每年將內地銀兩偷運出洋至百數十萬之多。該夷商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復將低潮銀兩運進，欺瞞商賈，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一）同年蔣攸銑奏稱：「洋銀進口，民間以其使用簡便，頗覺流通，每年夷船帶來之洋錢，或二三百萬元，或四五百萬元，亦有數十萬元者不等。」（二）

嘉慶時外國銀圓流入數量之巨，於此可見一斑。其時不僅隨普通商業來往而流入，似尚有專事輸入銀圓來套購銀兩營利的商人。

道光初年外國銀圓『行用日廣』，流入仍多，故道光九年（一八二九）上諭說：「朕聞外夷洋錢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在內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每一元抵換內地紋銀，計耗二三分。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銀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三）

其後因鴉片入口日益增大，中國對外貿易形勢日趨逆轉，外國銀圓輸入，亦相對減少。同時因對外貿易逆轉，現銀流出過多，引起現銀恐慌，清政府乃厲行禁止商人以現銀與外商交易，遂使外商以銀圓購買現銀，亦較困難，而銀圓的輸入更爲減少。故王慶雲石渠餘記說：「閩廣近海之地，多行洋錢，來自西南二洋。……質不及銀而價視銀爲高下。始番舶捆載而來，歲數百萬，與東南貨幣相流通。顧昔以洋錢易貨而來，今以貨易銀而去。其流入內地，塹鑿消耗，亦漸以難得矣。」〔六〕

這大約是道光年間現象。及至咸豐年間，外國銀圓輸入益減。而國內又值太平天國起義，幣制紊亂，幣值低落，銀價昂貴，外國銀圓信用益高，故其價格較銀價漲度尤速。關於咸豐以前銀圓價格的變遷，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裏曾有幾段記載：『咸豐七年七月一日，是日收芝字號龍華洋三十五元，洋價錢千有十八文。』〔七〕又『二十三日，付光相寺僧洋錢五元，每元作錢九百九十七文，申水五十文，共計得錢五千二百三十五文。又付錢七百六十五文爲禮懺齋供之費。番銀自嘉慶時入中國，其初每錢直六七百文，道光間盛行，公私出入，非此不濟，直亦漸長至千二三百文。至咸豐癸丑歲，以寇警驟長至千九百文，去年忽以次減，又多新鑄及諸惡色，幾墮不行，今遂祇得此數。蓋此物視銀價爲消長，自大軍駐江南，以浙江省爲外府，稅銀盡以給軍，而卽變價易錢於浙中，及內府發帑銀者亦然。又銅錢極少，估舶多有私運銅錢出海及潛銷毀爲器物者，故大錢尤不多得。京師及閩中諸省多行鐵錢，銅貴而金銀俱賤矣。錢法之亂莫甚於此，以致商賈束手，細民不聊生，雖臺臣屢有言，而莫之能止，此亦足以觀世變也。今日番錢復減至九百七十三



文。』〔八〕『八年九月二十日，借得番錢二十元，每元一千二百零九文，合計錢二十四千一百八十八文。』〔九〕

從這幾段記載可以知道銀圓流入中國後，其初以銀價爲比例，每元值錢六七百文，約合銀六七錢之數。其後乃一直上漲，超過銀價。道光年間銀價每兩約千二三百文至千五六百文，而銀圓一元亦千二三百文，咸豐初銀每兩約錢二千文，而銀圓一元已千九百文。銀圓一元幾等於銀一兩的價格，這是一件極可注意的現象。至於咸豐七、八年間銀圓價格的跌落，那是由於：一、銀圓多新鑄及諸惡色；二、銀價因供給過多而下跌。這是一時的現象，故八年九月間，銀圓價格又同漲至一千二百餘文，而銀圓對銀兩的比價，則始終無減低的傾向。

關於上述期間銀圓價格變動情形，我們又可以從咸豐五年周騰虎鑄銀錢說中，找到重要的資料，他說：『江、浙行用佛頭洋銀，鑄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國……乾、嘉之時，其國在廣東省貿易繁盛，故其銀流入中國最廣，中國因而習之。後其國衰微，且所鑄洋銀已換新式，佛頭銀已於道光初年停鑄，所來中國洋銀愈用愈少矣。閩、廣各省有必椎爛用之，日漸其絀。江、浙商民樂其便易，市井貿易爲此信行。各錢店認定式樣，少有變更，則羣起叱爲僞鑄，巧定各種名目以抑勒民伍，至每圓洋銀貴紋銀一兩之多，出則呼爲淨光，入則苛爲爛板，移轉之間，銀已八折，商賈愁嘆，民客咨怨，莫究其由而坐受其困。即或夷人重鑄重者，各錢店又呼爲新板，坐以七折。』〔一〇〕

又許瑤光談浙裏有下面一段話說：『浙江喜使用洋銀，外洋銀餅一重止七錢，色且低潮，咸豐七年以來抵銀一兩，其軒輊已不可能。十年、十一年奸商借軒輊生波瀾，於往日光板、爛板、輕

板、鏤板之外，另生大槌（鑿痕深多者）、小槌（鑿痕淺少者）、淨光之名，以輕重相同之貨貝，而貿易相懸殊，旦夕之間，亦有漲落，把持盤剝，民甚病之。」<sup>〔二〕</sup>由此可知咸豐年間江、浙一帶外國銀圓價格之變動，其原因不外：一、流行已廣；二、數量減少；三、錢店商人從中操縱。而在江蘇方面早有銀商乘漕運季節操縱銀圓價格之事。<sup>〔三〕</sup>

## 二 近代中國流通的外國銀圓

在咸豐以前，外國銀圓流入最多，使用最廣的，是西班牙的佛頭銀圓，其使用區域為江、浙、閩、廣等省。接踵而來的是墨西哥的鷹洋，其後英國的香港銀圓，法國的安南銀圓，美國的貿易銀圓及日本銀圓，均先後輸入，風行全國。至光緒末年，這些銀圓或因各該國改革幣制本位，或實行停止鑄造，來源漸絕，形勢始為之一變。當光緒、宣統之際，流通最廣的是墨西哥的鷹洋，在北京亦通用，而在各通商口岸，則信用尤著。其次是香港銀圓，亦暢行於華北各省，日本銀圓則盛行於福建；流入最早的西班牙佛頭銀圓，則僅見流通於安徽省地方。<sup>〔四〕</sup>茲將各種外國銀圓在近代中國流通情形分述如下：

一、西班牙銀圓，俗稱本洋，係公元一五三五——一八二一年間西班牙所鑄的銀幣，其成色較遜於鷹洋。原定成色為千分之九三七，一七二八年減為千分之九一六，重量亦遞減百分之一。五；一七七二年成色又復減為千分之九〇二又九分之七。本洋實出於墨西哥，因墨西哥在當時為

西班牙屬地，且幣面又鑄有西班牙皇帝的肖像，所以稱爲西班牙銀圓。當中世紀時，墨西哥已爲世界產銀最富的區域，自一五三五年起，墨西哥城即建有造幣廠，以巨量生銀，鑄爲銀幣，輸往西班牙、印度、菲列賓等處流通，其後復由該處轉輸入中國，外幣來華當以此爲最早。

西班牙銀圓之流入中國，最早約在十六世紀末年或十七世紀初年，最初的輸入地爲廣州。廣州自一七五七年後約九十年間，爲中國對外唯一通商口岸，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獨攬遠東商務，對廣州交易頻繁，多以茶絲及其他土產，由該埠輸出國外，採購時大都以本洋付價。該公司自與廣州及澳門通商後，輸入大宗銀洋，以償付所購貨值。

自十九世紀初年起，美國亦開始與廣州通商，當拿破崙戰爭時代，商務尤爲繁盛，所收購者以茶爲大宗，償價時亦多付本洋。

當時本洋已爲中國相當普遍流通的銀幣，其勢力漸蔓延到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安徽、直隸等省，直到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止，凡沿長江各地以及上海，皆有其蹤跡。商場交易多用此幣，銀行所開匯價亦以此爲根據，但當道光二十年左右本洋已停止鑄造，來源漸竭，不久在各省市價逐步上漲。當十九世紀中葉時，本洋在中國市場，因供不應求，市價漸較前高漲八成。

本洋價格既日益高漲，商務深受其害，於是到咸豐五年，上海當局爲謀補救計，通告無論何種銀幣，祇須成色重量一律，皆得通用，不加差別。次年上海商界記賬單位，遂改爲九八規元，根本廢止本洋不用。據說上海各銀行及商業機關改用規元記賬時，本洋的市價適漲到與規元價值相等，所以賬簿上只須易數字單位名稱，數字無須改動。

自此以後，本洋既已失勢，而墨西哥及南美洲貨幣由廣州輸入，亦漸及長江一帶。鷹洋勢力乘勢興起，本洋竟被驅逐，僅蕪湖等地略有流通。因本洋原在該區極為盛行，信用最堅，價格亦最高的緣故。(二)

二、墨西哥銀圓，係墨西哥獨立以後鑄造的銀幣，因幣面花紋有鷹鳥，故俗稱鷹洋，普通則又誤為英洋，華北各地則多稱「正英」。墨西哥一八二一年脫離西班牙獨立，一八二四年遂創行所謂墨西哥銀圓。其成色定為千分之九〇二又七十二分之六十五，但實際不逾千分之八九八，純銀平均三百七十四英釐。

墨幣初入中國在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時，最初在廣州流通，嗣因本洋停鑄後來源稀少，市價高漲，上海外商紛請其領事轉請中國當局，准墨幣與南美洲銀幣，得與本洋一律在國內自由流通。但因當時中國商人所存本洋數量甚鉅大，其收價遠在實價以上，若墨幣流入，本洋勢必跌價。中國商人對此舉堅決反對，故其初未能順利進行。這時候上海金融市場，漸趨緊張，每日拆息高至一兩八錢至二兩(計為周年七分)，而本洋的來源既絕，藏有本洋的人，遂愈加視為奇貨，本洋雖為上海的記賬銀幣，而實際此幣已不可得。惟貨物授受之際，終需以貨幣為媒介，遂相率改用銀兩。及至一八五六年，即銀兩亦不可多得，乃不得不用墨幣。大抵墨幣的准入上海，即始於是年，自是墨幣與銀兩並行，不久，墨幣的勢力即由上海而延及長江一帶。

墨幣在世界各地，以中國流用最廣，而外國銀元流入我國的，亦以墨幣為最多。據可靠的估計，當一九一一年時，中國全國所流通及貯藏的墨幣，總額在四萬萬至五萬萬圓之間。行使最普

遍的地區爲華東及華南一帶地方，上海一地幾以此爲主幣，爲通貨授受的標準（清末民初上海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皆以此爲兌換準備），其市價往往超過中國銀圓之上。惟北方各地，以多樂用『人洋』，故行市常在中國銀圓之下。

墨幣之所以能如此通行，主要的是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經濟侵略勢力的日益擴大。初流入中國時，係按重量計值，其銀色則按中國標準作九成四計算。墨幣代本洋而爲中國主要流通貨幣，約六十年，自一九〇五年五月一日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貨幣單位改爲金比沙，墨幣來源斷絕，其在中國的勢力始漸衰。

三、英國銀圓，俗稱人洋，又稱『站洋』，亦有稱爲『香洋』或『立洋』的，因幣面花紋有人持杖站立，故產生種種不同名稱。此幣有兩種，一爲一八六六——一八六八年間香港舊造幣廠所鑄的，一爲一八九五年以後印度造幣廠所鑄的，其目的都是在抵制西班牙銀圓及墨西哥銀圓在英屬地的行使。

自十九世紀初年，英政府即竭力謀以其自鑄銀幣，代替其領土內的墨幣，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努力，卒將墨幣由美洲屬地完全驅出。一八四一年香港被英侵佔後，一八四四年其當局即定英國貨幣爲當地的標準貨幣，但因中國商人重視銀幣的重量，而英國貨幣較輕，含銀量亦甚低，遂皆折扣行使。英當局知不能收驅逐墨幣的實效，乃於一八六四年在香港設立造幣廠，改鑄新幣，務使其重量成色以及外表形式等均足適合中國商人之要求，以達到其驅逐墨幣的目的。一八六六年新幣鑄成，但因其含銀量較墨幣減三英釐，仍祇能折扣行用。經二年的試驗，結果失敗，乃於

一八六八年將全部造幣機轉售於日本，綜計此次在香港所鑄祇二百萬元。經此次失敗後，英人已無勇氣再作嘗試。故屢經新加坡、馬來半島、香港等處的商業團體，請求續鑄新幣，迄未允行，其後直至一八九五年因種種關係，英政府始決定作第二度嘗試。當時印度各造幣廠適因停止鑄造羅比而閉歇，遂令孟買及加爾各答的造幣廠，鑄造一種新英幣，此幣又名英國貿易銀圓，其成份與一八六六年在香港所鑄的相同，成色九〇〇，據南京造幣廠的分析，計重庫平〇·七二四三兩，淨重〇·六四七八兩。幣的正面鑄有英國女王像，正反二面皆鑄有中國式花紋，背面鑄有中文『一元』二字，並有馬來文表示幣值，主要的殆為用於對華貿易。此幣鑄造後，在中國竟能通行無阻。最初因鑄造地接近粵桂，且英國商業在廣東最佔優勢，故粵省通行最盛，義和團運動（一九〇〇）以後，北方各地亦多使用，京津尤為盛行。市價大抵北高南低，在北方每較我國之龍洋及墨西哥鷹洋尤高，大概由於北方人樂於使用的緣故。惟上海方面未嘗見其蹤跡。總計自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三年間，所鑄為一五三、三六一、五九四枚，其流入中國的數額，當不在少數。

四、日本銀圓，因幣面鑄有龍紋，故俗稱龍洋或龍番，為日本明治時代通用的銀圓。初因鑄幣在日本境內，亦甚通行，日政府乃謀自鑄貨幣以替代之。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由香港購得全套鑄幣機器後，一八七一年即令大阪市國立造幣廠開始鑄造銀幣，定名為『圓』，成色九〇〇，據南京造幣廠的分析，其平均重量為庫平〇·七二二三兩，含純銀計重庫平〇·六四七三兩。此幣初盛行於馬來半島、新加坡、朝鮮、安南及暹羅等地，一八九七年日本改行金本位後，始大量輸入我國。其流通區域，大抵南方以福建為最盛，其次為湘、贛二省，北方則自日俄戰爭後，奉

天(瀋陽)大連等地流通始盛。

五、安南銀圓。乃法屬安南所造的銀幣，用以抵抗在其境內流行的墨幣與美國貿易銀圓。成色重量皆較次於墨幣，與「人洋」略同。流用以後，墨幣即漸被驅逐於安南境外。自一八九五——一九〇三年，計鑄五千五百萬枚，流通於其國境內外，其在中國的流通範圍甚狹小，僅與安南接壤的滇、桂邊境通用。

六、美國貿易銀圓。美國的銀圓，當一七九六年(嘉慶元年)即有流入中國，因當時中美間已發生貿易關係，故輸入銀圓以償貨價。此種銀圓「其重量與西班牙之本洋相等，惟成色略次。」一八七三年美國國家造幣廠又另鑄一種銀幣，專供遠東貿易之用，這就是所謂美國貿易銀圓。較墨幣銀質為高，發行後頗受遠東歡迎，但因發行後四年，銀價猛跌，原定值美金一元零四分的比價不能維持，於是不得不一面停止鑄造，一面限期平價收回。故此幣流入中國後，僅於通商大埠作曇花一現。

七、其他。南美玻利維亞、智利、尼加拉瓜及祕魯各國，中世紀產銀豐盛時，亦鑄有銀幣，此等銀幣亦經西班牙商人之手與本洋一同流入中國，惟以成色不佳，遂被社會擯斥，未得流通。

此外，因英國中世紀時嘗嚴禁輸出本國銀幣，故英商在中國南方交易，不得已多以別國貨幣代替付值，結果各國貨幣經英商之手流入中國者種類甚繁，舉其要者則有德國的盾(ducaton)，法國的克倫(crown)，奧國的太勒(taler)，西班牙的批斯塔(peseta)，美屬菲律賓的比沙(peso)，以及新加坡銀圓等數種。

此外各國鑄造的銀輔幣（銀角或小洋）輸入我國的，有香港、日本、安南所鑄造的毫洋，但流通效力甚小，為數亦甚微。至於各國銀圓輸入的數額亦無詳細的統計數字可供參考。

流入銀圓重量成色表

地名(或幣名)	年	代	種類	純		每		每		每		備考
				銀	銅及雜質	庫	平(兩)	庫	平(兩)	庫	平(兩)	
墨西哥			一圓	九〇一・八二四	九八・一七六	〇・七二八四	〇・六五六九	〇・〇七一五				徵合金
站人			一圓	九〇四・七〇六	九九・二九四	〇・七二二二	〇・六五三四	〇・〇六八八				
香港			一圓	九〇一・六九七	九八・三〇三	〇・六二五一	〇・六五〇六	〇・〇七〇九				
英皇相			一圓	八九九・四〇六	一〇〇・五九四	〇・七二二〇	〇・六四九四	〇・〇七二六				
日			一圓	八九四・四〇五	一〇五・五五〇	〇・七二四三	〇・六四七八	〇・〇七六四				
			二十仙	七九五・九七〇	二〇四・〇四〇	〇・一四二三	〇・一四七一	〇・〇二九三				
			十仙	七九八・九七五	二〇一・〇二五	〇・〇七一五	〇・〇五七一	〇・〇一四三				
本	明治三十七年		一圓	八九七・四六五	一〇二・五三五	〇・七二一五	〇・六四七三	〇・〇七三九				
	三十一年		五十錢	八〇三・一八〇	一九六・八二一	〇・五五八三	〇・二八七八	〇・〇七〇五				
	三十七年		二十錢	七九六・九六五	二〇三・〇三五	〇・一四五二	〇・一一五六	〇・〇二九四				
	三十二年		十錢	七九六・九六五	二〇三・〇三五	〇・〇七一六	〇・〇五七一	〇・〇一四五				

三 外國銀圓流入的原因及其影響

外國銀圓何以會大量流入中國呢？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於乾嘉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隨着



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華的日益伸張，外國銀圓遂得僭竊了中國本位貨幣的地位，成為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有力的工具。當然，我們也不應忽視當時中國幣制的落後情形，給與外國銀圓以可乘之機。乾嘉以來日益發達的中外貿易，需要一種簡單劃一便於計算攜帶，及成色重量準確的銀幣，以利中外通商貿易的進行。而當時中國所通行的銀兩制度本身却有着這許多嚴重的缺點，其不能適應當時實際的需要，不言可知。銀圓則恰恰和它相反，形式劃一，名稱單純，成色和重量準確，計算和授受均極方便，加以外商的推行，所以我國商人『多樂用之』，雖政府嚴令制止，亦不能禁。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外國銀圓遂繼續不斷地流入。關於歷年流入的數字無可稽考，只是從前面所引蔣攸銘的奏疏裏，我們可以約略知道在嘉慶年間『每年夷船帶來之洋錢或二三百萬，或四五百萬元，』這種數字當然不詳確，不過當時中國對外貿易還是出超，每年流出貨幣當然較少，而每年竟有幾百萬的外國銀圓流入，則當時外國銀圓在中國的流通數量可知絕不在少數。其後中國對外貿易雖漸漸逆轉，但因外國銀圓在中國市場價格，遠超過其本身實際價值，以銀圓購現銀，有利可圖，所以外國商人多以銀圓套購中國現銀出口，外國銀圓的輸入並不因中國對外貿易的逆轉而減退。至光緒中葉以後，中國自鑄銀圓盛行，加以各國改革幣制，停鑄銀圓，於是外國銀圓的流入數量，始日漸衰退。及辛亥革命，幣制改革更積極進行，外國銀圓除一部分仍流出國外，其餘多被銷燬，遂致絕跡。

外國銀圓在中國流通的數量既如此其大，而流通的時間又有一二百年之久，對於中國經濟——

特別是貨幣制度，當然會發生很重大的影響，這是可想而知的。大體說來，外國銀圓流入中國後的影響約有以下幾點：

一、助長了外國資本主義的對華經濟侵略。外國銀圓的流入，就表面上看是促進了中國對內對外貿易的發展，近代國內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如果就貨幣方面來說，我們絕不能歸功於那只能適應封建的區域經濟的舊的銀兩與制錢制度，雖然表面上我們看到中外貿易還是用銀兩——海關兩計算，但那只是由於中國始終未能正式樹立健全的銀圓制度的緣故，而民間——特別是沿海的省份，很早就已盛行銀圓。所以近代中國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外國銀圓的使用，實在是貨幣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這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商業形態，外國銀圓在中國境內的流通，首先是起了資本主義經濟侵略急先鋒的作用，近代中國國內外商業的發展，主要是標幟着中國半殖民地化的深度。所以外國銀圓所起的這種促進貿易的作用，並不是值得歌頌，相反的我們應當由此記取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的一面。

二、促進幣制改革。中國舊有的貨幣制度，不能適應中外貿易發達後的新經濟情勢，這一點在光緒以前還很少有人注意，那時朝野人士都為銀貴問題鬧昏了頭，於是大家都想着如何抑平銀價，因而多數主張禁止「洋銀」通行，藉以減少現銀虧損，却很少有人主張仿鑄銀圓，一以改革幣制，一以抵制洋銀。只有林則徐在道光年間曾奏請自鑄銀圓，以資抵制，但為部議所駁，未能實行。其所自行仿鑄的，又因「其製渺小，全無法度，後又無法以行之」，終至「不用」。〔巴林氏顯

然看出了舊幣制應當改革，所以他不一味主張禁止洋銀，而主張仿鑄。他可算近代中國幣制改革運動的先覺者。其後在咸豐五年周騰虎作鑄銀錢說，謂「國家舊用銀錢兩種以平百物，厥後錢日賤而銀日貴，子母不相權而輕重殊絕，故洋銀起而承其乏，流轉於銀之高下而適得其平，民咸利而趨之。今洋銀之貴無已，若不爲之變通，則競趨爭用，其用愈急，其害愈深，病國病民，莫爲此甚！……故爲今之計，宜準洋銀分兩，鑄造銀錢。」這是更緊迫地喊出了幣制改革的呼聲。至於仿鑄銀圓，道光中浙江省曾鑄過一兩重的銀圓，想和洋銀並行，因民間阻滯而止。咸豐中上海朱裕源又鑄有一兩重的，亦行用未廣。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可以窺見外國銀圓所給與中國幣制改革的實際影響。

三、使幣制益趨複雜。中國舊來幣制的複雜，已如前述。外國銀圓流入後，並沒有發生革新的作用，亦爲共知之事實。它一方面似乎不斷地促進中國幣制的改革，一方面却也使中國幣制陷入更大的混亂。因爲外國銀圓流入中國後，也免不了染上封建的區域性的色彩，失却其本來的優點。第一是外國各種銀圓在中國流通的區域各有一定的地區，如西班牙佛頭銀圓初盛行於江、浙、閩、廣，後來則僅行於蕪湖，墨西哥銀圓僅暢行於華南及華中各省，英國站洋僅盛行於廣東及京津一帶，日本銀圓僅盛於福建，而湘、贛及奉天（瀋陽）、大連次之，安南銀圓僅通用於接壤安南的滇、桂邊境，而美國銀圓僅見於通商大埠。這種通行區域的限制，和中國各種寶銀之行使的區域性不是一模一樣嗎？而山東和奉天在道光前期，則又還根本不通用任何外國銀圓。（二）第二是外國銀圓在中國市場的價格，也因時因地而異，如道光十三年江蘇每洋銀一元換漕平銀七錢一二分，道光

十六年則可換八錢一二分。又如浙江銀圓價格，在嘉慶時每元值六七百文，道光時漲至千二三百文，咸豐初漲至千九百文，咸豐七八年間乃跌至千文左右。<sup>〔七〕</sup>這是各時期價格的不同。至於「價格因地而異者，如西班牙銀圓在蕪湖地方之特別昂貴，墨西哥銀圓之在南方價貴，北方價賤，站洋價格之北高南低，而江、浙洋銀價值向較閩、粵等省爲昂，……浙江貴於閩粵，江蘇又貴於浙江。」<sup>〔八〕</sup>第三各地商人使用洋錢習慣的殊異，「此地呼爲淨光，彼地則苛爲爛板」，在這種情形之下，外國銀圓在中國市場上流通，顯然已使中國幣制益趨複雜與混亂，再加以外國銀圓與中國銀圓之間又有價格的差異，更可以看出它紊亂中國幣制的惡影響。可是當時人却很少注意到這一點，他們認爲特別嚴重的問題是：

四、使現銀外流，銀價高漲。這是由於道光時銀貴錢賤，使全國上下都弄得焦頭爛額的緣故。他們都只痛感銀貴錢賤是影響國計民生最迫切的問題，而現銀流出是使銀價高漲的主要原因，洋銀與銀兩之不等價交換，又爲促成現銀大量流出的要因，因而認爲外國銀圓之流入，既使中國受到極大的虧損，復使現銀流出銀價高漲，遂主張禁止現銀出口，禁止商人以現銀與洋商交易，甚至有人主張禁止洋銀出口，或禁止使用洋銀，却不十分注意到它使中國幣制紊亂，而思所以改革幣制。在道光年間，如林則徐之主張仿鑄洋銀，主要的也還是以塞漏卮爲目的，其有以改革幣制爲目的者，乃是咸同以後的事。

〔一〕 見清朝經世文編卷廿六。

〔三〕 見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

- 〔三〕續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 〔四〕嘉慶東華錄。
- 〔五〕同上。
- 〔六〕王慶雲：石渠餘記附載洋錢條。
- 〔七〕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丁集第一頁。
- 〔八〕同上書丁集第六頁。
- 〔九〕同上書戊集第六十六頁。
- 〔十〕續清朝文獻通考錢幣二。
- 〔十一〕許瑤光：談浙卷上。
- 〔十二〕參閱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會奏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摺。
- 〔十三〕參看清水孫秉：清國貨幣論第二二頁。
- 〔十四〕參看蔡受百譯：中國貨幣論第一三七——一四〇頁。
- 〔十五〕見周騰虎：鑄銀錢說。
- 〔十六〕參閱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五，蘇省並無洋銀出洋摺。
- 〔十七〕見註〔七〕〔八〕〔九〕所引越縵堂日記。
- 〔十八〕同註〔十六〕。

## 第六章 代銀兩而起的銀圓制度

銀圓制度的產生，在中國近代貨幣史上是有革新的意義的。讀過第三章近代的銀兩制度以後，對這一點應可以充分的理解。再從前章所述『近代外國銀圓的流入及其影響中』，更約略可以窺見這一制度的歷史淵源。

### 一 自鑄銀圓的原因及其論爭

近代中國的銀圓制度，完全是摹仿外國，這是無可諱言的。其所以要摹仿的原因，第一，是外國銀圓流入後，得到了人民廣大的歡迎，並且收了促進對內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效果。第二，是流入中國的外國銀圓種類既繁，品質亦雜，加以各地的習慣與好惡，因而外國銀圓的價格，不僅因種類而各有不同，亦且因地區而高下各異，遂使中國幣制益趨複雜，使用益感不便，促進了幣制改革運動的發展。第三，是由於貿易入超與外國銀圓輸入，使現銀大量流出國外，銀價高漲，影響國計民生，因是有改革幣制以資救濟的必要。第四，銀圓的鑄造也和制錢一樣有利可圖，鑄造銀圓正是剝削人民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方法。所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上諭中有『鑄造餘

利儘數核實歸公』之語。第五，自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洞開，對外貿易日益繁盛，加以外侮與外國商品刺激下產生的各種現代企業的興起，也迫切需要一種現代性的新貨幣制度；我們看近代中國銀圓的正式大量鑄造，始於對外重要通商口岸的廣州與漢口，及中國近代工業的提倡者大官僚張之洞，便可透視此中消息了。

上述的諸種原因是連續地發生的，有的遠在嘉慶、道光之際即已存在，所以中國自鑄銀圓的論爭，在道光年間即已發生。第一個主張自鑄銀圓的是林則徐，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他在江蘇巡撫任內即奏請自鑄銀圓。從他那篇奏疏（一）裏可以知道：（一）在道光中葉的時候，外國銀圓雖在各地盛行，嚴重地影響到中國幣制與金融，而大部分守舊的人還是主張提高制錢的價格以抑低洋銀，甚或主張以政治力量禁止洋銀流通。林氏認為這種辦法是絕對有害，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的。所以（二）他主張官局自鑄每枚重五錢的銀圓，『輪廓肉好，悉仿制錢之式』。使民間流通使用，以資抵制。對於洋銀不必抑價也不禁止。（三）可是因當時專制嚴威甚盛，他不敢彰明較著的主張『摹仿夷錢』改變『祖宗成法』，自取罪戾。所以托辭於老商民的意見，並謂這是『推廣制錢之式以爲銀錢，期於便民利用，並非仿洋錢而爲之。』最後又說『錢法攸關，理宜上出聖裁，非臣下所敢輕議。』如此委婉曲折地說出他的主張。因此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窺見當時自鑄銀圓問題論爭的全貌。只是當時守舊的勢力還佔絕對優勢，故林氏主張被『部議駁不行』。戶部究竟根據什麼理由加以駁斥，無由得知。林氏不但是理論家而且是個實行者，後來他即會自行鑄造銀圓。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周騰虎著『鑄銀錢說』，亦主張自鑄銀圓，他說：「宜准洋銀分兩鑄造銀錢……一仿洋銀之式變其文字，以爲中國寶貨。……銀錢鑄成之後，准今之洋錢之價出入，取其盈餘給工值火耗外，尙可以通有無，足國用，贍軍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此之謂矣。」（二）

周氏著此論時，距離林則徐上疏請鑄銀圓的時候不過二十四年，兩兩對照，可知在這二十四年之間，全國上下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變。林氏主張鑄銀圓，還要說是『推廣制錢之式，並非仿洋錢而爲之』，周氏則直接了當的說『一仿洋銀之式，變其文字，以爲中國寶貨。』足證咸豐年間一般對於銀圓制度的進步性已不容懷疑。

光緒五年（一八八一）三月初十日江西試用九品龔榕請都察院代奏敬陳管見十二條，中有鑄銀餅一條，但被斥爲變更成法窒礙難行。（三）

光緒十年（一八八六）鍾天緯作擴充商務十條，其第四條卽爲鑄銀幣，他說：「論其行使之便，一曰成色定，二曰分兩准，三曰交易便，四曰取攜輕，五曰價值不易低昂，六曰花紋不易假造。較之元寶紋銀，傾銷之耗蝕，兌換之侵欺，扣短平而攙僞銀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欲收其利權，莫如中國奏明設局，購用機器，自行鼓鑄三品之錢。」（四）他這種議論較之周氏更徹底，他認爲當時的幣制已極端混亂，必須予以革新，大膽地說出外國銀圓較之中國的元寶紋銀，確具有許多優點，與其欲『設法禁止，而人情所趨，卒亦無可如何』，不如『奏明設局，購置機器，自行鼓鑄』，以收回利權而絕種種積弊，兼以發展商務。這就當時的財政金融的情形來說，是非常正



確的。他顯然是針對那些頑固的主張『設法禁止』銀圓之流而立論的。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二月兩廣總督張之洞奏稱：『廣東通省皆用外洋銀錢，波及廣西至於閩、浙、皖、鄂，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四川、前後藏，無不通行，以致漏卮無底，粵省擬試造外洋銀圓，每元重漕平七錢三分，今擬每元加重一分五釐，銀圓上面鑄『光緒元寶』四字，周圍鑄『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三分』十字，並用漢文洋文，以便與外洋交易，支放各種餉需官項與徵收釐捐鹽課雜稅及粵省洋關稅項向收洋銀者，均與洋銀一同行用。』〔三〕他依據國家財政與國際貿易的理由，主張自鑄銀圓，這時已經水到渠成，固然不同於五十四年前林則徐時代頑固勢力的雄厚，即和三年前也迥然不同。這時已不是應不應自鑄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合式，能與『洋銀一同行用』的問題。同時也少有人主張禁止洋銀了，所以他直接了當的說：『與洋銀一同行用』。這一方面是由於鴉片戰爭以來五十餘年之間，外國商品普遍銷入內地，中外貿易不斷發展，銀圓的便利，已爲人所共認，事實的發展，使頑固者再不敢有所主張。所以很少有人反對自鑄。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的結果，列強在華勢力日益膨脹，而中國則日益半殖民地化，所以一般統治階級也不敢公然主張禁止洋銀。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近代中國貨幣經濟發展的徑路，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國貨幣史上的半殖民地色彩。

## 二 仿鑄與官鑄

中國銀圓制度是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纔逐漸成熟，銀圓的鑄造也是如此。中國正式設局自鑄銀圓，雖始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張之洞的奏准，但在這以前已有過較長的歷史。

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即奏准『西藏鼓鑄銀錢，正面鑄漢字乾隆寶藏，背面鑄唐古忒乾隆寶藏字樣，邊廓添鑄年分，純用紋銀造成，重五分者，紋銀一兩易錢十八圓，重一錢者易錢九圓，餘一錢作為火工，其鑄錢工料，俱由商款備辦，毋庸動用官項。交駐藏大臣派員督同噶布倫等監造，驗明成色，不許稍有撓雜。』〔六〕這是近代中國自鑄銀圓之始。銀圓鑄造之所以開始於西藏，大體是由於與中亞諸國交通的影響；遠在西漢的時候，西域諸國即用銀錢，漢書西域傳裏說：

「罽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幕即漫也。烏弋山燕國之錢與罽賓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飾其仄，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漢以後與西域貿易日盛，到了南北朝的時候，以連年內亂，幣制敗壞，於是接近西域的河西諸郡，即雜用西域的銀錢。所以新疆、西藏這一帶地方是歷史上使用銀錢的地方，乾隆之批准西藏鑄銀圓，乃是適應這種事實的需要。不過這種銀圓的鑄造，與中國整個幣制無大影響，與近代中國的銀圓制度也無甚關聯。關於近代中國自鑄銀圓的歷史，嚴格的說起來，還是當從仿鑄說起。這裏所謂仿鑄有兩種含意，一是偽鑄即假造外國銀圓，二是私鑄，即仿外國銀圓的式樣，而另造一種中國銀圓。

盜鑄錢幣，在中國是和金屬貨幣官鑄的歷史相終始的，漢劉徹（武帝）的時候此風就極盛，清朝當然也不能例外，滿清一代就始終為盜鑄制錢所困惱，自外國銀圓輸入後，私鑄銀圓的行為

也隨之而起。於是「洋銀」偽，有夾銅、有蘇板、有鑽鉛，巧式新思，無奇不有。」（七）更有吳莊、錫板等名目。其初此等偽製銀圓，僅商民受其害，故未嘗下令禁止，後來因銀價高漲，白銀大量流出，滿清政府一面下令禁止白銀輸出，同時又恐怕「奸民」銷化白銀仿鑄洋錢，運輸出洋，所以在道光十幾年的時候，即頒佈了新律令，凡「奸民銷化白銀，仿鑄洋錢，即照白銀出洋之例，分別治罪。」同時依黃爵滋的奏請下令沿海各督撫查禁仿鑄洋銀出洋。這裏所謂「仿鑄」其實即是盜鑄，因為洋銀非中國官鑄，故對於人民的盜鑄，僅稱之為仿鑄。關於當時仿鑄銀圓的情形，林則徐在道光十五年的「蘇省並無洋銀出洋一摺中」曾予以證實。他說：「內地鎔化紋銀，仿鑄洋銀，如原奏（指黃爵滋奏——引者）蘇板、吳莊、錫板等名目，向來誠有此種作偽之弊。」由此可見嘉慶、道光年間有人偽鑄銀圓確係事實。民間私鑄的銀圓，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咸豐時期上海朱裕源鑄有一兩重的，但行用未廣。

由上所述，可知近代中國自鑄銀圓的歷史，實以民間的仿鑄開其端。而官府鑄造的又以地方政府自行鑄造為最早。鴉片戰爭前，林則徐在江蘇巡撫任內，上奏請鑄銀圓被部議駁斥後，曾自行鑄造銀圓，（有人說林氏乃在兩廣總督任內鑄造銀圓，但計林氏於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就任，十九年八月即罷免，時間既短，又在外交急迫中，恐未暇及此，當以在蘇鑄造為近於事實。）周騰虎鑄銀錢說謂：「林文忠鑄造銀餅，其製渺小，全無法度，後又無法以行之，宜其不用也。」馮桂芬罷關征議亦說：「侯官林文忠公造銀餅，初亦便用，未幾即雜質，民間析之為零銀，銀餅遂廢。」（八）林氏之鑄銀圓是失敗了，失敗的最基本的原因，還是由於在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壓力之

下，未能建立起信用。馮桂芬說得很對：『往嘗謂洋銀重七錢三分，實銀六錢五分，餘鉛八分，中國行用輒當八錢以上。中國仿造者雖無鉛亦不行，何則？識其爲夷製，即可信其有實銀六錢五分，若彼雜以銅鉛，亦非我所能識別，而彼絕不爲（？），是以通行。』〔九〕

在林氏前後，福建省當局也曾幾次鑄過銀圓。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福建省當局發行一種銀幣，形式彷彿西班牙之本洋，正面鑄壽星之像，像之左篆書『道光年鑄』四字，左右分列『足紋銀餅』四字，像身楷書『庫平柒貳』四字。幣之背面鑄一鼎。大約係在臺灣鑄造的。此幣製作甚粗劣，一八四二年重量漸減，一八四五年則已較前減百分之五。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福建漳州亦嘗有鑄幣之舉，與上述之一種同爲省當局所發行，且發行之目的皆爲供助軍餉，但二者之成色重量，截然不同。漳州之銀幣兩面皆漢字，無圖，正面上端鑄『足紋』二字，下端鑄『通行』二字，背面橫書『漳州軍餉』，下面草書『爲七十四』，係指幣重七錢四分。初次發行的重量尙能相符，而不久即減去百分之十五。〔一〇〕這種銀圓的鑄造，固然是由於『供助軍餉』，但基本的原因還是由於臺灣、漳州一帶爲對外貿易發達的地區，外國銀圓已普遍行使，和江蘇的情形相同，所以在這一方面說起來，也是適應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至於其失敗的原因也和林則徐大體相同。此外『道光中浙省會鑄一兩重銀錢，欲與洋圓並行，以民間阻滯而止。光緒初年，吉林機器官局所鑄有一錢、三錢、半兩、七錢、一兩五種，皆未見盛行。』〔一一〕

上述江蘇與福建等省地方政府的鑄造銀圓，雖屬官鑄，但似未得滿清政府明令許可，所以還不能算真正的官鑄，而真正的官鑄，當以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張之洞奏准在廣東開鑄爲始。

### 三 龍洋的鑄造

張之洞任兩廣總督，鑒於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實況，且設局自鑄銀圓可以擴張自己的經濟權力，即於光緒十三年二月奏准設立廣東造幣廠試鑄銀圓，於光緒十五年開始鑄造，十六年開始流通於市場。計分五種：一號庫平七錢二分，配純銀九成，二號三錢六分，配純銀八六成，三號一錢四分四釐，四號七分二釐，五號三分六釐，均配純銀八二成。幣幕鑄有龍紋，幣面爲光緒元寶四字，滿漢文合璧，上端鑄廣東省造，下端鑄庫平七錢二分等字。此爲官鑄銀圓的開始，亦爲龍洋的起源。遂由滿清政府下令，作爲中國的法幣，所有完納錢糧、關稅、釐捐等，均得使用此項銀幣。

廣東開始鑄銀錢的時候，原擬鑄一兩及五錢的，大約因李鴻章的建議，以七錢二分爲單位，鴻章於光緒十四年覆前出使大臣許竹簣書云：「機器鑄錢，製精工速，但未審銅鉛配搭成數若干，千錢需費若干，擬兼造銀錢重一兩或五錢，是道光中擬造銀錢舊式，彼時原擬搭作收放正款之用，故以二枚準合一兩，今欲行之通商各口，似不如竟仿英洋重式，則齊一而通行，兼可仿幾開小洋錢之製，自三錢六分以下至七分二厘，尤便行使，似不必拘定一兩、半兩之舊也。」（三）當時許氏是在粵，替張之洞出謀劃策，觀此亦可知張之洞後來爲甚麼主張以兩爲單位了。又李鴻章覆署香山縣正堂楊彝卿書云：「粵鑄銀圓，津市一律行用，與英洋不殊，想滬港各口岸，亦當通行無滯矣。」（四）這封信發於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可知初時流通甚爲順利。

隨着張之洞的調任湖廣總督，湖北亦繼廣東之後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設立造幣廠，鑄造銀圓。同時天津北洋機器局亦附鑄銀圓。又有御史易俊、陳其璋先後奏請仿照成法推行各省，而次年御史王鵬運則奏請「飭下戶部購買極大機器」在京鼓鑄銀錢，「用粵鄂鑄成之式，鑄成以後，頒發各省，特諭天下，一體通行，各省亦一律鼓鑄，以資利用。」在京局籌備期間，「應請旨飭下戶部先撥銀三百萬兩，專鑄大小銀錢，運京備用，通行各省籌款運粵鑄錢，俟機器到京，廠屋齊備，即由京局辦理。」經戶部議覆「以京城開鑄工匠生疏，不如仍就廣東、湖北兩省已成之局，加增資本，竭力擴充。」<sup>〔四〕</sup>不過，仍允許「沿江沿海各省，亦可自行設局」，於是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十月江南繼之設立江南鑄造銀圓制錢總局，次年又經戶部議准山東自鑄銀圓，其後四川亦於成都成立銀圓局，各局行動皆不受中央直接管轄，而龍洋的品質，也就從此開始龐雜起來了。

當時各廠所造銀圓，發生以下三種不良現象：第一，形式分量各省參差不齊，市價遂不免有高下。第二，各省所鑄銀圓皆標有本省省名，遂難暢行全國。第三，造幣機關既多，不久即難免有過剩現象，這些都是滿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事實的經驗與教訓，以及贏利的誘惑，使滿清政府感覺到統一鑄造的必要。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滿清政府即以各省設局太多，成色分量，難免參差，不便民用，着各省需用銀圓，歸併廣東、湖北兩省鑄造。並令「所有鑄造餘利，儘數核實歸公」。<sup>〔五〕</sup>這是滿清政府更進一步認識了銀圓的真價值，而一方面提高銀圓的地位，以廣流通。另一方面企圖統一製造，以改進幣質，並獨占餘利。其中當然也含有解決銀圓過剩的意義。

廣東所造銀圓品質已不甚好，還要使各省歸併去鑄造，可見當時他省所鑄品質低劣之一斑。

統一鑄造以改進品質，自然是很迫切的需要了。可是滿清政府這種願望並未能達到，因而銀圓的品質仍極龐雜，市面仍不能暢行。清續文獻通攷的作者慨然的說：「朝廷鑄龍圓，以濟民用，法良意美。明諭錢糧關稅，按成搭收。而一般虎而冠者迺多方勒掯，多方挑剔，自有銀圓而不知實用，偏實用外國人之銀圓，迨小民窮於應付，亦遂相率擯棄。烏乎！安得貪墨吏而盡罷黜之，聽其一家哭乎？」

整齊劃一的政策不能實行，銀圓龐雜的問題愈益嚴重，因而愈有統一鑄造的必要。於是「爲劃一銀圓形式起見，乃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設立鑄造銀錢總廠於天津。鑄造金銀銅三品貨幣。認爲各省『所鑄銀圓，規模絕異，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參差，以致民間顯分畛域，此省所鑄往往不能行於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銀圓之通行無礙。』因此主張『銀幣一項，俟定准分量成色，專由總廠鑄造，仍留南洋、北洋、廣東、湖北四局，作爲分廠。』這從表面看來，實是中國銀圓制度史上的一大進步。可是當時總廠所鑄實際只有銅幣，銀幣並未開鑄，這是由於：（一）鑄銅元贏利厚，且各省廠局多競鑄銅元以求厚利，銅元的紊亂龐雜，較銀圓更甚，所以儘先統一鑄造銅元，兼以圖整齊劃一。（二）當時銀圓的單位問題，有一兩與七錢二分兩種主張，爭論不決，必須俟『通籌定議』，始能開鑄。

關於第一點，將在下一章詳述，這裏祇就第二點加以說明。

#### 四 銀圓單位問題的論爭

從以上各節所述清季鑄造銀圓的歷史看來，即可知一兩與七錢二分兩種單位是同時存在，兩者本各有淵源，前者是淵源於舊有的銀兩制度，後者則仿自流入的外國銀圓。惟在光緒十五年官鑄未開始以前，這問題尚未被正式提出，乃至廣東、湖北等省相繼仿鑄七錢二分銀圓以後，即有人主張以一兩爲單位。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冬軍機處電詢各省督撫，銀圓應否改鑄一兩、五錢、二錢、一錢四種？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福建總督許應駙均電復請仍其舊，不必改鑄。這是銀圓單位論爭的開始。當時一般人對於現代貨幣學的知識極缺乏，不知道一國應確立本位貨幣制度，也不知道單位問題的重要，各省鑄造銀圓，皆因循苟且，以應一時之急。直至光緒三十年美國國際匯兌調查委員精琦（Jeremiah W. Jenks）建議滿清政府實行金匯兌本位制被拒絕以後，全國上下多主張用銀本位制，於是銀圓單位問題再被提起，同年八月湖廣總督張之洞上疏力陳「兩」單位的便益，他說：「從前各省所鑄銀圓，均依照墨西哥銀圓之重，合中國庫平七錢二分。中國從前尙未有定劃一幣制之議，所鑄龍圓，專爲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國銀貨進口起見，並未爲釐定通國國幣起見，本屬一時權宜之計，臣前年與坤一會奏，曾經陳明七錢二分重者，係依傍洋銀辦法，……中國一切賦稅，皆以兩錢分釐計算，而地丁漕項，爲數尤爲至纖至繁，每縣申票不下數十萬張，每人丁漕，多者幾兩幾錢，少者幾錢幾分，幾釐幾毫，幾絲幾忽，畸零繁重，若改兩爲元，實難折算。……若現定者既名爲國幣，然仍仿墨西哥銀圓成式，以庫平七錢二分爲率，則歷年墨圓已操積重之勢，中國權力事勢斷難阻使不行。……茲擬卽就鄂鑄造庫平一兩重銀幣，先行試用，以覘商情民情，兼體察各國商人情形，出納利弊。」〔六〕綜觀張之洞所述，他主張以兩爲



單位的理由：不外（一）中國人民繳納賦稅皆以兩爲單位計算，不便更改。（二）以元七錢二分爲單位，恐更不能對抗外國銀圓。而他的辦法，則是由湖北先行試鑄。

在當時他這種主張却得到了不少有力者的擁護，三十一年那桐等與袁世凱商量幣制，袁亦主張鑄造庫平一兩的銀圓，因此財政處遂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奏准幣制單位，定爲庫平一兩。其所持的理由，大體本於前引張之洞的奏章。當時並經戶部奏定銀幣分量成色章程十條，這是中國首次建立比較完整的現代貨幣制度，自從這個條例頒佈以後，銀圓的單位重量算是確定了。於是造幣總廠亦擬隨鄂廠之後開始鑄造以兩爲單位的各種銀圓。

然而，客觀的環境不適於這種新幣制的推行，滿清政府遂被迫不得不自動取消原議。到了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三月度支部以『原擬一兩銀幣，與各省舊鑄龍圓，重量不同，奏定以來，外間多以爲不便，鄂廠試鑄一兩銀幣，未甚行用，旋即收回鑄毀，各省所鑄龍圓，沿江沿海習用已久，若新幣照此鼓鑄，自可無滯礙之虞，即用以折合銅幣制錢，如大銀幣一圓折合七分二釐之小銀幣十角，小銀幣一角，折合十文之銅幣十枚，銅幣一枚折合制錢十文，均以十進位，亦易於操縱。似不如改從七錢二分之制，以便推行。』〔二〕遂於是年七月初九日頒布『新幣分兩成色章程。』這個幣制章程的頒訂，是表示新興資產階級佔了優勢，可是當時封建的大地主們在政府裏還是有其不可侮的實力，他們還是要出死力來維持舊的貨幣制度——銀兩制度，以便利其封建的剝削的。所以銀圓單位問題並未隨上述章程的頒定而即告解決。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滿清政府就銀圓單位和成色問題徵詢各省督撫意見，當時各省均有覆奏，計主張用一兩的十一省，主張用七錢二分的

八省，主張足色十成的四省，主張九成的四省。可見封建勢力是如何的使盡力量爭取銀兩制度的繼續存在。新興資產階級力量所支持的度支部也不示弱，當即具說帖，加以駁斥，說：『欲順商民之習慣，求貨幣之流通，似不如七錢二分之爲便。又中國寶銀，向無十足成色，以近日化驗，最高者尚不足九八五。』他們主張『一面試鑄通用銀圓，責成銀行相機操縱，以爲補助金幣之預備，一面設幣制調查局，寬其期限，廣徵專家，以求至當。』在雙方意見相持對立之下，滿清政府也不能下個判斷，不得已下令會議政務處及資政院總裁等會同妥議。這是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三月間的事。終因議論紛紜，數月無結果，至是年八月專使美國大臣唐紹儀回國，奏請實行商約，速定幣制。於是再令會議政務處速議，九月十一日政務處始會同資政院覆奏，主張先採銀本位，以一兩銀幣爲單位，成色用十成或九成，未定主見。而同日上諭却說：『中國兩錢分釐習用已久，實難廢改，着即定爲大銀幣一枚，計重庫平一兩，又多鑄庫平五錢之銀幣，以便行用。並附鑄減成之庫平一錢暨五分小銀圓，以資補助。其兩種銀幣，按九八足銀鑄造，兩種小銀圓，按八成八足銀鑄造。』這又是封建勢力的勝利。

自這個諭旨頒發以後，爭論數年的單位成色問題，似乎告一結束，但因未逾兩月，載灃（光緒）和那拉氏（慈禧）相繼病死，政局變動，過去的成案，都成了具文，同時新興的資產階級，亦堅決反對。上海總商會即會上書度支部說：『近改國幣，側聞各大臣持議不一，主張兩本位者，或以主權立論，或謂宜以兩計。商等謂主權之行於貨幣，在有不用外幣之實力，不在故矯外幣之重量，擾國內之物價以徇之。且度量衡各自有法，計兩乃衡法，貨幣則有自國法，混衡法於國法，比附

無理，而民生日用，實受其弊，鄂鑄之一兩銀幣，終難行用，可爲前車。」因此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度支部尙書載澤再議幣制，又主張實行元單位，認爲過去採行兩單位，是由於張之洞、袁世凱兩人的獨斷，並非出自慎重決議，這種辦法缺點甚多，難以實行。同年正月十四日度支部奏稱幣制重要，宜策萬全，經會議政務處議准由度支部設局調查。二月十二日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奏請兼鑄一兩及七錢二分之銀幣以一圓半合九七庫平實銀一兩，以期一舉兩便。四月初六日度支部奏准暫鑄通用銀幣，二年四月頒定幣制則例，這個條例規定了以元（七錢二分）爲單位，定銀圓爲國幣，積極廢除銀兩制度，並確定成色，停止各省自由鑄造，將鑄幣權統一歸中央。不久復奏進幣樣，雕刻祖模，於宣統三年五月寧鄂兩廠開始鑄造新式大清銀幣，定期十月發行，而辛亥革命爆發，所有鑄成的銀幣，提充軍餉，陸續隨市價流通市面，僅成爲通用銀圓之一種，於是若干年來的幣制改革運動隨着滿清的滅亡而告一段落。終滿清一代各省還只是鑄造通用銀圓。

## 五 龍洋的成色鑄額及其他

清季自光緒十六年以後二十年中間，銀幣制度問題，雖經過若干次的理論上的爭執和法制上的變革，但事實上一直到滿清滅亡，仍屬『通用銀圓』即重七錢二分成色九成的銀圓的世界。而由於統一的貨幣制度始終未能建立，這二十年間各省自由鑄造的銀圓，成色重量不但各省互異，甚至一省所鑄亦先後懸殊，這是近代貨幣史上極堪注意的問題。

據天津造幣廠報告清季各省所鑄大小銀圓成色重量如次表

地名	年代	種類	每千 純銀	分 銅及雜質	每圓重量 庫平(兩)	每枚含銀 庫平(兩)	每枚含銅 庫平(兩)	備考
廣東	光緒	一圓	九〇二・〇〇〇	九七・三〇〇	〇・七二四五	〇・六五四〇	〇・〇七〇五	合金極微
		二角	八〇四・〇〇〇	一九六・〇〇〇	〇・一四三三	〇・一一五二	〇・〇二八一	
湖北	光緒	一圓	七七〇・八三五	二二九・一六五	〇・〇七一五	〇・〇五五一	〇・〇一六四	合金極微
	宣統	一圓	九〇三・七〇三	九六・二九七	〇・七二二六	〇・六五三〇	〇・〇六九六	
	光緒	一圓	九〇一・六九七	九八・三〇三	〇・七二六一	〇・六五四七	〇・〇七一四	
湖南	光緒	半圓	八六三・七二〇	一三六・二八〇	〇・三五三五	〇・三〇五三	〇・〇四五二	
		二角	八二〇・〇八〇	一七九・九二〇	〇・一四一五	〇・一一六〇	〇・〇二五五	
江蘇	光緒	一圓	八二一・〇八五	一七八・九一五	〇・〇六八四	〇・〇五六一	〇・〇一二三	微合金
	光緒	一圓	九〇二・三三七	九七・六七三	〇・七二四六	〇・六三三八	〇・〇七〇五	
	光緒	一圓	九〇二・七〇〇	九七・三〇〇	〇・七〇七四	〇・六三八六	〇・〇六八八	
		二角	八二一・三〇四	一七八・六九六	〇・一四二八	〇・一一七二	〇・〇二五六	
北洋機器局	光緒	一圓	八二四・三〇三	一七五・六七七	〇・〇七〇六	〇・〇五八二	〇・〇一二四	合金極微
	光緒	一圓	八九〇・六六四	一〇九・三三六	〇・七二八九	〇・六四九二	〇・〇七九七	
北洋	光緒	一圓	八九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〇・七三九六	〇・六五八二	〇・〇八一四	微合金
	光緒	半圓	八四〇・八四五	一五九・一五五	〇・三六一五	〇・三〇四〇	〇・〇五七五	
	光緒	二角	八〇九・七二九	一九〇・二七一	〇・一四〇九	〇・一一四一	〇・〇二六八	
奉天機器局	光緒	一角	八一二・七四八	一八七・二五二	〇・〇七一五	〇・〇五八一	〇・〇一三四	合金極微
	光緒	一圓	八五六・五六二	一四三・四三八	〇・七二四七	〇・六二〇七	〇・〇一四〇	
奉天	光緒	一圓	八四四・五二六	一五五・四七四	〇・七〇五六	〇・五九五九	〇・一〇九七	
東三省	光緒	一圓	八九〇・〇六六	一〇九・九三四	〇・七一九九	〇・六四〇〇	〇・〇七九一	微合金
	光緒	半圓	八九〇・〇六四	一〇九・九三六	〇・三六二五	〇・三二二六	〇・〇三九九	



靠，雖不得而知，但大體可以作為推算的基礎。按辛亥革命後二二年間，各省造幣廠局僅江南、武昌、成都數處稍鑄一元銀幣，則上列數字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係清季所鑄。總之清季龍洋的鑄額必在二萬萬元左右，以當時生活指數及行使區域而論，為數亦不為小。

這裏我想附帶的敘述一下與銀圓有密切關係的銀輔幣。

由於銀圓的鑄造，對於金融界發生了極好的影響，同時又因為中國大部分人民生活程度甚低，平時互相授受的貨幣，大都為銀輔幣及銅元，大銀圓尤嫌價值過鉅，不適於用。所以銀輔幣的社會需要異常迫切。廣東造幣廠首先於光緒十六年與大銀圓同時開鑄，成色千分之八二〇，初發行時頗受各界歡迎，但因其成色較低，鑄造易於獲利，各省遂爭相設廠鑄造以圖利，結果市價日漸降落。原定一角銀幣十枚合大洋一元，至此即被打破。從此以後價格即升降不定，而各省造幣廠競爭愈烈，輔幣的市價亦每况愈下。各省當局復將成色減低，最初是祕密進行，但事實終於不能掩蓋，成色愈低，則市價愈跌。

銀輔幣的種類，最初在光緒八年吉林機器局鑄有一錢、三錢、半兩、七錢等四種，後來四川又鑄有八分至三錢二分三種。但皆不過一時之制。光緒三十一年十月財政處奏定銀幣分量成色章程，規定輔幣有五錢重、三錢重、一錢重三種，三十三年七月度支部奏定新幣分量成色章程，規定輔幣三種：（一）五角，重三錢六分，（二）二角，重一錢四分四厘，（三）一角，重七分二厘。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又奏定幣制則例，規定銀輔幣三種，分五角、二角五、一角，五角的重庫平三錢六分，二角五分的重庫平一錢八分，一角的重庫平八分六厘四毫。至於清季所鑄銀輔幣的數額據民國二

年十二月財政部調查天津等十七處銀元局廠所鑄數額爲五角者三二、二七九、四二一枚，照十進制計算，折合一六、一三九、七一〇·五〇元，二角五分者一、一四一、〇〇〇枚，折合二八五、二五〇元，二角者一、二三二、八六〇、四四二枚，折合二四六、五七二、〇八八·四〇元，一角者二三五、〇〇四、二一二枚，折合二三、五〇〇、四二一·二〇元，五分者五、一七四、六六九枚，折合二五八、七三三·四五元。共計所鑄銀輔幣爲一、五〇六、四五八、七四四枚，按十進制折合二八六、七五六、二〇三·五五元。這裏頭當然也有一部分爲民元以後所鑄，但至少應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清代所鑄的。

各省所鑄銀輔幣，以粵省爲數最鉅，其中尤以二角的爲最多。成色最高的首推東三省，最低的則爲北洋的五角、二角及廣東的一角銀輔幣。滿清政府對於此等混亂複雜的銀輔幣，迄少確定的辦法。光緒三十三年雖經一度決定大銀幣一元折合小銀幣十角，小銀幣一角折合十文銅幣十枚，均以十進計算，但沒有能够實行。故銀圓與銀輔幣的兌價，始終是不固定的。至於宣統二年幣制則例中處置舊銀輔幣的規定，更是一紙空文。

## 六 銀圓制度的進步作用和缺點

由上所述，對清季數十年間的銀圓制度，大體上可以知道一個梗概：第一，我們知道隨着清季各種企業及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以及貨幣改革運動的擴大，新的貨幣制度已在發生和成長，雖然

在當時不斷的遭遇到外國侵略勢力及國內頑強的舊制度和舊勢力的阻礙和破壞，但它總是不斷的在成長，逐漸的消滅那些舊勢力和舊制度。這我們可以從銀圓的法律地位的取得，以及銀圓行使的廣度和深度——即一方面銀圓通行的區域已遍中國各地，一方面不但民間日用普遍行使，即政府收支亦很多改用銀圓。——等方面得到足夠的證明。所以在滿清末年銀圓制度至少是一般人觀念上所共認的進步的貨幣制度。第二，我們知道由於銀圓制度的逐漸確立以及自鑄銀圓數量的日益增多，相對的減削了外國銀圓的在華流通額，以及寶銀的流通範圍和數量，使中國幣制進入現代化的第一步，同時又促進了各種產業及國內外貿易的發展。所以清季金融交通及各種新式企業的勃興，銀圓制度當亦為重要因素之一。總之，清季的銀圓制度，是表示中國貨幣史的向上發展，也是表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向上發展。

可是，從另一方面觀察，則清季的銀圓制度尙屬初期形態，其本身尙含着許多未曾克服的缺陷與矛盾。

第一，始終未能確立銀圓本位的幣制。因為近代的所謂本位貨幣，必須（一）政府統一造幣權（二）每一單位成色重量相等，（三）幣面價格與市場價格相等。而清季銀圓的鑄造權始終是屬於地方封建勢力的各省督撫，各督撫自由設局鑄造，中央政府無力過問。各督撫爲着自身一時的利益，不惜減低成色大量鑄造，所以數量既無限制，成色尤不能一致，因此幣面價格與市場價格發生很大的差額。清代自鑄的銀圓可以說始終沒有照幣面價格行使過，在計算的場合和生銀並沒有什麼差異。這就使生銀作爲貨幣使用的地位強固地存在，而外國銀圓更得在中國市場上橫行，



增加了中國貨幣制度的複雜性與脆弱性，另一方面則投機的銀錢業者得以乘機操縱銀圓市價，使金融市場混亂，影響及於各種產業的發展。

第二，單位問題的論爭幾乎與清季銀圓制度相終始，這是確立健全的銀圓制度的致命打擊。本來一兩與七錢二分——亦即兩與元的單位之爭，乃是反映舊幣制與新幣制之爭，而不是什麼貨幣學理論之爭。主張以七錢二分為單位的人，也承認「並非謂衡以學理非如此不可，不過認為事實上所最便利而已。第二，現在國中用枚數計算貨幣之習慣，沿江沿海一帶已漸養成，而所用每枚之重量，實以七錢二分為標準，其指取物價之力，日見普及，驟易他量，徒淆亂聽聞，致金融擾亂之範圍太大。第二，歷年官局所鑄銀圓，皆用此項重量，其現存於市面者，已逾二萬萬元之多，改制伊始，最宜設法利用之，以充暫行媒介品，以供兌換準備，供新幣未鑄備時，稍得周轉。以此二理由，故認六錢四分八釐（純銀）為最適當也。」〔二〕這確是持平之論。然而元單位事實上是出自新興資本家的要求，而兩單位則為封建的豪紳地主所維護，在當時兩者的勢力甚相頡頏，所以這個問題紛爭無已，它不是單純的單位之爭，而是舊幣制對新幣制之爭。代表封建利益的人們，要出死力來藉此以維護舊幣制的存在的。這又是封建勢力表現在幣制問題上來阻礙新經濟的發展。而帝國主義的列強在這個場合表現得更為複雜，一方面各國政府與中國簽訂商約雖希望中國有統一的國幣制度，以利通商，而一部份在華外國銀行則盡力阻撓新幣制的推行，希望保存銀兩制度以爲操縱漁利的地步。這又是半民殖地的中國的必然的遭遇。在這種情形之下，銀圓制度要達成它的歷史任務，自然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 〔一〕 林則徐：會奏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摺，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一。
- 〔二〕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四。
- 〔三〕 見李慈銘：越縕堂日記節錄邸抄。
- 〔四〕 鄭振鐸：晚清文選第一六八——一六九頁。
- 〔五〕 見張文襄全集。
- 〔六〕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 〔七〕 見周騰虎：鑄銀錢說。
- 〔八〕 晚清文選第一〇〇頁。
- 〔九〕 同上。
- 〔一〇〕 參看耿愛德：中國貨幣論中譯本第一五七頁。
- 〔一一〕 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二編第二頁。
- 〔一二〕 見李文忠尺牘。
- 〔一三〕 同上。
- 〔一四〕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 〔一五〕 同上。
- 〔一六〕 張之洞：奏請自鑄一兩銀幣疏，見張文襄全集。
- 〔一七〕 度支部：奏請先行試鑄通用銀圓疏。
- 〔一八〕 見民國三年幣制條例及施行細則理由書。

## 第七章 代制錢而起的銅元制度

制錢制度一經鴉片戰爭前後銀價昂貴的打擊，已瀕於崩潰，再經太平天国革命期間戰爭的影響，遂不可收拾。戰後滿清政府雖力圖恢復制錢的信用，但終因不能適應客觀的需要，而歸於失敗，於是銅元便代之而起。

### 一 從大錢到銅元

從銅元的形式來說，是摹倣近代外國的銅輔幣，很顯著的是摹倣香港的銅仙。但從中國近代貨幣史的發展來說，銅元與大錢却又是一脈相承。因為第一，大錢與銅元原有着不可分解的關聯，大錢在咸豐朝初鑄時雖有當五、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七種，但因流通阻滯，不久即廢棄當五及當二十以上各種，僅鑄造當十一種，這種大錢當時在市面上已流通無阻，漸漸有代替制錢的趨勢。因舊制錢多被私燬，新制錢亦僅有中央兩局略有鑄造，恢復制錢制度在光緒中葉曾一度擬議，旋鑒於事實上的種種困難——特別是銅價昂貴，而自動擱置。張之洞在廣州亦曾一度利用機器鑄造制錢，但不久因虧損過巨，即行停鑄。所以到了光緒中葉以後，

制錢制度的徹底恢復已成爲不可能，而當十大錢的流通已成習慣，銅元的鑄造即是乘着這種自然的趨勢，同時爲着適應中西通商日益發達後的經濟新情勢，兼以謀消滅私鑄，而將大錢的形式略加改變，仍以當五、當十、當二十計值，廣東最初雖摹仿香港銅輔幣以「仙」計算，但不久亦即變更。所以銅元雖在形式上是承襲外國幣制，而在精神上並且在中國貨幣史的發展上，都是和大錢一脈相承。第二，清季的大錢與銅元在本質上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大錢是代表制錢的，固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屬於制錢的體系，銅元仍然是代表制錢的，僅在形式上改變了，實質上還是沒有脫離制錢的體系，這從它的以「文」計值及其與銀幣無固定比價上，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是大錢與銅元本質相同之點一。大錢的鑄造，是基於財政上的理由，即是作爲膨脹通貨的手段，以救濟財政上的急需，絲毫沒有改革幣制的意味。銅元的開鑄大體也是如此，至少各省當局的用意是如此。首先李鴻章在廣州之始創銅元，其目的即在圖得贏餘以供給省政經費，其後各省之紛起仿鑄，其用意更屬顯然。這是大錢與銅元本質相同之點二。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清季的銅元，實質上還是繼承着大錢制度。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在嚴格的意義上，清季的大錢和銅元並無制度新舊之分，銅元雖承襲外國幣制的形式，但精神上仍和大錢制度一脈相承，本質上仍屬於制錢制度的體系，並且與大錢同樣的，政府是用來作爲膨脹通貨的手段，絲毫沒有改革幣制的意味。所以從貨幣史的觀點來說，銅元與大錢是一脈相承的。只是銅元始終能對制錢保持當十身份，不像當十大錢一出，不久即跌至每枚當制錢兩文，這是銅元和大錢不同的地方。因此銅元在實際上却是代制錢而起的新

的貨幣單位。

## 二 銅元制度及其演變

當恢復制錢的計劃受到了事實的阻礙，而大錢的信用又無法重建之際，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其璋曾奏請「鼓鑄大小銅元三品，一品重四錢，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補制錢之不足」，而未見實行。可見以銅元代替制錢大錢的擬議，早在廣州開鑄銅元之先。及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廣東因停鑄制錢而鬧着錢荒，相對的自然也增強了「外洋銅仙」的流通能力，恰巧又碰着一個洋務派的總督李鴻章，所以銅元便適時開鑄了。是年六月先行試鑄二等銅仙，即每枚重二錢，當制錢十文，以紫銅百分之九十五，白鉛百分之四，點錫百分之一配合鑄成，直徑二十八耗，形式精美，為白銅元之最精者，一面鑄光緒通寶四字，內加滿文廣寶二字，周圍鑄廣東省造，並分鑄每百個換一圓字樣，一面中鑄盤龍，四周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字樣，意即「廣東一仙」。此種制度明係摹仿香港貨幣。花紋細緻，中部無孔，均為進步的明徵。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以前的銅幣單位都以「文」計，至是始改為「仙」，完全和銀兩與制錢脫離了關係。可是到了光緒三十年就仿部鑄當十錢法改鑄每個當制錢十文了。

銅元鑄行之後，頗受社會歡迎，次年適當義和團起義之後，鉅額賠款使滿清財政益陷不支。戰爭失敗的教訓，也使它不得不有所改革，所以當時曾頒布了種種改革計劃。關於幣制方面，因

見廣東鑄造銅元，已著成效，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設廠仿鑄，各省當局大都知道鑄造銅元可以獲利，欣然受命。於是各省造幣廠紛紛成立，大鑄銅元。其初因所鑄無多，「極爲人民所樂用，不但按幣面每百枚換洋一元，有時且超過幣面價額。據海關報告，當光緒三十一年以前，在膠州銅元每八十枚即兌洋一元，同時安慶則一元合九十五枚。光緒二十八年，蘇州一元合八十八枚，同時杭州合九十枚。三十一年寧波平均合九十五枚，是年在上海則每元合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見當時人民歡迎此新式銅元的實況。其發行價格雖規定爲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時在市面竟加升水自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其時各省中有未及享鑄造銅元之利者，見而羨之，紛向外國採購機器，建廠鑄幣，進行異常熱切，且多視鑄幣爲籌款之捷徑，結果產出大宗銅元。銅元既由各省獨立鑄造，式樣自難一致，又各省當局防利權外溢，常禁止鄰省銅元入境，結果市價漸跌，在金融市場引起不少糾紛，最後卒由政府出而干預。」（一）

對於各省自鑄銅元可能發生之流弊，政府事先曾設法防止。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七月戶部奏稱各省仿鑄銅元宜妥定章程，務使有利無弊，方能與制錢相輔而行。但因地方督撫均視銅元爲籌款手段，未嘗有革新幣制之意，所以結果銅元的信用仍然不能維持。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滿清政府爲了與各省封建割據勢力爭奪鑄銅元餘利，並維持銅元的信用，曾採取了進一步的措置。當時銅元制度的病象，具體的說起來，約爲（一）銅元的幣面價值與所含銅質相差甚大，而鑄局太多，鑄額又過鉅，形成通貨膨脹，因而流通阻礙，價格跌落。自二十七年下令各省設廠仿鑄銅元起至三十一年年底止，「開鑄已有十七省，設局多至二十

處。』所鑄銅元總額由三十年之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萬枚，激增至七十五萬萬枚。』(二)由於鑄局過多，各局所鑄式樣與成分自難一致，且有若干省份如湖南、浙江間用黃銅，對於銅元之流通及價格，均有不良之影響。(三)更由於流通阻滯價值跌落，而若干省份則以過剩之銅元向鄰省傾銷，若干省份則又下令禁止入境與行用，以保利權，糾紛迭出，幣制益趨紊亂。針對這種情況，滿清政府採取了如次的對策：

一方面設立戶部造幣總廠，統一鑄造，以期收回鑄造權並使銅元整齊劃一。該廠自二十九年三月開始籌建，三十一年竣工，同年五月初八日開機試鑄新制大清銅幣四種，大者重四錢，直制錢二十；次重二錢，直十；次重一錢，直五；又次重四分，直二。成色定為紫銅九五，配白鉛五。(四)不過後來實際鑄行的僅當二十、當十兩種而已。當二的未鑄造，當五的也極少。按原定的計劃是要把各省銅幣局廠合併，改為戶部分廠，這在三十年曾經財政處戶部奏准，但因當時各地封建勢力雄厚，『各省已成之局，勢難停廢。』三十一年復由戶部奏准，『由該將軍督撫認真督造，不得再行增設子廠，此外，未鑄銅元各處概不得仿照設局。』(五)以示限制。這與原定統一鑄造的計劃，已十九相違，可是連這一點也屬虛文，三十二年雲南省之開局鑄造銅元，即其實例。

另一方面與成立造幣總廠同時，又頒布整頓國法章程十條，企圖對當時混亂的幣制加以整頓。其中有關銅元的規定，要點如次：

(一)嚴定成色重量，(二)規定各種銅元的鑄造成數，(三)限制流通數量，(四)禁止傾銷

牟利。與統一鑄造計劃是互相爲用的，即藉整頓國法作爲實現統一鑄造的初步，手段雖異，目的則同。同年十月復進一步限制各局廠銅元鑄額，令江蘇、湖北、廣東等大省每日造數不得逾百萬，直隸、四川兩省每日造數不得逾六十萬，其餘各省每日造數不得逾三十萬。並定各省購買銅斤須經戶部核准，又照章令各省設立官錢公估等局，與戶部銀行，聯絡一氣，將銀銅各幣，定准價值，一律行用。三十一年二月又議定補救銅元辦法八項：（一）禁止大宗販運，（二）限制鼓鑄數目，（三）禁購銅餅，（四）購買銅斤，必先報部覈定，（五）官民紳商一律行用，（六）行旅攜帶銅元非逾二千枚，概不查禁，（七）市面行使不得自分省界，（八）銅元多寡應設法勻撥。這大體還是總括前定種種辦法。

同年七月又擬歸併全國銅元局廠爲九處，因當時全國銅元局廠已增至二十四所，『直隸、奉天、吉林、山東、河南、安徽、江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十一省，每省各立一局，餘如浙江一省設有兩局，湖北一省設有三局，湖南一省設有兩局，江南、福建兩省各設有三局。』所以有人建議在奉天、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廣東、江南、福建、雲南等九省各留一局，其餘一律裁併。〔五〕這些辦法原則上都是很好的，只是事實上並未嘗一一實行。因而銅元制度之紊亂日甚一日，延至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二月，當十銅元的市價，由當九、當八、當八半、當七，而跌至當制錢六文半。宣統元年銀圓每元可換銅元百七十八枚。銀價日貴，物價愈昂，滿清政府爲挽救這種經濟危機，採用了兩種緊急措施，即一面由度支部撥銀五十萬兩交順天府尹賤價收購銅元，以求提高銅元價值。並令各省加鑄一文新錢，以確保銅元當十之數。一面令各省局廠一律暫行停鑄



銅元數月，以減少產量，俾不致價值繼續下落。區區五十萬兩在京城雖可收一時平價之效，而對整個銅元制度，却爲用甚微。尤其是停鑄之令，首先不行於川省，江、鄂、湘、閩、浙、豫等省則請就現存銅斤，繼續鑄造，津、粵及東三省亦請將已購之銅，儘數鑄造，停鑄已等於虛文。流通量不斷加大，平準自更難收效。至於加鑄一文新錢之不能實行，正與制錢之不能恢復略同。其不能救銅元之弊，反增幣制紛擾，自不待言。所以此後各省銅元價格仍繼續下落。若干局廠遂被迫停鑄。在這期間一般對於銅元問題已有較正確的認識，他們知道銅元問題之所以嚴重至此，不純然是政治問題，同時是幣制本身有着缺陷。因而主張不但要設法整頓現行舊銅元，尤須從速釐定新幣制，另鑄新銅元。宣統元年張毓英等條陳銅元充斥請設法挽救一摺，卽其代表。而度支部議復的奏章，對於他們意見表示贊同，又足見滿清政府的態度。所以宣統二年四月十六日就頒佈了幣制則例，定銅幣分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因恐與舊銅元混淆，特聲明暫擬緩鑄。同時又定籌擬處置舊鑄銅幣辦法，規定：『在新幣發行伊始，舊銅元姑准民間照市價行用。』惟用數分年有限制，自新幣發行之日起，第一年銅元用數，每次以值銀幣三元爲率，第二年則以值一元爲率，同時並設法收回改鑄，如此行之二三年，其餘遺留市面者，或宣布作爲輔幣，或明示禁用限期。這種計劃算得周密，但未及着手實行，清朝就亡了。

依上所述，可知在清季短短十二年間，銅元制度却經歷着相當複雜的演變過程。單純就幣制來說：（一）廣東初鑄的一仙銅元是與銀圓聯系的，後來改爲當制錢若干文，這是與銀兩聯系的，幣制則例所規定的四種銅幣以分計值，又是與銀圓聯系，這正顯示着清季幣制的混亂。（二）中

中央與各省所鑄的式樣始終未一致，中央自光緒三十一年開始鑄大清銅幣，其式樣正面中鑄大清銅幣四字，四周上端作滿文，下端作當制錢十文五字，兩旁作戶部二字，滿文兩旁有漢文千支標明鑄造年份，背面中作龍紋，四周有英文 *Tai-Ching-Ti-Kuo Copper Coin* 及中文光緒年造或宣統年造字樣。其為各省所鑄的則大清銅幣四字中鑄省名一字，但為數甚少。又有一種宣統三年所鑄者，大清銅幣四字鑄於背面龍紋四周，正面則中作嘉禾花紋，內鑄十文二字，四周有光緒三年及百枚換銀幣一圓等字。各省自光緒二十七年開始仿廣東之制鑄光緒元寶錢，背面中作龍紋，四周環以英文，示鑄造省份及幣值，正面中鑄光緒元寶四字，上端鑄某某省造，或中作滿文，兩旁作漢字地名，下端作每元當制錢十文或無每元二字。（三）幣面分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一文等五種，資料紅銅者多，黃銅者少。每枚含淨銅量約重七·二五公分。此等變動，在短短十二年之間已算不小，但變動最大的還要算在幣值方面。

銅元價值的變動，以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為轉捩點，原來當十銅元的幣面價值是百枚兌銀圓一元，而在光緒三十一年以前，八十枚至九十五枚即可兌銀圓一元。三十一年以後情勢轉惡，自此至宣統末年，則由百一十枚增至百三四十枚始可換銀圓一元。即在三十一年以前，銅元在市面行使，可升水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而三十一年以後則須貼水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這一反覆，十餘年間，幣值減低了百分之九十，這比之大錢之跌落至百分之二十，雖較勝一籌，但作為平時的幣制來看，這種變動還是驚人的。

檢視了清季十二年間銅元制度演變的歷史，我們勢不能不推求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及其發生的

影響。

### 三 紊亂的原因和影響

推究清季銅元制度紊亂的原因，約有以下六點：

(一) 無限制的增鑄。這是第一個重大因素，任何人都知道一種名目貨幣，如果鑄額無嚴格的限制，則幣值必至跌落，而投機及其他弊端亦必隨之而起。銅元是一種名目貨幣，在初鑄時即多少含有補助財政收入的意味，及至銅元暢行，各省紛起仿鑄，則完全是要『藉銅元餘利，以爲興辦地方新政之用』，誰也沒有整頓幣制的想頭。那時恰巧當義和團起義之後，全國財政困窘，所以一般地方官吏，均視鑄造銅元爲財源。而貪婪之徒更視爲分肥的好機會。就在這種營利的動機之下，加以當時各省事實上是一種封建的割據形態，滿清政府無法予以控制，所以各省先後設立了二十餘局廠，銅元的鑄額，據梁啟超估計，自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一九〇四——一九〇八），五年間各省所鑄銅元，即達一百二十餘萬萬枚。（六）而當十銅元的每枚鑄造成本，只需制錢六文，幣面價值與實際價值又相差過巨，自然演成通貨膨脹，幣值跌落，而物價高漲，流通阻滯，投機盛行，自亦隨之而起。

(二) 幣制的不健全。清季之鑄行銅元，實際都是爲着增加財政的收入，並無改革幣制的意義，已如上述。所以廣東在開鑄時不過藉口『錢價日漲，銀價日落，』仿鑄外洋銅仙，『以救錢

荒，而挽利權。』後來令各省仿鑄，也是說『制錢缺少，不敷周轉，』鑄銅元『以代制錢之用。』這些顯然絲毫找不出革新幣制的意味。銅元本來是一種輔幣，它要作為輔幣置在一個完整的幣制系統中，纔能發揮它的良好作用，因此它必須屬於一個新的健全的貨幣制度，這種制度至少是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的：第一有主幣與輔幣之分，第二主幣與輔幣有法定的比價，第三輔幣的鑄額有嚴格的限制，第四輔幣的使用額，有一定的限制，第五必須逐漸廢棄舊幣制。必須如此，銅元纔能發揮它優良的作用。但當時的銅元，對於這幾個基本條件都未具備。首先就未嘗建立一個完整的新幣制，只是企圖用銅元來作為補救舊幣制的手段，並沒有廢棄舊幣制的打算，所以竟不把銅元和當時暢行已久的銀圓聯系起來成立一個系統，反而使之代表制錢去和銀兩聯系。銀兩與制錢原無主幣輔幣的嚴格劃分，所以銅元也就隨着性質模糊了，因而使用額既沒有一定的限制，對銀幣也沒有法定的比價（光緒二十八年十月戶部奏銅元搭放官俸片內規定銅元每百枚抵銀圓一枚，未見實行）。鑄造額更沒有嚴格的限制，這種種弊端，後來都一一經事實證明了。若干補救的辦法都是依據這種認識而產生的。至於鑄行銅元而不廢制錢，後來也漸漸有人知道『兩者並行有相與抵觸之性質』，感覺到新舊幣制並行複雜之弊，主張『定期收兌舊制通寶銅錢，期滿停止，公項概不收用。』〔七〕以劃一幣制。清季銅元制度之不健全，於此可見一斑。

（三）政府自壞信用。貨幣信用的保持，政治力量原屬一重大因素，相反的，政治力量也可給與貨幣信用以破壞，那就是所謂政府自壞信用。滿清政府表現在銅元方面的自壞信用行為固非一端，舉例來說：第一是收用不按幣面價值，甚至不按市價。例如光緒三十二年上海製造局向江

蘇省領取銅元，要求一律按九折計算，因而頓使銅元在上海的市價暴跌。（六）第二是低價傾銷。例如江蘇省在光緒三十一年時已有鑄局三所，所鑄的銅元足够本省之用，而「廣東、湖北、浙江、福建或委員設局運售，或給照招商販賣，皆聚於上海、鎮江等處，以致錢價大跌。」第三是各省銅元不能彼此通行。如河南省之禁用外省銅元，直隸總督楊士驤之奏請禁用各省銅元，均屬顯著事例。更甚者還有如浙江膏捐局却根本不收用銅元。政府如此不斷破壞銅元的信用，銅元的價值那裏能够獲得穩定呢！

（四）交通的阻礙。依照當時中國人口的比例，鑄發價值一萬萬兩的銅元，尚不算過多，但由於交通的不便，銅元大半集中在幾個大都市，不能迅速運往內地，以致這幾個大都市裏銅元供過於求，市面不能吸收，及至加入流通界以後，幣值遂相應的低落。而偏僻地方却需要甚切，不能隨時獲得其所需要的流通量。如光緒三十四年銅元充斥而下令停鑄時，「藏衛」地方却感銅元不敷，請求大量運入，即是實證。

（五）投機的風氣。銅元是一種名目貨幣，其實值因在幣面價值以下，當時人民對此項貨幣行用未慣，稱量貨幣觀念未除，加以幣制不健全，銅元使用額無限制，於是銅元市價漲落無定，遂成爲絕好投機目標，而一般投機商人的囤集操縱行爲，益使銅元價值的波動趨於劇烈。這些商人又多有特殊背景，爲禁令所不能及的。

（六）私鑄的充斥。因爲私鑄銅元可牟巨利，所以私鑄銅元也和私鑄大錢一樣盛行，在封建政治的掩護之下，特殊階級的滿人官吏和土豪劣紳固可肆無忌憚的私鑄，同時在不平等條約的壓

迫之下，更有所謂『洋私』大量運進。這種私鑄都藉低廉的價格以求銷行，銅元的幣值自亦不能不隨之降落。政府雖有禁令，但那只能適用於一般人民，不能適用於封建的特殊階級，及侵略者所庇護的中外奸徒。

上述六點是清季銅元制度紊亂的原因，若再加剖析，則不出經濟與政治兩大範疇。大體前兩點是屬於經濟的，後四點是屬於政治的。經濟制度不健全，產生了如許惡果，自不容吾人忽視，而政治的腐敗與無能，其影響之巨，尤其值得吾人注意！這是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絕不能是孤立地存在的，因而任何一種局部的改革都是無補於實際的，特別是經濟的改革是不能不伴着政治改革同時進行的。清季銅元制度的紊亂，經濟的因素與政治的因素都發生了同等的作用，所以單就經濟方面着眼，而不能作政治的革新，銅元制度是無法健全起來的。

銅元制度紊亂情況下所發生的影響，大體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光緒三十四年張毓英等在條陳銅元充斥請設法挽救摺中曾把銅元病國病民之害歸納爲八點：『一曰勞働工人束縛之害，二曰商業虧折之害，三曰農業耗損之害，四曰非農非工非商普受之害，五曰債權損失之害，六曰地方公款暗蝕之害，七曰庫款短絀之害，八曰國財外溢之害。』這些當然都是事實，而這些事實無一不是隨幣值跌落物價高漲而來的。

〔一〕 耿愛德：中國貨幣論中譯本第三〇九頁。

〔二〕 同上書第三九二頁。

〔三〕 參看天津銀錢總局簡明章程。

- 〔四〕 清朝續文獻通考錢幣考四。
- 〔五〕 參看劉世珩：整頓銅元條陳。
- 〔六〕 梁啟超：中國鑄錢銅元小史。
- 〔七〕 劉世珩：整頓銅元條陳。
- 〔八〕 同註〔六〕。
- 〔九〕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二，引江晉周麟奏疏。

## 第八章 信用貨幣制度的新發展

### 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新的經濟發展形勢

如第四章第三節所述，滿清政府曾經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期間，用發行紙幣——官票和寶鈔來作爲籌措戰費的手段，但由於惡性通貨膨脹的結果，短短幾年之間即遭到悲慘的失敗。我們也曾指出：這種失敗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及各級官吏的貪贓枉法，不能因此遂認爲紙幣制度在當時客觀上沒有存在的必要。戰後三四十年的歷史事實，也具體的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經歷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與義和團運動，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急劇下降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迅速擴大深入，更進一步改變了舊來中國封建的經濟面貌，一方面加速和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國資本主義在封建廢墟上開始萌芽。在這種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之下，舊來的貨幣制度，事實上不能滿足新的經濟需要，外來的侵略者和國內新興的資產階級，都要求發行現代的紙幣，以便利其進行經濟侵略和扶助現代工商業的發展。所以滿清封建統治階級的保守主義思想，無論如何扭不過社會發展的規律，到了滿清末年，現代的紙幣制度終於正式產生了。

爲了系統的說明清末紙幣發行的歷史根源，特就以下三個方面來敘述。



第一是自從兩次鴉片戰爭以後，對外貿易的發展和長期的入超狀態，引起了財政和金融兩方面對紙幣的需求。因為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英國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侵入中國，獲得了自由通商權利。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通商口岸大量增加，截至滿清滅亡時為止，被強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即已有九十幾處。同時外商在華輔助貿易的機構紛紛建立起來，而且有領事裁判權和關稅協定權作為經濟侵略的護符，又掌握了中國的海關管理權，所以各國對華貿易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不待言，這是標識着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勢力增加，也是標識着落後的中國經濟越發隸屬於先進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自一八六四年海關有報告以後至滿清滅亡止，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狀況略如次表：

歷年輸出入貿易價額表（單位關平兩）

年 份	輸 入 價 額	輸 出 價 額	貿 易 總 額	入 超 或 出 超
一八六四	四六, 二一〇, 四三一	四八, 六五四, 五一二	九四, 八六四, 九四三	出超 二, 四四四, 〇八一
一八七四	六四, 三六〇, 八六四	六六, 七一二, 八六八	一三〇, 七三三, 七三二	出超 二, 三五二, 〇〇四
一八八四	七二, 七六〇, 七五八	六七, 一四七, 六八〇	一三九, 九〇八, 四三八	入超 五, 六一三, 〇七八
一八九四	一六二, 一〇二, 九一一	一二八, 一〇四, 五二二	二九〇, 二〇七, 四三三	入超 三三, 九九八, 三八九
一八九五	一七一, 六九六, 七一五	一四三, 二九三, 二一一	三三一, 九八九, 九二六	入超 二八, 四〇三, 五〇四
一九〇〇	二一一, 〇七〇, 四二二	一五八, 九九六, 七五二	三三〇, 〇六七, 一七四	入超 五二, 〇七三, 六七〇
一九〇四	三四四, 〇六〇, 六〇八	二二九, 四八六, 六八三	五八三, 五四七, 二九一	入超 一〇四, 五三七, 九二五
一九〇五	四四七, 一〇〇, 七九一	二二七, 八八八, 一九七	六七四, 九八八, 九八八	入超 二一九, 二一二, 五九四
一九一一	四七一, 五〇三, 九四三	三七七, 三三八, 一六六	八四八, 八四二, 一〇九	入超 九四, 一六五, 七七七

從上表看來，可知清末四十七年之間（一八六四——一九一一年），中國的輸入貿易、輸出貿易以及輸出入貿易總額，根本的傾向都是增加的，尤其是輸入貿易增加得最快。在一八六四年，輸出超過輸入二百四十餘萬兩，到了一九〇五年却變成輸入超過輸出兩億一千九百二十餘萬兩。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以前，貿易總額的增加還不很快，從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九四年共三十一年之間，只增加二倍；入超的數目也還不過大，至多不過四千萬兩（一八九〇年）。可是從一八九四年以後，貿易總額的增加便比從前快，到了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開始的一年）便增加了一倍，到了一九一一年（滿清滅亡的一年）便增加了將近兩倍（共十七年間）。入超的數目也比以前大為增加，在一八九六年（中日戰爭告終後一年）便有入超額七千一百五十萬兩，從義和團運動失敗簽訂辛丑條約（一九〇一年）以後，每年入超常在一萬萬兩以上，最多的時候還超過兩萬萬兩。而且除了最初幾年，都是輸入超過輸出的。這種對外貿易的發展，給與中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之大而且深的。近代中國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破產與新式企業的勃興，農業生產的商品化與商業的發展，新都市的成立，以及中國經濟隸屬於世界經濟，這些都與對外貿易的發展分不開。正因為新式工業興起了，農業生產商品化了，商業發達了，新的都市成立了，中國經濟已隸屬於世界經濟了，舊來那種以手工業和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為背景的貨幣制度，不能滿足需要了。不但要求鑄造銀圓銅元，並且進一步要求發行現代的紙幣，以適應新興工商業的發展。同時由於長時期的對外貿易入超，已造成經濟枯竭，雖然這期間現銀也是入超，但那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對華投資，它對中國經濟只會起吸血作用，不會起滋補作用。所以無論是財政或金融，都需要

發行紙幣來給與支持和流轉。

其次是基於上述新的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咸豐時代所發行的官票寶鈔，雖因戰時的惡性通貨膨脹而遭到徹底的失敗，但『自此各省官商銀錢行號，往往發行紙票，皆以行號為主體，推行祇及一省或一城，其值初亦只一千、五百錢類小額耳，人利其便，流通日廣，而值亦增大，一兩、五兩、十兩之票，因以發行。銀圓通用後，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之銀圓票，亦見用於市。』〔二〕就在這種自然發展的形勢之下，紙幣的行用，在民間已日益普遍。但因流通範圍過於狹小，不易發揮近代紙幣的作用，製造印刷又不甚精，真偽頗難辨別。加以公私銀錢行號，往往圖過分私利，發票過多，常有擠兌現象發生，甚至倒閉，使人民受到重大的損失。特別是在銀錢價格變動時，最易發生此類現象。所以當時雖有這種銀錢票在各地流通，仍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客觀需要。而很多倒閉的銀錢行號，不久又復開業，仍舊發票流通，這又說明當時社會對紙幣需要的迫切。當然更迫切需要發行比舊紙幣更完善的新紙幣了。

再其次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陸續設立的銀行，大量發行紙幣及其所進行的種種活動，不但侵犯了中國人民的權利，而且嚴重的危害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首先在中國設立的外商銀行，是一八五七年設立的英商麥加利銀行上海分行，接着有一八六七年設立的英商匯豐銀行上海分行，到了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英國的有利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以及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均先後在中國境內設立分行。義和團事變後，美國的花旗銀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荷蘭的荷蘭銀行，日本的台灣銀行，也相繼在中國設立分行。截至一九

一一年滿清滅亡時止，全國共有外國銀行十四家（包括實權操在外人手裏的中外合辦銀行在內）。

這些外商銀行本是帝國主義對華進行經濟侵略的工具和據點，它們爲了扶助其在華工商業的發展，以擴大深入對華的經濟侵略；同時看到銀錢行號所發的銀錢票，已普遍流通，滿清也不限制私商發行。而發票本身就是筆很大的利益。於是在華的外國銀行，如匯豐、正金、道勝、麥加利、華比、東方匯理諸銀行，都擅自在中國境內發行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及百兩、五十兩、十兩、五兩、一兩諸種紙幣，通行市面。在福建的台灣銀行，也發行七錢番票。這些紙幣的發行額均祕而不宣，準備金究有多少，亦未嘗公佈。所以當時頗引起我國人民的疑懼。

不僅如此，這些銀行更通過對華投資，猛烈進行侵略，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因爲這一戰把中國的弱點盡行暴露了，一般都認爲中國已無抵抗列強侵略的能力。同時又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金融資本已取得統治地位，輸出資本已經是十分必要，勢非激劇向外發展不可。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向中國投資，奪取建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的權利，設定各自的勢力範圍，甚至企圖瓜分中國。而執行這一任務的外國銀行，正是憑藉發行紙幣以厚植其經濟勢力。所以當時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又都感覺有必要設立銀行發行紙幣以抵制外國銀行的侵略勢力，鞏固自身的存在發展並挽救民族的危機。

## 二 有關紙幣的理論

基於上述經濟情勢的發展，清末關心社會經濟發展前途的人士，紛紛主張發行紙幣，就其理論根據，約可分爲以下三個方面：

(一) 把信用貨幣與金屬貨幣作一對比，指陳紙幣的優點，認爲行用紙幣，不僅可以解救當時常常發生的錢荒的損害，而且可以獲得很多利益。這一派主張顯然是代表新興工商業者的思想。他們鑒於連年各地錢荒情況嚴重，不但制錢缺乏，就是粵省所鑄的『光緒通寶』銅元也不够用。錢價一天天貴起來，如鷹洋一元本可換錢一千一百餘文，後來止值錢九百數十文。『非但民間周轉不靈，而在在吃虧，莫可言喻。雖有小洋可以濟錢之不足，無論各處小洋，尙未通行，通行之處，用時雖覺靈便，而以大易小及買物找錢，轉手之間即七除八扣，每一元易小洋十枚又錢三四十文，而用出則作九十文八十餘文不等，暗中吃虧亦甚。』(二) 使用小洋既解決不了錢荒，鑄錢又因銅價人工俱貴，鑄制錢一文，甚至要花到兩文工本，也不能靠鑄錢來解決錢荒。

他們認爲最好的辦法是發行紙幣，而『且行鈔之利益，亦可以指而數矣，錢色素有低昂，或雜以私錢，或暗扣串底，市中交易不無齟齬之端。鈔票則出自官中，無或有好歹之別，行之市上，一覽便明，一利也。制錢由鼓鑄而成，萬一銅舶不來，工人即停爐以待，鈔票則但須印刷，常年可製，斷無或作或輟之虞，二利也。錢有市錢卡錢之分，市錢通用於市中，以之納稅完糧，司權者尙或有所挑剔，惟卡錢銅色純白，較勝市錢，納稅完糧，最爲利便，民間須另購取，始可繳之官中。若鈔票則無市錢之分，但使不以贗鼎攪雜其間，即無往不利，三利也。千里經商，制錢每患取攜不便，銀圓及小銀錢便易矣，然積少成多，尙虞重滯，至鈔票則由數百數十數十百

千以迄千萬千；置之行囊，輕於毛羽，盜寇不虞其劫奪，關山無慮乎阻修，四利也。」（三）這是把銀錢銅錢和紙幣作了一個對比，說明發行紙幣之利。固然他們也考慮到發生的弊端，即是「奸人」乘機偽造及市儈抑勒居奇；又考慮到行使時可能感到的不便，即真偽難辨、易被火焚、零用須易制錢，但他們却認為有些可以防止克服，有些無關得失。

（二）認為發行紙幣，不但是「裕國便民」之事，而且公私銀錢號所發銀錢票已經長期普遍行使，外國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在若干大商埠，也為市民所樂於使用；此時發行紙幣，已是「水到渠成。」這一派主張也是代表新興工商業者的利益。他們鑒於「捐局未停之前，有以半銀半鈔納捐者。」是政府早已承認紙幣的合法地位。而當時「都中常用之錢票，自兩三四五吊以迄十吊廿吊三五十吊不等，只須該錢店殷實可靠，即可流通。又如兩湖、晉、豫等省通用之錢票，通津各州郡之錢籌，滬上貿易之銀票，何莫非鈔票之類？」（四）既然這些銀錢票，自京師以至各省鎮，都能各自通行，若劃一規制，推廣行之，「似亦在所不難。」加以香港地方的中外商人，都喜歡使用外國銀行的鈔票，「常例每用千兩銀票一紙，須補票紙用費或三四兩不等」，甚至有時要補至十四兩之多。上海租界地面，匯豐等外商銀行所發的銀票，無不樂於使用。光緒初年黑龍江的愛琿商賈，都用俄帖，琿春華俄互市，也用俄帖。可見紙幣流通的條件，業已具備。

舊來的錢票，雖因「開設者往往出票過多，一有謠言而持票取錢者紛至沓來，每致不能應付，因而倒閉。其中固有本少票多，立意侵吞者，然其本錢富實，因現錢略少，為謠所累者，亦復不少。但向來喜用錢票之地方，隨閉隨開，其事亦終不廢，可見銀錢之票，若能見信，無有不

樂用者。』〔三〕只是各店錢票，式樣終不一律，至於銀票，又都是『旋用旋銷，不過偶爾之期票而已，若通用之銀票，則各處皆無。』因此他們主張宜急速講求發行紙幣的辦法，或國家自行造用，設官分理，或令殷實之戶，集股份設立公司，造票行用。

（三）認為國家財政匱乏，而生財之術已窮，只有發行紙幣可以救財政之急，使國家達到富強。這一派主張可以說是純粹的財政觀點，不待言，他們是代表滿清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他們鑒於鴉片戰爭以後，商埠大開，利源外溢，接着太平天国、捻軍、回民相繼起義，二十年間徵兵籌餉，羅掘一空。光緒四五年間天災流行，齊、魯、晉、豫諸省，都大鬧饑荒。不出十年，又接連發生中法、中日兩次對外戰爭，不但興建海軍所費的幾千萬巨款，一旦消耗，且因賠償軍費兩億三千萬，息借外債，每年又須負擔巨額子金。移東補西，捉襟見肘，財政收支既入不敷出，借用外債亦有時而窮。時勢已經很急迫，要想『倉猝聚億萬之財，收億萬之利，舍鈔法別無良圖。』『鈔票既行，不特練兵有費，暨造船購械不難立辦，而開礦火車郵政之利，無不次第擴充。』據他們看來，發行鈔票，自中央到地方，自政府至人民，者將受利益。從中央政府的財政來說：第一是鈔法一行，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一切流出外洋的金錢，將不禁自止，並可防止外國銀圓在中國流通。第二是帑儲既足，則通籌邊海各務，增設兵衛，以備緩急，減輕釐稅，以恤商民，永停捐輸，以杜流品，百廢俱舉，可以躋國家於富強。第三是假使遇有水旱偏災，或河工軍務、開礦墾田，均可迅速舉辦，不必息借或攤派款項。就地方財政來說：第一是整理河漕，修濬城池，可以次第舉行，不致籌款無出。第二是州縣丁課錢糧的逋賦和積欠，均可免除。第三是可

以廣積穀米，充實倉儲，運用官帑，調劑物價。因此有人即主張由「戶部籌款，在京師設立總銀行，外省提用庫款，於省垣各設分行，各處口岸，則由關道籌款，設立通商銀行。」由戶部印造鈔票，與銀錢並行。（六）

上述三方面的紙幣理論，都有些片面和幼稚的地方，而且前兩種又都還未能脫却舊來的銀錢票的範圍。不過，這一些都是替清末的紙幣制度作了初步的理論準備，則是毫無疑義的。

### 三 國家銀行的紙幣發行

就在上述的『輿論』督促之下，首先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有商辦中國通商銀行的成立，援照各外國銀行的辦法，發行鈔票，這是我國近代銀行第一次發行兌換券。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張之洞又在武昌發行官錢票及銀圓票，但正式的由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則在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戶部銀行成立之後。

那是在八國聯軍侵華（一九〇〇年）之後，滿清政府痛切地感覺到在商業及財政的領域內，再不能不加以改革了。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三月戶部銀行成立，資本金四百萬兩，同時制定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因為中國官商，平素情性隔閡，且因從前之鈔票，近年之昭信股票，辦理不善，失信於民，更不敢與官交易，銀行甫設，又勢難遽禁商號出票，官中行用紙幣，恐一時未能取信商民，必須竭力設法，昭示大信。』（七）所以章程內關於戶部銀行發行紙幣的獨占



權，並無任何規定，只有四條關係紙幣發行問題，規定：（一）『本行擬印紙幣，分庫平銀一百兩、五十兩、十兩、五兩、一兩、五種，通行銀圓票亦如之。此外因便商民起見，亦可出市面通用平色及百兩以上銀兩等票。』（第二十條）（二）『凡本行紙幣，公私出入款項，均准一律通用，應繳一切庫款官款，均准以此紙幣照繳。或全用或搭用，與現銀無異，各該省如有解部款項，並准一體解兌。如有官吏商民人等，故意挑剔折扣者，京師稟知財政處戶部，外省稟知該省督撫，從嚴參辦。』（第二十一條）（三）『戶部出入款項，均可由本行辦理，凡有可以票幣收發者，均須用本行紙幣，其他商號之票，不得摺用。』（第二十二條）這些規定是很粗疏的，關於發行數額及發行準備，官票流通及私票限制，均無具體或精密的規定。

戶部銀行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先在北京發行紙幣，後來天津、漢口、濟南、奉天等處分行，也各自發行，據戈里(Jules Goltz)說，該行曾發行三種紙幣：（一）銀兩票，自一兩至千兩共二十八種；（二）銀圓票，僅一元、五元、十元三種；（三）錢票，有二、三、四、五、及十吊等五種。銀圓票的流通額相當大，在東北及蒙古各地，都能流通。此等紙幣發行之後，立刻被公認為一般的支付手段，凡銀行解交戶部或戶部發放的款項，以及各省交納稅釐錢糧各項官款，或匯部款項，均一律通用。在北京的外國銀行，也不拒絕兌換。所以該行的營業收益，狀況相當良好。（八）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一月戶部銀行總分各行一律改名為大清銀行，前訂試辦章程宣告廢止，另行頒佈大清銀行則例二十四條。關於銀行業務的規定，比以前詳備，但只有第五條關係紙幣發行，規定：『大清銀行有代國家發行紙幣之權，但須遵守兌換紙幣則例，則例未頒以前，

暫准發行市面通用銀票。』明年——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另定現行詳細章程四十條，規定：「除仍照試辦章程，暫行庫平銀兩票通用銀圓票外，並可出市面通用平色銀兩票。」（三十三條）「本行鈔票，公私出入，一律通用。」（三十四條）「凡持本行票來行兌現者，登時兌給，不得稍有延遲。」（三十六條）這些規定，與試辦章程並無若何差異。同時由於三十四年正月會頒佈銀行通行則例，允許官商所設各銀行號，得發行銀錢票，又未規定兌換準備，因此官私立各銀行號，濫發紙幣，漫無限制，市面紙幣充斥，人民生活很受影響。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六月乃頒佈通用銀錢票章程，規定嗣後官商銀錢行號發行紙票，未發者不准增發，已發者逐漸收回。並嚴定準備，隨時抽查，企圖使銀錢行號專力於存放匯兌的正當業務。到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五月又頒佈兌換紙幣則例十九條，要想進一步統一紙幣。據度支部奏定兌換紙幣則例疏所陳該項則例的主要意義說：「發行紙幣，固屬國家特權，而政府要不可自爲經理，近世東西各國，大都委之中央銀行獨司其事。誠以紙幣關係重要，倘發行之機關不統一，勢必漫無限制，充斥市面，物價因之奇昂，商務遂以不振，貽害於國計民生何堪設想？現擬將此項紙幣，一切兌換發行之事，統歸大清銀行管理，無論何項官商行號，概不准擅自發行。必使紙票於紛紜難出之時，而立收集權中央之效，此其要義一也。紙幣發行總數，查東西各國除法、美兩國外，大率無法律明文預定發行數目，誠恐事變無常，需要之範圍亦有所伸縮。中國事同一律，其在平時，自應以準備數目爲發行數目，一遇銀根奇緊，需要較多，卽由銀行體察市情，酌量增發，其應如何明示限制之處，屆時由部核定，以資遵守。必使銀行任接濟市面之責，而仍不准有任意濫發之弊，此其要

義二也。紙幣之流通，全恃兌換以維信用，倘聽其肆意發行，毫無準備，萬一變生不測，市面恐慌，兌現者紛至沓來，危險殊難言狀。查各國紙幣條例，規定甚詳，而於準備金尤爲最嚴之監察，中國發行紙幣，事屬創圖，萬不可稍涉空虛，致失國家信用。現擬於現款準備以外，概以有價證券作爲担保，必使銀行於孳生利息之中，而仍不失保全信用之道，此其要義三也。發行機關既已委之銀行，則酌收稅銀，亦屬國家應得之利益，惟收稅之法，考諸各國，不外發行稅餘利稅二種，揆之中國情勢，民力既瘠，利率復昂，倘更按發行數以徵稅銀，則銀行必以借貸爲難，恐不免於農工商業多所阻礙，應請於紙幣發行之次年起，視銀行所得餘利，按年徵收若干，並以稅率分作三期遞進，必使銀行於稅額增長之時，而仍不覺義務負擔之重，此其要義四也。』從此始明確規定紙幣發行爲大清銀行專利，同時對發行額及準備金等項，也有了較嚴格的規定。至於官私銀錢行號前此所發的紙幣，則決定『各省商號所發紙票，流行尙隘，應按年收回二成，期以五年收盡，其官銀錢號所發各票，爲數較鉅，不能不變通辦法，應咨商各省，妥籌收換辦法。前此大清銀行所發通用銀票，亦應陸續收回，不准增發，違者無論官商，由部奏參。』這些有關紙幣發行制度的規定，已漸臻完善，只因執行既不可能徹底，且一年多之後滿清政權卽告毀滅，所以仍不過紙上文章而已。

大清銀行初改名時，因戶部銀行的銀兩票銀圓票，已經印好，市面行用甚多，一時又未能印出新票，只得暫准照舊行使，俟新票印齊，再行逐漸收回，另發新票。大清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其種類也和戶部銀行一樣，分銀兩票、銀圓票、錢票等三類，銀兩票有一兩、五兩、十兩、五十

兩、百兩等五種，銀圓票亦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等五種，錢票還是早先阜通、東南兩號及濟南分行所發，其他各行均未發錢票，故其種類應與戶部銀行時期約略相同。

由於當時幣制紛亂，銀兩的平色，銀圓的種類，各地方都不相同，因此大清銀行的紙幣，也隨着總分行所在地的習慣而加以變通。銀圓票上註明有某處通用銀圓數字者，即係某處通用的大銀圓。營口、奉天、長春、太原等處，習用小銀圓，以角計算，上述各地總分行的銀圓票，即註明若干角或若干小毫數字。福州、廈門等處習用番銀，福州分行的銀圓票，即註明每元照番銀七錢兌換數字。廣州習用毫銀，廣州分行的銀圓票，即註明直平七錢兌換數字。至於銀兩票為某行所發行者，亦即註明某行所在地的平色，以資區別。因此總辦事務處，特於所備各種紙幣之外，另製一種空白票，叫做特字票，凡各行偶有特別新樣，不能行用印成紙幣之處，即用這種特字票填寫發行。合計總分各行所發行的鈔票，多至百餘種。

大清銀行紙幣的兌換，一般都是某行發行的紙幣，限在某行兌換現銀，凡持甲行紙幣至乙行兌換現銀者，乙行必按當時市價收取匯水，否則不予兌換。只有營口、長春、奉天三分行，立有互相兌換紙幣的契約，該三分行各自發行的銀圓票，可以相互兌換現銀，不收匯水。後來『兌換紙幣則例』內雖規定：『凡持有紙幣者，得向大清銀行總行或分行於營業時刻內，隨時兌換。』但未見實行。

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戶部銀行開始發票時起，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閏六月底止，所發行的紙幣，據大清銀行各分行歷年發行數目的報告，僅列銀兩銀圓兩種，濟南分行及阜通、

東南兩號所發行的錢票，均未列入。其歷年發行各種銀兩銀圓票數額如下表：〔九〕

紙幣發行數目比較表

行別	年次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二年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北京銀兩	五七、二四、五〇	一、四三、五五、九四〇	二、六三、九六、一四八	一、四二五、二四、五六一	二、四三六、八三六、〇〇〇	一、四六七、〇〇六、六八〇	二、八六七、二五七、七五二	
總行銀圓	三三、九六、八二〇	七三、八四九、三三四	二二、一九三、九四五	二、四三六、八三六、〇〇〇	四三九、一七八、六七〇	四三九、一七八、六七〇	四三九、一七八、六七〇	
天津銀兩	五八、八六、二八〇	一、〇、一三〇、一六	三、四七一、九四二	五、〇八五、三八〇	一三、五九四、五九〇	一三、五九四、五九〇	一三、五九四、五九〇	
分行銀圓		五八、八六、二八〇	五八、八六、二八〇	五八、八六、二八〇	五八、八六、二八〇	五八、八六、二八〇	五八、八六、二八〇	
上海銀兩				一、二七、三六、七六六	一、六、三八五、〇三三	七、四三、〇五九、三〇七	七、四三、〇五九、三〇七	
分行銀圓				一、二七、三六、七六六	一、六、三八五、〇三三	七、四三、〇五九、三〇七	七、四三、〇五九、三〇七	
漢口銀兩				二、七三、三七、四二四	二、九、四〇六、八九六	三、四四、六六九、六五五	四、六二、九六五、五五五	
分行銀圓				二、七三、三七、四二四	二、九、四〇六、八九六	三、四四、六六九、六五五	四、六二、九六五、五五五	
濟南銀兩			五八、九三、四四五	四、四三、二、一九二	一、八二二、二六、三三三	一、八五、一〇六、〇三三	三、七五、七〇、二八五	
分行銀圓			五八、九三、四四五	四、四三、二、一九二	一、八二二、二六、三三三	一、八五、一〇六、〇三三	三、七五、七〇、二八五	
張家口銀兩				三、二二、一三三	二、〇六六、四六五	一、五、二二五、五五五	二、〇六六、四六五	
分行銀圓				三、二二、一三三	二、〇六六、四六五	一、五、二二五、五五五	二、〇六六、四六五	
奉天銀兩			六三、一三〇、六八四	八、六、五五、四三二	七、七、九六、六八〇	四、二、八六六、六八〇	四、二、八六六、六八〇	
分行銀圓			六三、一三〇、六八四	八、六、五五、四三二	七、七、九六、六八〇	四、二、八六六、六八〇	四、二、八六六、六八〇	
分行銀圓			六三、一三〇、六八四	八、六、五五、四三二	七、七、九六、六八〇	四、二、八六六、六八〇	四、二、八六六、六八〇	





二年（一九一〇）大清銀行委託美國鈔票公司印的銀圓票一百萬張，合計即有一千萬元，以前所發的數額似乎不應比這個少，以後雖於宣統三年又委託美國鈔票公司印製銀圓票，則並未行使。然據英文中國年鑑說一九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大清銀行紙幣發行額為五億四千三百八十九萬一千零七十五兩，又十二億四千五百九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元，這也許是包括特字票發行額在內。

大清銀行紙幣的流通情形，一般是良好的，只有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春天上海的少數外國銀行，曾一度拒絕接受大清銀行紙幣，度支部即電兩江總督端方，通過上海商會採取報復手段。於是帝國主義者又經由北京外交團首席代表向滿清政府交涉，度支部表示對大清銀行發行的紙幣，負保證人之責，問題才算解決。

爲了保證大清銀行的紙幣發行獨占權利及其紙幣的流通，度支部曾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電咨各督撫，請於各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地區以外，禁止使用外國銀行的紙幣。

大清銀行之外，同爲滿清政府設立的尚有交通銀行，該行係由郵傳部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十一月奏准設立，當初創立的意義，是作爲戶部銀行的競爭者出現的，目的是把航運、鐵道、電信及郵信設施統一結合起來，特別是要掌握鐵道建設借款，並管理國外匯兌。表面上雖然與作爲國家銀行的戶部銀行有區別，但實際上它也具有國家銀行的性質，取得了紙幣發行權。該行章程第十七條即載明「仿照京外銀號及各國銀行，印刷通行銀紙，分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種，並仿照各銀號，印出該埠市面習慣通用平色各種銀票，以及各項票據，惟不得出國幣紙票。俟度支部禁止各埠銀行出票後，該行所出通行票紙，即當照章收回，與各埠銀行，



一律辦理。』由於度支部並未能禁止各埠銀行出票，所以交通銀行自成立以來一直是照例發行紙幣，與大清銀行紙幣同樣流通，惟發行數額尙不可知。

#### 四 官私銀錢行號的紙幣發行

滿清末年市面流通的紙幣，最成問題的不是國家銀行所發行的，交通銀行發行數額有限，固然不是問題，大清銀行發行的紙幣，也並未發生問題。最成問題的是各私商的錢莊銀錢店所出的各種銀錢票，這些既無一定的準備，又無一定的限額，不但市面充斥，供過於求，而且隨時有因擠兌倒閉而成為廢紙的危險。其次便是各級政府所設立的官銀錢行號，同樣也是無一定的準備和限額，任意濫發的。

自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滿清政府爲推行官票寶鈔，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以後，各省即先後有官銀錢局的設立，到了光緒末年，已有直隸、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江蘇、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熱河等十九個省區設立了，都發行銀圓、銀兩、銅元或制錢鈔票。這種紙幣發行制度，滿清政府並無明文規定，各省均按當地和當時的習慣與需要，自行決定，所以名目繁多，單位紛雜，準備或有或無，數額或多或少，信用有好有壞，市價有高有下，有的可以兌現，有的不可以兌現，情況極其紊亂。茲爲簡明起見，特將清末各官銀行號發行紙幣情形列表如下：

各省官銀錢行號發行紙幣情況表(三)

省名	行號	紙幣種類及數額	備註
直隸	天津銀號	銀兩票三十八萬四千五百兩，銀圓票七十三萬二千元，銅錢票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千文。	宣統二年九月改為直隸省銀行。宣統元年奉度支部令按年收回所發鈔票二成。
奉天	東三省官銀號	銀兩票、大龍圓票、小銀圓票、東錢票。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由華豐官銀號改名，初發東錢票五百餘萬串，後改發小銀圓票，收回東錢票。
吉林	通濟官錢局	銀票、錢票。	自咸豐六年起至光緒二十四年開設官帖局止，全省通行，初可兌現，後改為二成兌現。
吉林	永衡官帖局	一吊、二吊、三吊、五吊、十吊、(以上稱為小帖)五十吊、一百吊(以上稱為大帖)等七種官帖共七千八百九十五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吊，此外尚有銀兩票、大銀圓票、小銀圓票，但發行額甚少。	設立於光緒二十四年，初發木版銀圓官帖，規定每小銀圓帖一元，合吉錢二吊二百文，二十六年改發現錢官帖，三十四年改發石印官帖，因現錢不敷兌換，於票面註明現二成。
黑龍江	黑龍江官銀號	銀圓票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等，銅元票分十枚、二十枚、三十枚、五十枚、一百枚、二百枚、五百枚、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等，發行額計共合銀一百一十九萬餘兩。	光緒三十四年設立，發行鈔票，原為抵制市面日俄紙幣，嗣因銅元票發行漸多，不能維持兌現，價格日落。
黑龍江	廣信公司	銀票分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二十兩、五十兩、一百兩、二百兩、五百兩、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等，銅元票分一吊、二吊、三吊、五吊、十吊、二十吊、五十吊、一百吊、二百吊、五百吊、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等，此等官帖發行額約有三千餘萬吊。	光緒三十年設立，其先所發行的官帖，定價以三吊合江平銀一兩，以二吊二百文合小銀圓十角，其後帖價漸落，至宣統元年，官帖定價改為三吊四百文，合小銀圓一元。
山東	山東官銀號	庫平銀票、濟平銀票、銀圓票、京錢票(又有大板錢票、角板錢票、石印錢票的不同)發行額在光緒三十四年計共值庫平銀八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餘兩。	原名通濟官錢局。
河南	豫泉官銀錢局	銀兩票一百七十萬餘兩，銀圓票十一萬六百元，制錢票三十餘萬串。	光緒二十二年創設。
江蘇	江蘇官銀錢局	發行銀圓制錢等紙幣，為數各近數十萬。	該局有裕寧、裕蘇之分，裕寧設在江寧，裕蘇設在蘇州。

熱河	貴州	廣西	廣東	四川	新疆	甘肅	陝西	湖南	湖北	浙江	福建	江西	安徽
熱河官銀錢號	貴州官銀錢局	廣西銀行	廣東官銀錢局	四川源銀行	伊犁官銀錢局 省城官銀錢局	甘肅官銀錢局	陝西官銀錢號	湖南官銀錢局	湖北官銀錢局	浙江銀行	福建官銀錢局	江西官銀錢號	裕皖官銀錢局
銀兩票、銀圓票、銅錢票三種，共約合銀元數萬元。	銀兩票五十五萬四千零五十五兩。	銀圓票有一元五元兩種，發行額約百數十萬元。	一元、五元、十元三種銀毫票一千餘萬元。	銀圓票，發行不多。	官票。 布票每張紅錢四百文作銀一兩，旋即收回，官票一百萬兩。	一兩二兩兩平銀票十八萬三千兩。一兩及五百錢票五萬九千串。	錢票約百萬串。	銀兩票二百零二萬七千六百兩，銀圓票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兩，銅元票四百八十餘萬串。	錢票有一串、五串、十串三種共一千七百餘萬串，銀圓票一百六十餘萬元。	額定為六十萬元。	合伏票（銀圓票）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三十元、一百元、一千元九等，小洋票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五等，各約四十萬元。	十足錢票，九五官票共約三四十萬元。	一元、五元銀圓票四十餘萬元，一千文銅元票三十萬串。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開辦。	創設於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宣統三年九月改組為貴州銀行。	宣統二年三月由廣西官銀錢號改組而成。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成立。	光緒三十一年成立。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成立。 光緒三十三年成立，其紙幣僅通行於一府兩縣之間。	光緒三十二年創立，宣統二年奉部令停發，按年收回二成。	光緒二十年開辦，宣統二年改名秦豐官錢局。	光緒二十九年設立，所發紙幣，信用甚佳。	光緒二十二年設立，所發紙幣，行用甚廣。	宣統元年由官銀號改組而成。	光緒三十年創立，宣統三年八月改名福建銀行。合伏票係銅板印刷，票面元數用筆填寫，專流通於福州市內，小洋票流通於各州縣城內。	光緒二十八年設立。	光緒三十二年創立。

從上表看來，約略可以看出清末各省官銀錢行號發行紙幣的複雜和紊亂情形，茲再就以下幾點加以說明：

(一) 上表所列二十四家官銀錢行號，幾乎已遍及當時中國各省區，只有山西一省遲至辛亥革命以後才設立發行紙幣的官錢局，那也許是由於山西票號特別發達的緣故，所以比較例外。由此可知紙幣的勢力到了滿清末年已普及於各省以至邊疆地區，同時從這二十四家官銀錢行號的創立年代來看，除開吉林的通濟官錢局和新疆的省城官錢局，在特殊情形下成立較早外，一般都是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以後成立的，這大體是由於甲午戰爭失敗，各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更加擴大深入，促進了紙幣的流通，而在日俄戰爭後，中國的資本主義又有了初期的發展，所以增大了對紙幣的客觀需要。

(二) 各地官銀錢號所發行的紙幣，其種類的繁多，名目的紛雜，充分表現出當時幣制紊亂情況。一般的是銀兩票、銀圓票、銅元票，制錢票同時並行，既無新制舊制之分，也無主幣輔幣之別。而各省區更是各自為制，不但各種紙幣票面額的大小多寡等級各不相同，例如：銀圓票有的分爲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六等（黑龍江官銀號），有的分爲一元、三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三十元、一百元、一千元九等（福建官錢局），也有的只分一元、五元兩等（裕皖官錢局）。再如：銀兩票有的分爲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二十兩、五十兩六等（黑龍江廣信公司），也有的只分爲一兩、二兩二等（甘肅官銀錢局）。又如：制錢票有的分爲一吊、二吊、三吊、五吊、十吊、五十吊、百吊七等（永衡官帖局），也有的只分爲一串及五百兩等（甘

肅官銀錢局)。更複雜的是平色和單位計算，也都因地而異，銀兩票既各按通行平色計算，更有一地同時行使幾種不同平色的銀票，如山東官銀號既發庫平銀票又發濟平銀票，即是一例。銀圓票則既有大龍圓票與台伏票的不同，又有小銀圓票和毫洋票的差別。至於制錢票的計算，也就和制錢一樣的複雜，例如永衡官帖局所出錢票，係按吉錢計算，而吉錢每吊只等於制錢五百。這一切不只是把清末幣制混亂情形不折不扣的反映出來，而且變本加厲了。

(三)這些紙幣的紙張和印刷，新疆的布票不必說了，其餘除開在日本和上海精印的一部分外，都是很差的，最好的要算石印的，有些落後地區還用木版或角版印刷，而福建官錢局用銅版印刷的台伏票，票面元數尚需用筆填寫，所以這一類的紙幣不僅不耐用，而且都很容易偽造。

(四)這些紙幣都是帶有區域性的，一般都只限於在本省區內流通，有的流通區域更狹小，如伊犁官錢局的官票，僅通行於一府兩縣之間，福建官錢局的台伏票只能流通於福州市內，其各州縣分局所發小洋票，則又只能流通於各該州縣城內。這就大大的限制了紙幣制度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

(五)發行數量，很少有定額。因此，少者數萬至數十萬，多者數百萬至數千萬。最多的是永衡官帖局發行官帖七千八百九十五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吊，折合小銀圓三千六百餘萬元。其次是廣東官銀錢局發行銀毫票一千餘萬元，廣信公司發行官帖三千餘萬吊，折合小銀圓也有九百餘萬元。最少的是熱河官銀錢號，不過數萬元，但一般的都在百萬元左右。我們雖然無法確切統計出這些官銀錢行號的紙幣發行總額，但我們可以知道這個總額是相當龐大的，它的發行額並非依據

社會經濟的需要來規定，而是依據各省財政上的需要來規定的。所以很多省區的紙幣發行額，遠超過當地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再加以一般都缺乏足夠的準備金，一旦發行漸多，即不能維持兌現，於是有的限兌現二成，有的根本不能兌現。隨之而來的便是價格日落，流通阻滯了。東北各官銀錢號所發行的各種紙幣，便是如此。能够始終維持信用，暢行無阻，如湖北、湖南兩局所發行的紙幣，究係少數。所以這種紙幣發行的結果，只有加深社會經濟的混亂。

（六）滿清政府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五月頒佈兌換紙幣則例時，雖決定「無論何項官商行號，概不准擅自發行」紙幣，並擬對「官銀錢號所發各票」，「應咨商各省，妥籌收換方法。」實際除少數銀錢局號照章每年收回二成外，大部分都未停止發行，這說明了滿清末年紙幣制度的紊亂情況，始終沒有改善。

在戶部銀行開辦之前，已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有商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成立，這是經滿清政府核准有發行鈔票權的第一個普通商業銀行，曾發行五元、十元、五十元各種鈔票一百五十萬元，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發出的鈔票上，均列有年月日，西曆刊於票面，華曆刊於票背。此外則有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設立的浙江興業銀行，也由部核准發行兌換券，於滬杭漢各大埠，流用甚廣，頗有信用。再有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設立的四明商業銀行，曾發行十元、五元、二元、一元各種鈔票。這兩家商業銀行在清末的發行額，似都不很大，所以這些商業銀行在清末所發行的紙幣，基本上不成甚麼問題。最成問題的是各省錢業所發行的紙幣，和各地商號所發行的錢票，它們是在自由放任之下，任意濫發的，滿清政府本來不加聞問，當時全國

究竟有多少家錢莊商號，發行此類紙幣，發行額究有多少？也無從查考。我們現在只能概括地知道，一直是任意濫發，經常發生擠兌倒閉現象，如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湖南官錢局成立時，湖南地方各商店發行的所謂『市票』，即因濫發過多，『倒閉時聞』。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正月頒佈銀行通行則例，准許官商所設各銀行號，得發行銀錢票以後，『官私立各銀行號，濫發紙幣，漫無限制，於是紙幣充斥，羣以爲苦。』到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六月度支部奏定通用銀錢票章程，即擬限制官商銀錢行號發行紙幣。三年（一九一〇）五月奏定兌換紙幣則例，更明確規定：『無論何項官商行號，概不准擅自發行。』並規定各省商號所發紙幣，『應按年收回二成，期以五年收盡。』只是這法令並未收到多大的效果。

- 〔一〕 金國寶：中國幣制問題第一一二頁。
- 〔二〕 時務通考：論行鈔票可以濟錢之不足，見陳度：中國近代貨幣問題彙編第三卷。
- 〔三〕 時務通考：行鈔私議，見同上書。
- 〔四〕 時務通考：論行造鈔票，見同上書。
- 〔五〕 時務通考：論自造銀票以便通用事，見同上書。
- 〔六〕 參看戶部：覆盛京將軍依克唐阿條陳請行鈔法並設立銀行摺，時務通考：論復鈔法以救時利用，見同上書。
- 〔七〕 財政處、戶部奏請由部試辦銀行摺。
- 〔八〕 參看卡恩：近代中國貨幣史，日文譯本第一四四頁。
- 〔九〕 引自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一二〇——一二四頁。
- 〔一〇〕 根據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二編第十章製成。

## 第九章 北洋軍閥時期的貨幣制度與貨幣問題

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貨幣史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貨幣制度上也起了劇烈的變化。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辛亥革命後中國貨幣史的發展，並沒有起本質的變化，也就是沒有完全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例如：銀兩雖然在日常生活上已為銀圓所替代，甚至完糧納稅都已改用銀圓，可是在通商貿易上，却仍舊用銀兩支付。外國銀圓雖逐漸絕跡，但上海鷹洋行市，既遲至五四運動以後始取消，而本國銀圓又種類繁多，市價不一。制錢雖漸被淘汰，但銅輔幣制度也還沒有統一的建立起來。至於紙幣發行的紊亂，較之滿清末年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 一 銀兩制度的繼續存在

辛亥革命後，銀兩制度也和其他封建殘餘勢力一同被保留下來，其紛亂情形，當然也和以前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只是以前日常使用小錠碎銀，現在多改用大銀圓、小銀圓或銀毫了，從前完糧納稅須用銀兩，現在多折納銀圓了。至於商業往還和國際收支，還是普遍的用銀兩計算。在



銀圓通行之後，這種落後的銀兩制度的繼續存在，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很重大的，特別是對於財政和商業兩方面。

商業方面，交易計算雖用銀兩，而實際收支則用銀圓，用銀圓換銀兩，又用銀兩換銀圓，輾轉折合，貼水虧耗就很大。經營國外貿易的人，受累更重。因為買貨以金計算，賣金以銀計算，賣貨以元計算，一方面有金銀比價的變動，另一方面又有兩元比價的變動，再加上商業市場上的變動，所以經營國外貿易的商家，又必須多負擔一重危險。其次使用銀兩，則商家須多一重準備，即既須有銀圓準備，又須有銀兩準備，因為銀圓不能代替銀兩，銀兩也不能代替銀圓，二者缺一，均足引起金融恐慌。所以當時商家有所謂『銀圓押款』，便是由於需用銀兩時，銀圓不能抵用，不得不以銀圓抵借銀兩。這原是很滑稽的事。當時市場上的銀款交易，大都以銀圓折合收付，銀兩並無實際上的授受，少數銀塊，只不過作為市面籌碼而已。又因為貿易用銀兩，通常用銀圓，於是投機商人從中操縱，使元價驟漲驟落，累及正當商人。每當絲花新貨登場的時候，元價必漲，絲業花業受累尤為顯著。這無異是獎勵投機事業，助長欺騙行為。假如這種銀兩制度能早日廢除了，上述種種給與商業上的弊害，即可以避免。

其次，在財政方面，第一是稅吏藉兩元比價的時常變動，以及各地銀兩的不一致，營私舞弊，使人民蒙折耗的損失。當時曾有人在農村裏看到胥吏持由單收田賦，書明：計納漕米一升二合，並加蓋紅戳，註明：每米一石折合五元。論理一升二合，不過銀洋六分，但胥吏却說米每升照例應折洋八角。農民只得照付。（二）這便是稅吏藉以米折銀，以銀折洋，從中舞弊的一例。如此胥

吏中飽，結果自必至於民窮財盡。第二是銀兩制度本身不統一，國家徵收賦稅時，折算既已煩難，市價又有上落，折算便不能一定。即以關銀而論，各口關平銀與庫平銀的比率也不一致，江海等關爲一〇一·六四三，而江漢等關則爲一〇二·二〇五三，以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進口稅折合庫平爲例，即如下表：

民國五年進口稅折合庫平數額表

關名	民國五年進口稅 關平銀的收數	關平銀的百兩與 庫平銀的比率	折合庫平銀的收數
鎮南關	二, 三六八兩	一一二·三一二	二, 六五九兩
聚白關	一四一, 二二七	一〇一·八八八	一四三, 八九三
陸越關	二五, 〇一五	一〇一·九四二	二五, 五〇〇
江漢關	一, 〇二三, 六八三	一〇二·二〇五三	一, 〇四六, 二五八
宜昌關	五, 八三七	一〇二·二〇五三	五, 九六五
沙市關	四, 二五七	一〇二·二〇五三	四, 三五〇
長沙關	五一, 〇七一	一〇二·四〇一五	五二, 二九七
山海關	二一三, 九五六	一〇四·七八〇三	二二四, 一八三
安東關	五一〇, 五四〇	一〇五·五七	五三八, 九七七
合計	一, 九七七, 九五四		二, 〇四四, 〇八二

上表合計關平銀一、九七七、九五四兩，按江海關一〇一·六四三的比率，合庫平二、〇一〇、四五〇兩，較各關原來折合庫銀的數額，減少庫銀三三、六三二兩，但若按江漢關一〇二·二〇五三的比率折合，則尚可增收二十餘萬兩。可見關平之數雖同，一旦折爲庫平，因折法不同，

稅收的數目也有差異。第三由於全國各省納稅的貨幣不同，折合的方法不同，人民的賦稅負擔，極不公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財政部會據各省國稅廳查覆各種賦稅所納貨幣及其折合率的報告，列爲一表，雖屬官方例行文件，不盡可靠，但亦可由此窺見人民負擔不公平與稅收上弊端的一斑，以及在兩、元並行下當時各省幣制紊亂的情形。（見『各省納稅貨幣表』）

由表上可知因爲銀兩制度的繼續存在，當時銀圓雖已普遍通行，而幣制仍不能劃一，使折算複雜，給貪污官吏造成舞弊的機會，人民受更多一重剝削。

在上述種種情況之下，首先商業界起來要求廢除銀兩制度，自江西開始，接着廈門、寧波、奉天等處都相繼改用銀圓計算。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上海總商會會董蘇本炎鑒於上海交易向用銀兩，而平時所用全係銀圓，商界受累已久，建議改用大洋爲本位。總商會會通函各業及長江一帶各商會，徵求意見，但結果並未實行。所以未能實行廢除銀兩的原因可能很多，而勢力雄厚的舊式金融業者——錢業的反對，實爲一大阻力。錢業所以主張用銀的原因，是爲貪存放一毫二絲五的利益。因錢莊向例，存銀有息，存洋無息，譬如以洋萬元去存，按當日洋厘折成銀兩數，如當日洋釐爲七三四一二五，則應合銀七千三百四十一兩二錢五分，但錢莊要把一二五抹去核算，只記入七千三百四十兩。至提取時，則按提取當日的洋厘核算，並不減去一二五。譬如提取日的洋厘仍爲七三四一二五，則按七三四一二五核算，原存七千三百四十兩（係一萬元），祇能提出九千九百九十八元零，一出一入，錢業即獲得一兩元的好處。如果交情稍淺，還不照一二五計算，甚至照二五（二毫五絲）核算，那就折耗更大。其次是恐廢除銀兩之後，將招致錢莊勢力之崩潰。因

爲錢莊的好處不僅在一二五，實在它的匯劃便利和莊票的勢力。莊票久已取得外國商人的信用，銀行本票不能出貨，不能不屈伏於莊票勢力之下。莊票係銀票，若廢除銀兩，便將去規元，用洋元，也就是去莊票，用洋票，外商如不信任洋票，可兌付現洋，銀行現洋十分充足，洋票不難逐漸爲外商所信用。莊票一旦消滅，錢莊勢力即將隨之崩潰。(三)

錢業在當時中國金融界尙佔着極大的優勢，他們不贊同，銀兩自然一時不易廢除。

此外，阻撓廢除銀兩最力的，是在華各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民國七年中外修改稅則委員會成立，曾建議此後關稅廢止關銀改徵國幣，但因總稅務司藉口此事當在改良幣制之後，未便提前，加以阻撓，遂成懸案。當時總稅務司提出緩改的理由有二：第一關稅改徵國幣，必須先徵求各國的同意，而各國又須得到銀行團的承認，因爲關稅抵押借款係由銀行團經手的。至於銀行團能否承認，恐須看銀行簿記能否改兩爲元。要想使各銀行簿記改兩爲元，必須中國先造有一定全國通用的新幣，停用各種舊幣。要想造有一定全國通用的新幣，又必須先改良造幣廠，另訂特別管理法。所以關稅廢止關銀改徵國幣，必須在幣制統一之後。第二如欲更改，除非有憑據證明所收之稅，核計現銀實有增加，方可施行，否則借賠各款必受影響。因爲這些借款及賠款，都是訂明以關平銀若干爲担保，而不是以銀圓計算的。

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一絲一毫也不放鬆任何剝削中國人民的機會的，固然當時中國的反動統治者們，沒有能够很好的改革幣制，但帝國主義者總是利用中國幣制紊亂，乘混水摸魚，根本就不希望中國幣制真正統一。我們必須承認廢兩改元，無論如何不失爲改進幣制的一個重要步驟。

## 二 幣制改革問題

銀兩制度的繼續存在，在另一方面又因償付外債和賠款而使財政上蒙受巨大虧損，所以問題便不止於是廢除銀兩改用銀圓，而是整個貨幣制度的改革，首先是要確立一個適合需要的本位制度。

自從滿清光緒中葉以後，各省開鑄銀圓銅元，式樣平色，都不一致。且銅元濫鑄過多，價格低落。當時即感覺有改革幣制的必要。加以一九〇〇年以後，世界銀價暴落，一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我國甲午庚子兩次反侵略戰爭失敗所負擔的巨額賠款，合計達六億八千萬兩，折合英鎊一億零五百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四鎊，因銀價暴落，所受鎊虧的損失，十分驚人。於是愈益感覺到銀幣本位，非急謀改革不可。這期間英美帝國主義者，爲了便利其擴大對華經濟侵略，又曾對滿清政府施行壓力，迫使改革幣制。一九〇二年的中英商約和中美商約，都有劃一幣制的規定。在這種情形之下，各方面遂紛紛提出改革幣制的主張，滿清政府也不得不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成立了一個『財政處』，來專門整理財政和幣制。總計當時各家的主張，約可分爲以下三派：（一）主張金本位，（二）主張銀本位，（三）主張金匯兌本位。主張鑄用金幣的，最初是順天府尹胡燏棻，其次是監察御史王鵬運，總理衙門給事中盛宣懷。但具體主張實行金本位的，則爲駐俄公使胡維德和駐英公使汪大燮。主張銀本位的是張之洞。主張金匯兌本位的是總稅務司

英帝國主義代理人赫德 (Robert Hart) 和美帝國主義的國際匯兌調查委員會委員精琦 (Jeremiah W. Jenks)。主張金本位的着眼點，是在避免賠款外債上所受鎊虧的損失，並避免國際匯兌的匯價有巨大漲跌，以減少商業投機，穩定金融市場，他們基本上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銀本位的雖是針對精琦的金匯兌本位立論，但屬封建保守思想，是代表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利益。主張金匯兌本位的，都是站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立場，從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出發，把中國當作殖民地看待的。

在本位問題上，意見儘管很紛歧，但當時主張銀本位的，還佔多數。滿清政府實質是封建統治集團，所以最後仍決定採用銀本位。銀本位問題決定後，又有銀幣單位是一兩或是七錢二分的爭執，滿清政府的法令，也因此屢次變更，初由兩單位改為元單位，後來由元單位再改為兩單位。及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頒佈幣制則例，規定仍採用元單位，單位問題始完全解決。不過這一切所謂幣制改革，均不過紙上文章，並未嘗實行。所以直至滿清滅亡為止，幣制依舊是混亂的。

辛亥革命後，由於戰爭的影響，幣制紊亂更甚。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秋天，財政部特設幣制委員會，討論幣制，都主張採用金匯兌本位制。這時有一位由美帝國主義推薦的幣制顧問，前爪哇銀行行長荷蘭人衛斯林 (G. Vissering) 著中國幣制論，大約看到精琦的金匯兌本位主張，在中國碰了壁，便主張暫時並用銀本位及金匯兌本位制。二年（一九一三）春天，幣制委員會改組，增設專任人員，詳加討論，約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是贊同精琦的金匯兌本位制。第二種是主張金本位與銀本位暫時並用，這是劉冕執提出的新主張。第三種是主張先採用銀本位。同年秋天

幣制委員會裁撤，移交國務會議討論，最後決定採用純粹銀本位制，這便是三年（一九一四）二月所頒佈的國幣條例。

國幣條例十三條，關於國幣的單位、種類、重量、成色、鑄發權及流通辦法，均有明確規定，規定銀幣四種，銀幣一種，銅幣五種，均以十進計算，而以一圓銀幣為主幣，其餘為輔幣。據國幣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及第七條的規定：凡向例用銀兩、銀角、銅元、制錢計算者，須一律按照規定，折合國幣，改換計算的名稱。至於所以採用銀本位的理由，則因金銀複本位之不適用，歐美各國早有先例；金匯兌制只能行之於殖民地。金本位制雖甚美善，但中國的條件不具備，既缺乏黃金，又一時不易處理現銀，也不敢遽然採用。剩下來的就只有銀本位了。明知以『世界大勢而論，銀本位固非可持久無弊，』但他們却認為：『惡本位勝於無本位，今日中國所大患者，無本位也，與其夢想最良之本位，而力未能逮，徒致遷延，何如因勢利導，採一較易行之本位以整齊之，而為之過渡。』他們希望『此過渡期間，則愈短愈妙，政府則雖行銀本位，然常汲汲準備，為改進金本位之預備。』〔四〕這裏充分暴露了所謂幣制改革的軟弱無力。但幣制改革問題，總算暫時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以後，銀幣單位問題，也經過一個時期的爭論，只是論爭的焦點，已由一兩與七錢二分之爭，轉而為大單位制與小單位制之爭了。在民三國幣條例頒佈以前，一派主張採用大單位一圓制，即用當時通行的七錢二分的銀幣，以免紛擾。另一派主張採用小單位制，則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有的依據用銀兩的習慣，主張用五錢或五錢五分為單位，使二元相當於一兩或一兩一錢。

有的認為我國生活程度低廉，不適用於大單位貨幣，主張用三分之一兩為單位。有的以制錢一千文為標準，折合新度量衡制度，合銀二十公分，以銀九銅一配鑄，純銀為十八公分，因此主張用十八公分為單位，而銀幣總重量則為二十公分。

國幣條例頒布以後，又有人主張以半圓為單位，即是把國幣條例所制定的「半圓」作為國幣，這個新單位定名為「中圓」。但自國幣條例頒布，單位問題也算暫時解決了。

隨着國幣條例的頒布，同年三月即設立幣制局，擬借外債，整理幣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借款無望，幣制局裁撤。四年（一九一五）一月財政部再設幣制委員會，擬定國幣條例修正案，其中主要的有兩點：一為改定一元銀幣的成色，一為添鑄金幣。六年（一九一七）九月梁啟超任財政總長，又想厲行民三的計劃，特向英、法、俄、日四國銀行團提議善後續借款英金二十萬鎊，作為整理幣制之用，未成事實即已去職。七年（一九一八）曹汝霖任財政總長，呈請嚴格實行民三的國幣條例，統一銀幣。並鑒於當時「中國預算，每年應還洋債賠款本利，約居全數三分之一，皆以金計。而歐戰以來，銀價暴漲，金價大落，中國舉債頻仍，將來歸償期屆，歐戰已了，金銀之價，較為平復，是借賤還貴，所受損失，竟居兩重。若改用金本位，則可免此種之困難。且以國際貿易言之，改金可減除投機危險之性質。」主張實行預備改用金本位，公布金券條例九條，規定發行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及五角、三角、一角的金券，每一金元，含純金〇·七五二三一八公分，即庫平二分零一毫六絲八忽八。發行此種金券，以便利國際貿易及將來實行金本位。同時並擬設立中華貿易公司，作為推行金券的機關。可是，這些計劃，



也都沒有實行。而以後一般輿論，則大部分主張首先統一銀幣，然後再討論用金的方法。

自滿清末年以來，議論紛紜的幣制改革問題，到了辛亥革命以後，在理論上雖獲得了暫時的解決，而實際上則因北洋軍閥時代內戰不絕，割據已成，加以各帝國主義者從中操縱，根本不能有所改進，所以不但銀兩不能及時廢止，其他各種貨幣的鑄造和發行，也是極其混亂。

### 三 銀圓·銀輔幣·銅輔幣

#### 甲 漸趨統一的銀圓

民國成立之初，普通流行的銀圓，達十數種之多，有英洋（即鷹洋）、有銀槍、有本洋、有廣東、湖北、浙江、江南、安徽各種龍洋，有四川幣、有吉林幣、有東三省幣、有奉天幣、有造幣廠幣、有北洋幣、有大清幣，這些固然絕對多數是舊幣，但也有在辛亥以後始發行或續鑄的，如新式大清銀幣即係在革命前鑄成，而於革命後因供應軍餉，始陸續發行。造幣總廠則在革命以後，仍鼓鑄宣統元寶。由於種類繁多，故洋釐價格亦有高低，當時上海方面銀錢業所開釐價，每市分英洋、龍洋兩種價目，大約標準以英洋為主，龍洋減小二毫半或一毫一忽半，造幣北洋約小半厘。至於奉天、吉林、東三省、四川等幣，錢莊素不通用，即用亦不過少數，或須加以重大貼水，每洋至少要貼一、二分不等。於是烟兌業利用這種紛亂情況，從中抬高抑低，獲利甚厚，而貽害亦無窮。自民國三年鑄發『袁頭幣』以後，銀洋行市漸趨統一，中交兩行與上海錢業公所協議，

將以前一切龍洋行市一律取消，祇開『國幣』（即袁頭幣）一種，自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一日起實行，於是上海銀洋行市，始祇有『國幣』與英洋兩種。八年（一九一九）二月錢業公會鑒於（一）內地各省均多通用『國幣』及龍洋，（二）墨西哥自改用金本位後，英洋早經停鑄，其在我國流通的數額逐漸減少，已有自然消滅之勢。（三）英洋與『國幣』兩種行市已漸趨於平。遂建議劃一英龍洋行市，但遭外商銀行的反對，未成事實。及至五四運動發生，上海商界繼學生罷課工人罷工之後，實行罷市，六月十一日行市，錢業公會乘機決議英洋行市取消，祇開一種，於是銀洋行市始完全統一。這種統一，不待言，是中國近代貨幣史上的一種進步。其主要原因，除開五四運動的政治因素以外，應是由於袁頭幣能在當時流通銀幣中起着唯一主幣的作用。

爲甚麼袁頭幣能起着唯一主幣的作用，從而成爲銀圓的統一者呢？一方面是客觀上的需要迫切，另一方面也是主觀上的條件具備。第一次世界大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更進一步發展，因而更迫切地要求幣制的統一。當時流通的各種舊銀幣，成色重量既不相同，各地又復囿於習慣，不能互相通用。據民國三年天津造幣總廠報告，滿清各造幣局廠所鑄銀圓，成色紛雜，皆緣各省多貪圖造幣餘利，故近合法定者十之一二，超過法定者十之三四，不及法定者十之六七。這種複雜的銀圓，自必成爲新興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袁頭幣是根據國幣條例第五條：『一圓銀幣，總重七錢二分，銀九銅一』的規定，於民國三年十二月及次年二月，先後由造幣總廠及江南造幣廠開鑄，幣面鑄袁世凱像，故俗稱『袁頭幣』。原定成色爲純銀九成，後爲便於收換舊幣改鑄新幣起見，改爲八九成色。這種新幣，花樣嶄新，型式劃一，重量成色又都能嚴格按照規定，故發行

以後，全國各地通行無阻。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場上取龍洋的地位而代之，新幣行市代替了龍洋行市。到了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財政部根據財政會議的決議，發布推行國幣辦法，規定：「一、本部直轄及各省財政廳財政分廳所屬各徵收機關（各縣知事公署包括在內），一切稅項，均應以國幣計算稅率。一、一元新主幣通行省分，徵收稅款，應以該項主幣爲本位。該項主幣數多地方，應專收該項主幣及代表該項主幣之鈔票，該項主幣數少地方，得搭收舊銀圓銀角銅元制錢等，均照市價折合新主幣。一、銀圓足用地方，徵收機關不得收用生銀，若通用銀圓爲數不多時，生銀亦應限制收用。一、徵收機關不得收受外國鈔票，至外國銀圓，非不得已時，亦不得收受。」於是袁頭幣更進一步形成了當時流通銀幣中的唯一主幣，漸至無論何種授受，大小交易，均以此幣通用。鑄出總額達二八六、三五一、四一三元的龍洋，及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已有數十年的歷史，民初在中國全境流通及貯藏總額達四萬萬枚以上的英洋，都被逐漸淘汰以至消滅。

辛亥以後五四以前鑄造的銀圓，尙有以下數種：

1. 孫中山半身側面幣，民國元年造，發行額十萬元。
2. 黎元洪幣，幣面鑄黎元洪像。
3. 袁世凱軍裝像幣，民國三年天津造幣廠造。
4. 袁世凱開國紀念幣，僅鑄四十枚。
5. 袁世凱洪憲幣，幣面爲袁像，背爲龍紋，有中華帝國洪憲紀念八字。

6. 四川軍政府幣，民國元年造，在四川流通廣。

這些銀圓的流通量都很少，而且多半係紀念幣性質，與整個幣制關係不大。至於民國八年天津鑄造的十元、二十元兩種袁世凱金幣，十元一種洪憲紀念金幣，及唐繼堯所鑄的五元、十元兩種雲南金幣，更與幣制無直接關係的。

#### 乙 十進銀輔幣的失敗

滿清末各年各省所鑄銀輔幣種類很多，惟當時滿清政府對於銀輔幣與大銀圓的比價，並無確切規定，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度支部奏疏雖說：「大銀圓一元，折合小銀幣十角，小銀幣一角折合十文之銅幣十枚」，均以十進，易於操縱。『但並未實行，故銀圓與銀輔幣的比價，始終是依供求律而定。加以成色分量，也無一定的標準，各局廠所鑄各種銀輔幣，多不一致，價格愈益紛亂，且各省價格亦不一律。辛亥以後，各省仍繼續鑄造各種銀輔幣，形式更不一致，紛亂情形，自亦更甚。鑄造額最多的，為東三省及廣東，東北原以小洋為本位，鑄有一角二角小銀圓，民國六年始停鑄，廣東向以雙毫為本位，鑄額最多，行用亦廣，每年鑄數，多至二億枚，少亦二千餘萬枚。』

民國三年頒布的國幣條例，關於銀輔幣原有如下的規定：

半圓銀幣	總重三錢六分	銀七銅三
二角銀幣	總重一錢四分四釐	銀七銅三

## 一角銀幣

總重七分二釐

銀七銅三

該條例的第四條又規定：『國幣計算，均以十進，每圓十分之一稱爲角，百分之一稱爲分，千分之一稱爲釐，公私兌換，均照此率。』本應依此規定對銀輔幣加以改革，但因這種改革需用大宗款項，北洋政府籌措困難，遂暫時擱置。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中交兩行停兌，北方現貨缺乏，遂有人建議按照國幣條例鑄造新銀輔幣，以應急需。當時即決定先由天津造幣廠試辦，新銀輔幣的『花紋形式，與一元新幣一致，成色公差，悉依國幣條例辦理。以二枚當一元者曰中元，以五枚當一元者曰二角，以十枚當一元者曰一角。』當初鑄數，暫定二十萬元，發行手續，由中交兩行代理。推行辦法，分期分區，次第發行。第一期在京兆直隸（今北京市及河北省）。第二期在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第三期在陝西、甘肅、貴州、廣西、雲南。第四期在東三省、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新疆、蒙古、西藏。規定所有一切官款出入，應一律遵照國幣條例辦理，位以十進，不得絲毫折扣。第一期在京兆直隸兩處推行以來，頗爲順利，漸次推及山東、河南等省。由於當初鑄發數量不大，十進制度得以維持。後來幣廠貪圖厚利，儘量濫鑄，以致發行日多，供過於求，商人遂將新輔幣與小洋同等看待，暗開行市，價格低落。後來到了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更是風潮迭起，十進制度便完全破壞了。

至於上海方面，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的時候，原擬推行這種新輔幣，各方面都表贊同，但結果並未實行。據說是由於當初鑄數太少，不够分配。且舊銀輔幣在上海市場上已佔很大優勢，而新銀輔幣所含純銀既較舊幣差，價格又較舊幣高，所以不能通行。（三）又有人說是因爲烟兌業

恐怕新銀輔幣通行之後，一律十進，銀洋兌換，無利可圖，營業將受打擊，竭力反對，所以未能通行。（六）總之上海方面當時根本未曾通行這種十進制的新銀輔幣。

### 丙 舊銅元與新銅輔幣

由於滿清統治階級貪圖厚利，大量鑄造，在辛亥革命前，銅元問題已相當嚴重。辛亥以後，各省以利之所在，紛紛自行設局開鑄。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曾將鑄造局廠加以裁併，除天津總廠外，僅留奉天、南京、武昌、長沙、成都、廣州、雲南等七廠，及重慶、長沙二局。各廠局多開鑄新型銅元——鑄有交叉國旗的開國紀念幣和中華民國銅幣，四川省則鑄造鑄有『大漢』『四川軍政府』字樣的銅幣。與舊有的大清銅幣及光緒、宣統元寶各種，一律通用。所鑄銅元種類，有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一文等數種。大抵各廠皆鑄當十銅元，其餘各種則或鑄或不鑄，如鑄當二十文者，惟津、鄂、川、奉、滇、閩、吉、蘇、皖、浙等十廠；鑄當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者，只有川廠；曾鑄當五文者，惟津、鄂、川、閩、皖、浙六廠；曾鑄當二文者，惟津、閩、吉、魯、浙五廠；曾鑄當一文者，惟津、鄂、寧、豫、閩五廠。所以流通的銅元，以當十文的最多，其次便是當二十文的，其餘數量很少。

各省所鑄銅元，所用材料既不相同，而成色重量又彼此各異，辛亥革命後各省所鑄銅元重量差別，就所知者表列於下：（單位公分）

種類	重量	種類	重量
四川二百文(赤)	二六·九九	開國紀念幣(二)	六·四三
四川二百文(黃)	二五·九三	(三)	六·七八
四川一百文(赤)	二一·九二	(四)	七·五六
四川一百文(黃)	二一·五九	中華民國銅幣(赤)	六·六四
四川軍政府十文	七·四三	(黃)	五·三八
湖南二十文	一〇·九九	中華元寶(福建)	六·三九
開國紀念幣(一)	五·九二	中華銅幣	六·五一

種類既多，重量成色又各自不同，價格遂亦漫無標準。黃銅元與紅銅元的價格不同，甲省與乙省的價格又不同。因此有的銅元只能在本省流通，他省便不通用，也有的只能流通於某某數埠，他埠即不通用。四川的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只能在四川通用，固不必說，甚至各省所鑄當十銅元，也有行使區域的限制。

民國初年各種銅元的鑄造額，雖無確切的統計，但自清末開鑄銅元以來至民初為止的銅元鑄造總數，各方曾有若干次調查和估計，可供參考研究。

(一) 據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二月十七日財政部泉幣司的調查報告，自各廠開辦以來，截至是年報告之時為止，各省所鑄銅元，達二百九十萬萬枚，其中以當十銅元為最多，幾及二百八十六萬萬枚，其詳如下表：

各種銅元鑄造數額表

銅元種類						枚	數
百	五	十	二	十	一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四四七, 二五三
							二, 六五三, 五四八
							二七四, 七八六, 四八八
							二八, 五八三, 一九五, 九五六
							三七, 九四二, 九五二
							二八, 〇四九, 六七一
							一八五, 九三七, 六六一

(二)據外人調查估計, 一九〇〇——一九一七年, 各造幣廠所鑄舊型銅元, 當二十文者有三八六、二九二、二〇八枚, 當十文者有三一、六八二、一〇二、三〇六枚, 當五文者有三七、九四二、五〇九枚, 合計爲三二、一二六、三三七、一二三枚。(七)僅三種合計, 已較四年前總額多三十萬萬餘枚。

(三)據民國四年麥考爾 (Mc Coll) 的估計, 當時當十銅元的流通額, 應有二百二十萬萬枚。(八)

上述三方面的數字, 雖然都不完備, 但若以第二方面的三種合計數額, 加上第一方面所列該三種以外各種銅元數額, 則截至一九一七年(即五四運動前二年)止, 各廠歷年所鑄銅元總額當在二百二十三萬萬枚以上, 這個數字已足夠驚人了。

由於這種濫鑄, 再加上成色惡劣, 重量減輕, 辛亥以後, 銅元市價繼續跌落, 以北京爲例,



銀圓一元對銅元的比價，清宣統三年爲一三〇枚，民國元年爲一三五·二枚，二年爲一三四·七枚，三年爲一三二枚，四年爲一三五·四枚，五年爲一三三·九枚，六年爲一二三·五枚，七年爲一三四·二枚，八年爲一三八枚，上海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一般的說來，銅元價格最賤的時期，還是在『五四』以後，『五四』以前六七年中，銅元市價常盤旋於一百三十枚左右，還算比較穩定。這主要的由於一九一四年的歐戰爆發，銅價暴漲，幣值增高，更有人私燬銅元，運售海外，一時市面上銅元數量大減。且銅價既貴，鑄幣成本驟增，鑄額亦自然減少。

原來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頒布國幣條例時，即有整理舊銅元的打算，首先想從限制鑄造額入手，當時財政部幣制局曾呈請分別情形，酌限鑄數，決定武昌分廠每日限鑄當十者一百萬枚，成都分廠每日仍舊鑄七千串，但須停鑄當五十銅元。南京、廣州每日限鑄當十者五十萬枚，天津、奉天每日限鑄當十者二十萬枚。雲南仍舊每日鑄當十者五萬餘枚，以後視市面情形再行核減或停鑄。此外各銅元局，湖南局暫限於裁撤以前，每日鑄當十者不得超過五十萬枚，其餘在未停一二月內，暫限每日不超過當十者二十萬枚。但實際上並未發生效力。不久歐戰發生，銅價暴漲，各局始不得不自動減少鑄額。

舊銅元之外，曾一度鑄發新銅輔幣。依民三國幣條例的規定，銅幣的種類重量成色如下：

二分銅幣 總重二錢八分，銅九五錫百之四，鉛百之一。

一分銅幣 總重一錢八分，成色同前。

五厘銅幣 總重九分，成色同前。

二厘銅幣 總重四分五厘，成色同前。

一厘銅幣 總重二分五厘，成色同前。

當時並未即行鑄造，到了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天津造幣總廠以各種新銀輔幣已推行漸廣，且各省又鬧錢荒，認為是鑄發新銅輔幣的最好機會，經呈准於同年二月先行試鑄一分及五厘兩種，成分重量均遵照國幣條例辦理，花紋形式則幣陰面作方袂形，繞以嘉禾，陽面上鑄鑄造年份，一分者中有『一分』，下列『每一百枚當一元』字樣，五厘者中有『五厘』，下列『每二百枚當一元』字樣，這是與舊制錢若干文的舊銅元最大不同之處，把『當錢』改為『當銀』了。幣中心一律鑄有圓孔，以便與舊銅元相區別。其發行手續及推行辦法，均與新銀輔幣相同。曾由財政部咨行各省一律行用，所有賦稅厘捐及輪路郵電等一切收入，悉遵國幣條例收受，不得稍有折扣。但自施行以後，民間尚不習慣使用，主要原因實由鑄額不多，加以政局動盪，未嘗廣為推行。最後乃歸於消滅。

#### 四 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

北洋軍閥政府時代的國家銀行，有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交通銀行固然是由滿清時代繼續下來的，中國銀行也只是把滿清的大清銀行改換了一個名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各處大清銀行均改為中國銀行，同年十二月財政部鑒於『自去秋以來，

金融機關一切停滯，公私出納皆以現金，遂至周轉無方，商民交困，非有大宗鈔幣流行國內，不足以救濟恐慌。」呈准由中國銀行發行兌換券，凡「甲、完納各省地丁錢糧厘金關稅，乙、購買中國鐵路輪船郵政等票，及交納電報費，丙、發放官俸軍餉，丁、一切官款出納及商民交易，」一律通用此項兌換券，不得拒不受及折扣貼水。並按券內地名，由中國銀行隨時兌現。（九）

但中國銀行兌換券，並未能迅速推廣，到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底，流通總額，還不過三千八百餘萬元。雖較大清銀行發票最多的時候，增多一倍有餘，但和歐美各國的中央銀行比起來，却相差很遠。據北洋政府財政部的判斷，認為所以未能迅速推廣的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曰各省紙幣太濫，供過於求也。考鈔票之流通，有天然限度，必待市面需要，方能逐漸推行。自辛亥以來，各省官銀錢號濫發紙幣，數累鉅萬，雖迭奉明令，嚴禁增發，並由本部分別省分，設法收回，然財力不足，全數收回者僅廣東、浙江兩省，其餘如吉林、黑龍江、江西，僅收一小部分。如四川、貴州，正在開始收換，湖南、廣西，尙未着手。統計各省官票，尙有一萬三千餘萬元。其他私立銀行及外國銀行所發紙幣，爲數亦復不貲。惡幣既充塞市廛，良幣即無從發展，此中國銀行兌換券未能迅速推廣之原因一也。一曰國庫未能統一，無法操縱也。竊查外國國家經費，均用中央銀行紙幣，而中央銀行代理金庫，復能於收款時吸取現金，出款時支付鈔票。現在我國金庫，已歸中國銀行接管者，計惟中央與直、魯、浙、閩、皖、寧、晉、吉等省，其他省分，或以地方交通不便，金庫驟難遍設，或以濫票整理未完，金庫礙難接收，其最困難者，則以各省預算收支不能適合，若銀行接收金庫，不得不墊支款項，而墊款過多，必致竭蹶。所以各該金庫，或仍由

本省銀號兼管，或暫歸其他機關代理，事權不一，牽制尤多，欲求如外國銀行藉金庫之支付，廣鈔票之用途者，其勢有所不能。此中國銀行兌換券未能迅速推廣之原因二也。一曰幣制未能劃一，阻礙橫生也。鈔票爲銀圓之代表，必須全國通用銀圓，始能乘勢推行鈔票。現在各省貨幣，複雜異常，未能劃一。福建習用日洋、站人，東三省通行羌帖、老頭票、正金鈔票，西北各省行使銀兩之習慣未除，偏僻地方習用制錢之風氣未改，銀圓本位，既未成立，銀圓鈔票自難於通行。卽專論銀圓一項，國幣外幣，種類不同，南洋北洋，價格互異，甚至滬寧密邇，彼此無可通融，川鄂毗連，匯兌均須貼水。銀幣既不統一，鈔票自難流通，此中國銀行兌換券不能迅速推廣之原因三也。『(二)』以上三點，就有兩點是屬於幣制本身的，該部曾擬定辦法，着手解決，一方面籌措的款，收回各省濫發的紙幣，一方面劃一貨幣，改鑄各省的雜項洋圓。

關於劃一貨幣方面，自袁頭幣流通後，已收到良好的效果。至於爲了根本解決各省濫發紙幣問題，已先於四年(一九一五)十月廿日公布『取締紙幣條例』，規定『凡新設立之銀錢行號，或現已設立，向未發行紙幣者，皆不得發行。』(第二條)除中國銀行外，『業經設立之銀錢行號，有特別條例之規定，准其發行紙幣者，於營業年限內仍准發行，限滿應卽全數收回。無特別條例規定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以最近三個月平均數目爲限，不得增發，並由財政部酌定期限，分飭陸續收回。』(第三條)企圖統一紙幣發行。同時並於中國銀行內設置貨幣交換所，以推廣法定貨幣及紙幣的兌換，規定領用兌換券制度，使原有發券各銀行，得領用中行兌換券。不過，此等辦法，並未收到很大效果，僅少數商業銀行暫時停止或緊縮發行，如浙江興業銀行卽與

中國銀行訂立特約，收回以前本行所發的紙幣，領用中國銀行兌換券代為發行。後來中孚及浙江實業兩銀行，也訂有同樣的契約。又如四明商業銀行，自取締紙幣條例公佈後，該行紙幣亦漸收縮。至於各省官銀錢行號，却根本未嘗遵照辦理。

中國銀行發行的兌換券，有銀圓票和銅元票兩大類，銀圓票有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各種，也和前述大清銀行的銀圓票，隨着各地通用銀圓的不同，各分行所發的銀圓票，亦各自加以區別。但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鑄發國幣以後，該行為應付市面的需要及統一銀幣起見，即發行有票面印明『兌付國幣』字樣的鈔票。銅元票原由該行北京、河南、南京、江西、張家口等分行發行，自七年（一九一八）後即逐漸合併於各地平市官錢局發行。中國銀行在『五四』以前歷年所發紙幣數如下表：

中國銀行所發紙幣數額表

年 別	發 行 數 (元)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一,〇六一,六三六
二 年（一九一三）	五,〇二〇,九九五
三 年（一九一四）	一六,三九八,一七八
四 年（一九一五）	三八,四四九,二二八
五 年（一九一六）	四六,四三七,二三四
六 年（一九一七）	七二,九八四,三〇七
七 年（一九一八）	五二,一七〇,二九九
八 年（一九一九）	六一,六八〇,〇八八

其次，交通銀行在辛亥以後，仍特許發行兌換券，並於民國三年另印新券，收回舊票。該行兌換券與中國銀行兌換券，一律通行。但該行正式成爲國家銀行，享有發行兌換券的特權，則始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該行在「五四」以前歷年所發紙幣數如下表：

交通銀行所發紙幣數額表

年	別	發	行	數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七九三，五五八
二 年（一九一三）				四，四九八，七六二
三 年（一九一四）				五，九五七，六二七
四 年（一九一五）				二四，八六三，一一〇
五 年（一九一六）				二一，二九七，八九一
六 年（一九一七）				二八，六〇三，八三六
七 年（一九一八）				三五，一八四，五六三
八 年（一九一九）				二九，二七二，六五三

附註：民國六年以前，單位爲庫平銀一兩，六年以後，單位爲銀圓一元。

本來中交兩行的發行數字都不大，流通情況很良好，可是在民國五年四五月間，却因不能維持兌現，被迫不得不下令停止兌現，發生了所謂「京鈔風潮」，以後費了六七年的時間加以整理，纔算告一結束。這次實行停兌的只有京津等少數地區，其他各省分行均未實行，故稱爲「京鈔」。

這次京鈔風潮發生的原因，是由於袁世凱要實行專制獨裁，進行恢復帝制。他籌備卽皇帝位所花去的費用，總額超過二千萬元。國庫已被拉用得很空虛，及至討袁戰爭從雲南爆發之後，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既失去南方諸省的財源，又須支出一筆很大的鎮壓革命的軍事費用，國庫更

陷於窘境。遂強制的對官吏的薪俸，按成搭發公債券，月薪百元以下的二成，月薪五百元以上的五成。在民國四年及五年之間，政府官吏的薪俸，往往幾個月不發。財政部五百萬元借款的交涉失敗之後，除開動用中交兩行的現銀準備之外，再沒有辦法了。當時中國銀行的態度雖很冷淡，而梁士詒支配下的交通銀行，却不惜以大量資金供袁使用。爲了強化對中國銀行資金的控制，袁世凱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四月二十一日任命他黨羽周自齊爲中國銀行董事長。中交兩行現銀，遂被提取一空。這時候西南戰事緊張，局勢正一天天惡化，商民持票爭先兌現，京、津中交兩行首當其衝，無法應付。乃於五月十二日下令對中交兩國家銀行紙幣，停止兌現。停兌令發布之後，現銀立刻絕跡，於是關稅鹽稅等各項租稅及鐵道運費，均完全用紙幣支付，而以此等稅收作担保的外債，必須用外國貨幣歸付本息，故有引起列強干涉的危險。同時批發商對零售批售商品，不願把商品換成不值錢的紙幣。社會上頓時騷動起來。雖然政府禁止把紙幣折扣行使，但商人却已將商品價格上漲，食糧也急劇上漲二成以上，而工資則並未隨着物價增加，所以中交紙幣停兌後，首先受到致命打擊的是勞動人民及一般小市民。當然那些持有大量紙幣及有巨額存款的人，也受到影響。

當時在北京的外國銀行，完全沒有理會這道命令，它們只收受現銀和本行發行的紙幣。稅務及鐵道等方面，也不過維持了一二個星期，便立刻遭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即收入是紙幣而支出必須用現銀。因此，不久之後，交通部不得不下令對一部分鐵道運費按等級收取現銀。同時爲了減低交通銀行鈔票貶值的程度，於六月十二日下令一部分所管鐵道的運費，只收受交通銀行鈔票，完全拒受中國銀行鈔票。郵政方面則先已於五月三十一日公佈了搭收現銀及紙幣的比率。此外，

直隸省財政廳也下令拒絕收受中交兩行紙幣繳納稅款，接着海關、鹽務署等機關，也都如法泡製。一般商業界則在停兌命令發布後三星期，開始拒絕收用。於是錢店公然對紙幣常常變動行市，京鈔市價常在七折至九折之間。

京鈔市價跌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停兌之後，政府墊款日漸增多，京鈔流通數額亦因之日益膨脹。截至六年十二月止，中國銀行墊款一項，即已達四千五百四十餘萬元，故在五年五月開始停兌時，京鈔流通數及存款數兩項合計，不過二千六百餘萬元，至同年十月便一躍而達四千六百餘萬元，六年十二月更增至九千七百餘萬元。中間雖經過五年十月中行一度開兌，而京鈔流通數，不特毫未減少，反見增多。

京鈔市價的跌落，迫使銀行方面不得不設法加以整理，中國銀行於六年（一九一七）十一月添招商股，收回京鈔三百六十四萬七千餘元，作為整理京鈔的第一步，但票價並未能恢復。中交兩行因向財政部催還九千三百萬元積欠，恰巧當時有庚子賠款展限五年，財政部即指撥該項延期賠款作基金，於七年（一九一八）發行七年短期公債及七年長期公債兩種，即以京鈔兌換公債，前後共收回京鈔七千餘萬元，但京鈔仍未收盡，為數尚有六千萬元，所以後來又於九年（一九二〇）以海關盈餘作担保，發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債六千萬元，將流通京鈔全部陸續收回，至是京鈔整理始告結束。

## 五 地方銀行發行的紙幣



清末各省官銀錢行號濫發紙幣，已造成幣制紊亂現象，及至辛亥革命爆發，各省財政無着，都以發行紙幣爲籌款方法，於是任意濫發，粵、蜀、湘、鄂、贛等省情形，尤爲嚴重。民國二三年間，紙幣市價日趨跌落，以致物價步步上漲，商業陷於停頓。當時各省紙幣發行數目，廣東約三千二百萬元，跌至五六折。湖南約二千六百萬元，四川約一千五百萬元，江西約八百萬元，均跌至七折。湖北約三千萬元，新疆、伊犁約七百萬元，均跌至八折。雲、貴約四百萬元，雲南雖未跌價，但貴州已跌至五五折。東三省約三千四百六十餘萬元，跌至六七折。陝、甘約六百萬元，廣西約三百萬元，跌至九折。其餘河南二百二十萬元，山西七十二萬元，山東四百八十萬元，安徽七十八萬元，則尚可維持票面價格。合計各省紙幣總數，約爲一億六千三百萬元，平均按七折計算，亦合一億一千三百餘萬元。當時財政當局對這種泛濫市場的紙幣，曾擬定種種籌款辦法，計劃收回。但除廣東、浙江、直隸等少數省份按計劃收回外，其餘各省均因財政枯竭，支出浩繁，未能實行。故以後各省紙幣濫發情形，一般仍舊很嚴重。大抵『五四』以前，各省地方銀行及官銀錢號的紙幣發行，約可區別爲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紙幣發行額還不十分多，流通情況較好的，約有九省。（一）直隸省銀行所發紙幣，辛亥以後在外流通數目，計銀兩票一千二百餘兩，銀圓票四千八百餘元，銅元票二十三萬餘文，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差不多已全部收回。五年又發行銀圓票，截至六年底止，共五十三萬餘元，九年底增至六十餘萬元。（二）山東銀行自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八月開幕後，發行銀兩、銀圓及錢票三種，據同年十二月調查，在外流通數目，計銀兩票一百四十萬兩，銀圓票二百萬元，

錢票京錢二百萬串，其後陸續收回，二年十二月更與山東中國銀行訂約，委託代收，收齊後銷燬，即不再發行。（三）山西官錢局係辛亥革命期間成立，初發行小銀圓票六萬餘元，不久即收回。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底又開始發出小銀圓票八萬一千八百元，大銀圓票四千零四十元。到六年（一九一七）底該局紙幣在外流通額，計大銀圓票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三元，小銀圓票九千零九十七元。自七年（一九一八）改設銀行後，發行額始大量增加。此外尚有晉勝銀行所發紙幣，計大銀圓票三萬七千六百元，小銀圓票二千六百十四元。（四）江蘇銀行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由江蘇官錢局改組成立，發行鈔票五十萬元，年底即差不多全部收回。二年六月另發新票二十萬元，不久即停止發行，至四年底止，僅有銀圓票一萬餘元未收回。（五）福建銀行的前身是福建官錢局，據民國元年調查，本局發行的台伏票（即圓元票）約四十萬元，外府分局發行的小洋角票，亦有四五十萬元。四年底止，在外流通數目，計銀圓票三十二萬餘元，大銀圓票七萬餘元，小銀圓票二十餘萬元。六年底銀圓票減至十二萬元，大銀圓票七萬七千元，小銀圓票二十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元。（六）浙江銀行紙幣發行額，原定二百萬元，僅實際發行額達三百八十萬元以上。民國四年即開始收回，至六年五月，計收回總數共三百七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九元，未收回的只有一萬二千三百餘元了。（七）安徽的中華銀行自民元開設後，即發行紙幣三十餘萬元，二年因戰爭停閉，後由中國銀行皖分行分期代為收回。（八）雲南富滇銀行，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十月成立後，即發行兌換券三百萬元，三年（一九一四）加發一百五十萬元，五年雲南起義倒袁，又增發紀念紙幣一百餘萬元，其發行額雖不少，但因準備金充足，無限制兌現，故流通極為暢達。

六年另印新鈔六百萬元，收回舊鈔。（九）熱河官銀錢號自清末開設後，至民國元年十一月止，已發行銀兩、銀圓、制錢三種紙幣，共計合五萬餘元，到五年六月底，則爲大銀圓票五萬元，小銀圓票二萬四千五百元。六年（一九一七）改爲熱河興業銀行後，發行額始迅速增大。

第二類是發行額過多、流通情況已惡化了的，計有十省。（一）奉天省的東三省官銀號所發小銀圓票，原可隨時兌換小洋，辛亥以後，省府財政收支不敷，大量增發紙幣，據奉天商業所調查，其發行總額在民國五年底爲一千五百零八萬元，六年底爲一千六百九十三萬五千元。發行愈多，準備愈薄弱，到了民國五年的時候，官銀號即已不能支持，於是設法限制兌現，但因此現票與小洋遂發生差額，而給與兌現的人以盤剝圖利的機會，日本略優份子更乘機前來擠兌，大發其橫財，官銀號損失達數十萬，愈發支持不下了。六年（一九一七）春小洋來源已絕，無可再兌，乃與日領事交涉，改兌大洋，票面以每十二角得兌現大洋一元，同時將小洋票如數收回，改發大洋票，每大洋票一元，合小洋票一元二角，稱爲『一二大洋券』。但價格雖定爲一二，實際上則爲一三或一四不等，官銀號損失更大，不得已再與日領事交涉，好容易得到『許可』，始宣布停止兌現，但自此以後發行更多，跌價更甚了。此外又有奉天興業銀行的紙幣，在民國六年底，計有小銀圓票八十萬零九千九百餘元，農業票九千三百餘元。（二）吉林永衡官銀錢號辛亥以後所發『官帖』，卽日益增多，特別是民五（一九一六）以後，藉開發官帖以充軍餉，故發行數目越發龐大。加以準備空虛，市價日益跌落。茲將歷年發行數額及市價變動，分別列表如下：

吉省官帖歷年發行數額表

年次	數別	每年增發數			收 回 數		流 通 數	
		吊	吊	吊	吊	吊	吊	吊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二七, 七四五, 〇〇〇			三, 六二五, 六六六	一〇三, 〇七七, 六九八		
二年(一九一三)		三六, 九三五, 〇〇〇			三, 〇〇〇, 〇〇〇	一三七, 〇一二, 五七五		
三年(一九一四)		二四, 六一〇, 〇〇〇			九, 〇〇〇, 〇〇〇	一五二, 六二一, 八九一		
四年(一九一五)					三, 〇〇〇, 〇〇〇	一四九, 六二一, 八九一		
五年(一九一六)		九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三, 五〇〇, 〇〇〇	二三六, 一二一, 八九一		
六年(一九一七)		七〇, 〇〇〇, 〇〇〇			四, 〇〇〇, 〇〇〇	三〇二, 一二一, 八九一		
七年(一九一八)		二七〇, 〇〇〇, 〇〇〇			二, 五〇〇, 〇〇〇	五六九, 六二一, 八九一		
八年(一九一九)						八三四, 四〇五, 八一〇		
十二月二十日								

吉帖對銀一圓的市價表(長春)

年次	月別	一 月			七 月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四, 二六〇	四, 六一二	四, 四〇九	五, 〇二〇	五, 四七〇	五, 一九三
二年(一九一三)		六, 五九〇	八, 二〇〇	七, 二三一	七, 二五〇	八, 二〇〇	七, 六五四
三年(一九一四)		八, 〇〇〇	八, 九〇〇	八, 三三一	一三, 〇二〇	一六, 八〇〇	一四, 九六七
四年(一九一五)		一一, 三〇〇	一三, 〇〇〇	一二, 〇一八	一四, 〇〇〇	一五, 九〇〇	一五, 二〇〇
五年(一九一六)		一三, 〇五〇	一五, 九〇〇	一四, 四六〇	一四, 九五〇	一六, 〇〇〇	一五, 二五五
六年(一九一七)		一五, 一二〇	一八, 一八〇	一七, 〇七六	一六, 五五〇	一八, 〇〇〇	一五, 一三九
七年(一九一八)		一八, 〇〇〇	二〇, 一五〇	一九, 一三三	二〇, 八〇〇	二四, 〇〇〇	二二, 五四三
八年(一九一九)		三一, 八〇〇	三四, 三〇〇	三三, 四三六			

(三)黑龍江官銀號所發官帖，民國二年底，數額約合四百餘萬元，五年十一月中旬止，銀圓票爲二百八十六萬四千六百餘元，銅元票爲四十七萬餘吊。至八年底止，銅元票一項已有一百九十五萬三千餘吊。其銅元票早因發行過多，價格日落，民國二年即規定官價每銅元百枚，兌換官帖三吊二百文。此外尚有廣信公司所發官帖，數額更大。民國三年春統計該公司前後共發行一萬四千餘萬吊，六年上半年發行九千餘萬吊，七年春發行三千餘萬吊，同年冬又續發一萬萬吊，截至民國八年底止，總計前後共發行五萬零七百八十一萬餘吊。自辛亥以後，票額日增，價格日落，民國三年官帖對小銀圓市價，由秋季八吊跌至冬季十六吊，八年春便繼續跌至二十四吊。以後更是直線下跌。(四)河南省的豫泉官銀錢局，在清末即已濫發紙幣，辛亥以後該項紙幣仍照舊行使，據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十月的報告，銀兩票爲二十三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兩，銀圓票爲五十萬六千七百六十一元，制錢票爲九十三萬一千八百八十七串，不久即因發行過多，票價日落，計劃收回整理。(五)湖北官銀錢局在滿清時代即已發行大量紙幣，辛亥革命，湖北爲首義之區，軍餉政費，均由錢局發給，二三月間，庫藏一空，原存尚未發行的數百萬元銀圓票，亦陸續流出，仍不够用，又加印官票一千萬串。民國元年錢局因在外流通的銀圓票，數額超過六百萬，價格低落，情勢可慮。決定再加印官票一千萬串，作爲收回銀圓票之用。無奈此項增印的官票，又爲軍政各費挪用淨盡，而銀圓票仍無法收回。錢局情形極爲複雜，局員每私設錢店，勾結錢商，從中操縱。且常藉口掉換舊票破票，增印新票，新票盡而舊票亦出。據民國四年底統計，錢票流通額約合三千一百九十二萬餘元，銀圓票銀兩票兩項流通額，約合十七萬餘元，到了六年十月底，錢

票流通額增至五千八百六十三萬四千五百四十三吊，八年二月復增至六千四百零三萬一千零九十三串。發行日多，票價日落，八年市價約為四五折，以致物價昂貴，商店多改用洋碼，九年以後情形更不堪問了。（六）陝西省有秦豐銀行發行銀票，又有富秦官錢局發行錢票，銀票有新舊兩種，舊銀兩票，迄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止，共發出九十五萬四千兩，新銀兩票自民國二年一月十五日起至三年十月止，共發出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兩，嗣因發行過多，流通阻滯，決定陸續收回，至四年五月，在外流通額為一百七十六萬五千餘兩，六年底減至約合銀圓六十五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元。錢票在二年十一月，計發出一百一十七萬餘串，至六年底止，在外流通數為一百零一萬四千四百四十八串。（七）甘肅官銀錢號所發紙幣，民國二三年間，在外流通數目，實祇銀票十八萬兩，錢票十三萬餘串，信用很好，尙嫌供不應求，因增印五萬兩，市價仍舊很穩定。三年六月以後，發行數目陸續增加，據六年年終報告，銀兩票為三十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九兩，銀圓票為二萬一千五百二十元，制錢票為二百六十九串。後因現銀缺乏，信用日減，特於省城設兌換所，以資維持，十年兌換所停辦，票價更跌，十二年乃按四折收回焚燬。（八）新疆省城官錢局在清末已發官票一百萬兩，辛亥以後因新省政局變動，在在需款，遂不斷增發，截至七年一月止，計共發出大銀票五百七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兩，小銀票九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市價常在八折以下。此外伊犁官錢局所發紙幣亦達數百萬兩，因無現金準備，幣價日益低落，雖經迪化官錢局次第收回，但流通數仍有三百萬兩，市價在六折左右。（九）廣西銀行清末原發有一元、五元紙幣兩種，辛亥以後仍舊行使，價格並未低落。民國元年續發一角、五角小票各百萬張。二年底發行總

額爲二百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元，三年春增至三百萬元，五年十月底又增至四百二十二萬元。發行增多，價格隨之跌落。(十)貴州銀行在清末已發行銀兩票五十五萬四千零五十五兩。民初因軍費支出浩大，增發至二百十餘萬元，市價曾下跌至五五折。四年底銀圓票發行額爲二百三十三萬餘元，銀兩票合七千餘元，制錢票合二萬餘元。五年十二月新舊銀圓票合計爲二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八元，新舊制錢票爲二萬零七百六十串。後因政局動亂，市價跌落，遂決定分期收回。

第三類是發行額過多，流通情況已惡化到不可收拾的，計有四省。(一)江西民國銀行係民國元年由官銀錢號改組成立，先後發行鈔票有三種，一種是清末官銀錢號所發『九五官票』，經該行認可繼續有效的；第二種是前官銀號庫存空白小票，由該行編號發行的。另一種便是該行自行印發的大小錢票、銀圓票和銀兩票。當初此等紙幣均能暢行無阻，自民國二年江西戰事發生，財政枯竭，發行過多，信用無法維持，民間遂折價行使。在三年夏天，發行總額約合五百餘萬元，價格一般跌至七折以下，勢不能不迅速加以整理。四年春乃發行江西幣制公債四百萬元，收回九五官票，並規定九五制錢官票市價，每張均按大洋四角行使，但自八年以後，因經費無着，已停止收兌。(二)湖南銀行自民國元年四月由官錢局改組成立後，即以發行紙幣供應湘省軍政各費，民國二年已發行銅元票一千一百餘萬串，銀圓票九十餘萬元，銀兩票四百四十九萬餘兩。到了民國五年三月，銅元票一躍而爲五千八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串，銀圓票三百四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元，銀兩票五百九十四萬八千六百兩。到了七年四月，數字更龐大了，除銷燬者不計外，實際流通數額，銀兩票約有六百餘萬兩，銀圓票七百零六萬五千七百元，銅元票七千一百二十五

萬九千四百餘串。如此無限制的濫發，紙幣市價自然日趨下跌。於是在民國七年被迫不得不把湖南銀行停業清理，並擬定整理紙幣辦法，無奈內戰不已，不特所定辦法未能實行，而且還要繼續濫發，支付軍費，弄得紙幣幾等於廢紙。湖南銀行停業清理後，另設裕湘銀行，發行新票，初尙能維持票面價格，不久即因不能經常兌現，市價也跌落下來，和舊票沒有甚麼區別了。此外尙有湖南實業銀行，也發行紙幣，截至五年三月中旬止，共發出銀兩票一百零二萬八千五百二十九兩，銀圓票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九元，銅元票九十八萬二千二百串，由於不能維持信用，即逐漸收回。（三）四川銀行係辛亥革命期間成立，專代財政司發行軍用票，供應軍政各費，先後發出軍用票千五百萬元，民國三年已跌到七折，被迫不得不於四年一面將該行併入瀘川源銀行，一面籌款收回所發軍用票，先後收回一千一百四十餘萬元，後因戰事，停止收兌。四川銀行併入瀘川源銀行後，該行決定發行鈔券三百萬元，實發二百萬，封存一百萬，隨時兌現，信用頗好。不久，督軍署突來提用兌換券一百餘萬，一時現金不濟，被迫停兌。六年（一九一七）以後因停兌既久，發行又多，券價日跌，同年冬一度開兌，不久即停，票價更跌。接着該行亦宣告停業。（四）廣東官銀錢局辛亥以前所發銀毫鈔票千數百萬元，多已陸續收回，市面流通的僅百萬元左右，辛亥革命後，省政府苦於財政困窘，將原先收存的舊票，加蓋新戳，悉數發行。並令商民將市面流通的舊票，持赴總商會加蓋民國軍政府戳記，兩項共計一千三百五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一元。又由財政司另印新的一元、五元、十元各種銀毫及大洋票，一千九百萬元。發行既多，而準備空虛，價格遂日趨跌落，加以香港政府突然下令停止使用，價格愈益下跌。民國二年冬，票價即跌至五折以



下，政府與人民均蒙受到嚴重損害，據估計紙幣跌價結果，粵政府每年財政上的損失，約達八百萬元，一般人民則因物價昂貴，商業停滯，所受損失更難估計。各帝國主義者也感覺到這樣下去，必然影響到他們的在華商業和債權。三年五月遂由財政部與五國銀行團協定整理紙幣辦法，並撥用鹽款，定期自同年七月一日起至卅一日止，按四五五折，將舊票全部收回焚燬。

## 六 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

這裏所說的外國銀行，包括外人在華設立的銀行，及名為中外合辦而實權操在外人手裏的銀行等兩種。此等銀行在滿清末年已有十四家，並發行相當數額的紙幣，辛亥以後續有增加，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即增加十家，其中有日本銀行五家。而中法合辦的中法實業銀行，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中美合辦的中華懋業銀行，以及與挪威合辦的華威銀行，都是在這期間成立。大抵中外合辦銀行都攬得了發行兌換券的特權，而一般在華設立的外國銀行，却都未經許可擅自發行。當時在中國發行紙幣的主要外國銀行，為英國的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有利銀行，美國的花旗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中法實業銀行。

匯豐銀行發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的銀圓票五種，及五兩、十兩、五十兩、百兩的銀兩票四種。麥加利銀行發有銀圓票及銀兩票，銀圓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

各種。花旗銀行發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的銀圓票五種。德華銀行發有一元、五元、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的銀圓票五種，及一兩、五兩、十兩、二十兩的銀兩票四種。橫濱正金銀行及朝鮮銀行均發行日本金票，台灣銀行則發行有龍洋票台伏票。華俄道勝銀行發有金本位紙幣及普通銀圓票，銀圓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種，民國二年又發一種專行中國的金票，流通於東三省及新疆，分印漢、滿、蒙、回文字，有新疆票、伊犁票、塔城票、喀什票等名稱。中法實業銀行發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百元各種銀圓票。

這些銀行所發行的各種紙幣，凡屬以中國通貨市場為對象而發行的，固然全部在中國境內流通，其以中國以外地區為對象而發行的，也大部分在中國廣泛的流通，例如在香港發行的匯豐銀行券，即盛行於華南——特別是廣東。在印度支那發行的東方匯理銀行券，常通行於雲南、貴州。橫濱正金銀行的金票，特別是以「關東州」為對象所發行的紙幣，一時流通於整個東北各省，一九一五年以後也曾流通到山東。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期間，在華各外國銀行歷年兌換券流通數額，略如下表。

此等外國銀行紙幣在中國境內的流通，不待言是中國整理幣制的一大障礙。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乘機擴張對華經濟勢力，該國各銀行紙幣在華流通量巨額增加，對中國幣制又是一重大損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整個形勢却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由於隨着在大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而來的，本國銀行制度的發展和強化，一方面外國銀行的金融勢力，漸為內國銀行所分佔，其地位和信用，已遠不如往日。另一方面內國銀行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分支行和代理發

在華各外國銀行歷年兌換券數額表

行名	年次	民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匯豐銀行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三國, 八六, 二六
東方匯理銀行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八, 七〇, 二九
麥加利銀行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七, 四〇, 二九
花旗銀行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正金銀行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六, 八三, 七三
台灣銀行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三〇, 四四, 八〇
朝鮮銀行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三, 九, 七六
朝鮮境內外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五, 四〇, 二九
華比銀行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一, 二四, 七五
有利銀行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德華銀行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二, 二〇, 九八
華俄道勝銀行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一, 四六, 二七
中華匯業銀行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二, 一八, 四〇

行行莊，兌現便利。而外國銀行的分支行則只限於通商大埠。加以德華銀行山東分行的鈔票，歐戰發生後，在山東市面即已不能流通。六年（一九一七）八月我國對德宣戰後，復將該行接管停

業。華俄道勝銀行自十月革命後，失去俄國政府的支援，信用也低落。日本各銀行的紙幣，在五國愛國運動期間及其以後，又受到中國人民的抵制，關內不再能流通。故自「五四」以後，外國銀行的紙幣不得不逐漸讓位於內國銀行紙幣了。

不過，外鈔的勢力，在五四前後還是很強大的。大抵外鈔勢力最大的地區，首推東三省，前有帝俄的盧布，後有日本的金票。日俄戰爭以前，盧布票（或稱羌帖）的勢力最大，戰後日本以戰勝者的聲勢，由正金、朝鮮等銀行推行日本的金票，於是盧布票的用途，大受打擊。但因盧布在東北已有長久的歷史，根深蒂固，它的勢力在哈爾濱一帶，仍然很大。哈爾濱是東北北部商務的中心，又為西伯利亞遠東省需要品的供給地，該埠商民在民國初年，仍以盧布票為本位，正金、朝鮮等行鈔票，均不通用。吉、黑兩省官帖，雖能流通無阻，但亦依盧布為價格漲落的標準。茲舉民國四年某日，哈埠所開銀洋行市為例，即可見盧布在哈勢力的一斑。

錢 盤	154	（即盧布票一元五角四分換吉平銀一兩）
盧布換吉帖	892	（即吉帖八吊九百二十文換盧布一元）
盧布換江帖	1297	（即江帖十二吊九百七十文換盧布一元）
盧布換小洋	1188	（即小洋十一角八分八厘換盧布一元）
盧布匯申	135	（即盧布一元三角五分換上海規元一兩）

觀上表，可知哈埠每日五種行市，都是以盧布為單位。但自十月革命以後，盧布已等於廢紙，不能起支配作用。日本金票遂代之而起，其勢力幾乎席捲整個東北。

正金、朝鮮兩行的金票所以能在東北全境獲得支配勢力，基本上是由於日本侵略者，乘歐戰機會，全力經營，擴充其在華金融勢力。首先在大連與南滿一帶，使商家交易均以金票爲本位。並以免費匯兌，誘使商人使用。同時正金銀行又利用收存大連海關及山海關關稅的機會，規定必須用該行鈔票完納，不收他行紙幣。加以東三省的錢票官帖，發行過多，價格日落，均不能兌現，且多偽造，更給日本侵略者以有利機會，得以流通於東北各地。當中交停兌後，金融恐慌，幣價跌落，正金鈔票更得流通到京、滬地區。民國六年正金銀行金票發行權移歸朝鮮銀行，復經竭力將金票擴充，恰巧這時在十月革命之後，舊盧布票勢力衰退，金票遂得流通到哈爾濱及其以北地區。

在華南方面，特別是在廣東，外鈔勢力最大的是『港紙』。港紙爲香港匯豐銀行所發的鈔票，在香港稱爲『西紙』，在廣東稱爲港紙。因香港爲廣東的咽喉，在英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商貨出入，向以港紙爲本位。故港紙在廣東具有無上的勢力。港紙流通，侵蝕我國權，固不待言。且港紙市價，往往每千元加水高至三百元以上。港紙既高，物價亦貴，即以米價而論，米行赴港辦米，依照港例，必用港紙，港紙既貴，米價自隨着飛漲，社會金融，人民生計，都受到嚴重影響。

此外在東北新疆等省，亦暢行華俄道勝銀行鈔票。北京及上海方面，盛行匯豐、麥加利等銀行鈔票。福建方面普遍通行台灣銀行鈔票，雲南、貴州方面，通行東方匯理銀行鈔票。不過數量較小，其勢力遠比不上東北的金票罷了。

外鈔勢力何以會如此龐大呢？首先是由於在華各外國銀行，都係殖民銀行性質，無非各帝國

主義對華侵略機關，它們憑藉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特權，竭力擴張其金融勢力。又因辦理各國對華借款，並存放每年達兩億元左右的關稅鹽稅，擁有巨大實力，所以外國銀行鈔票能暢行無阻。其次是歷屆反動政府，先是昏聩糊塗，對外鈔發行，不知加以制止。後來雖知道問題嚴重，但因其對帝國主義的依存性，亦不敢加以阻止，一任其自由發展。再其次便是由於本國銀行發行的紙幣，信用太壞，如奉票跌價，京鈔停兌，都給與外鈔伸張勢力的機會。(二)

此等外鈔約可區別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外國貨幣為準備的外鈔，如東三省的金票，哈爾濱一帶的羌帖，廣東的港紙等皆是。另一類則為在我國境內的外國銀行，以我國貨幣單位而發行的外鈔。此等外鈔的流通，都足以破壞我國幣制的完整，影響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此等外國銀行又都藉發鈔吸收我國人民的現金，反過來再把所得現金貸放給我國商民，使我國人民坐受其兩重剝削。而前一類外鈔又都為不兌現紙幣，故貽害更深：『(甲)可以使行用者受莫大之損失，如從前之羌帖，一旦俄國不承認兌現，則儼如廢紙，毫無用途。(乙)可以驅逐我國貨幣及鈔券於流通之外而代替之，如日本在南滿之金票，於其交易所中，改用金建，而我國鈔券，反無用途。(丙)可以視為投機目的物，而我國商民受其損失，如金票、羌帖、港紙等，皆有此傾向。』(三)

〔一〕 參看李芳：中國幣制統一論。

〔二〕 參看馬寅初演講集第二集第五十三——五十四頁。

〔三〕 轉引自金國寶著：中國幣制問題第五篇。

〔四〕 見國幣條例及施行細則理由書第一項。

- 〔五〕參看徐寄廬：論推行新銀輪幣之動機，見銀行週報第一二七號。
- 〔六〕參看金國寶：中國幣制問題第二篇第二節。
- 〔七〕據侯厚培：中國貨幣沿革小史第一二五頁所引。
- 〔八〕麥考爾：中國之輔幣，見民國十年三月出版的英商公會月報。
- 〔九〕財政部：『呈大總統酌擬中國銀行兌換券暫行章程文（附章程並申令）』，見財政部幣制彙編。
- 〔一〇〕財政部：『呈大總統爲中國銀行兌換券未能迅速推廣緣陳原因及進行方法文』，見財政部幣制彙編。
- 〔一一〕參看金侶琴：取締外鈔問題，見銀行週報第四九四號。
- 〔一二〕戴謫庭：我之取締外鈔觀，見銀行週報第五三二號。